

部 神

Nº 0000097

刘殷农部罪份行材料

刘殷农专案组

一九七八年四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四人帮”的余党刘殷农是我省 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

- 一、刘殷农的思想一贯反动，灵魂极为肮脏…………… (2)
- 二、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拚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充任头目 (4)
- 三、一九七五年，欺骗中央，进行秘密活动，继续捣乱…………… (6)
- 四、一九七六年，更加诡秘地组织阴谋反党集团…………… (11)

第二部分 捏造事实，私整各级领导干部的黑材 料，向“四人帮”告黑状，领取黑旨意

- 一、刘殷农送给“四人帮”及其死党的黑材料…………… (15)
- 二、朱克家一九七六年二月向刘殷农传达“四人帮”的黑旨意 (18)
- 三、黄、刘派涂晓雷、沈炳章等去北京向“四人帮”递送黑材料，领取黑旨意…………… (18)

第三部分 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 纲领，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 一、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叫嚣暴力夺权…………… (22)
- 二、阴谋篡夺省、市委领导权…………… (26)
- 三、一九七四年，追随“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 (28)
- 四、一九七六年，采取以市逼省，以省压市的反革命策略，大乱云南，使云南成为“重灾区”…………… (33)

第四部分 反军乱军，破坏部队稳定，阴谋 策划组织反革命第二武装

- 一、妄图打倒昆明军区主要领导同志，反军篡权…………… (47)
- 二、抢夺民兵指挥权，密谋组织反革命第二武装…………… (49)

第五部分 竭力推行“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 一、中共昆明市公安局委员会的揭发 (52)
- 二、策划、指挥释放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在押罪犯 (54)
- 三、为反坏分子曹荣华、靳全新、马存兴翻案 (63)

第六部分 疯狂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 一、把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 (67)
- 二、按照“四人帮”黑旨意，怂恿王永昆等人公开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72)
- 三、“五·一八”反革命案件发生后，篡夺专案领导权，掩盖自己，嫁祸于人 (77)

第七部分 密谋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 一、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82)
- 二、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 (84)
- 三、破坏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妄图伺机反扑 (90)

第八部分 非法抓捕、打死无辜革命群众袁宝华同志

- 一、违抗中央“六·六”通令，非法绑架袁宝华同志 (95)
- 二、亲自策划、指挥对袁宝华同志刑讯逼供，毒打致死 (96)
- 三、订立攻守同盟，妄图掩盖罪责 (98)

第一部分

“四人帮”的余党刘殷农是我省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

刘殷农之所以堕落成为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余党，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头目，现行反革命分子，决不是偶然的。他的思想一贯反动，灵魂极为肮脏，野心勃勃，利欲熏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刘殷农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进群众组织，竭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破坏文化大革命。党的“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在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过程中，网罗党羽，在“四人帮”的培植下，组成了一个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肆推行所谓“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攻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阴谋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革命干部，篡夺了一部份权力，干了大量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坏事，是搞乱昆明，搞乱全省的罪魁祸首，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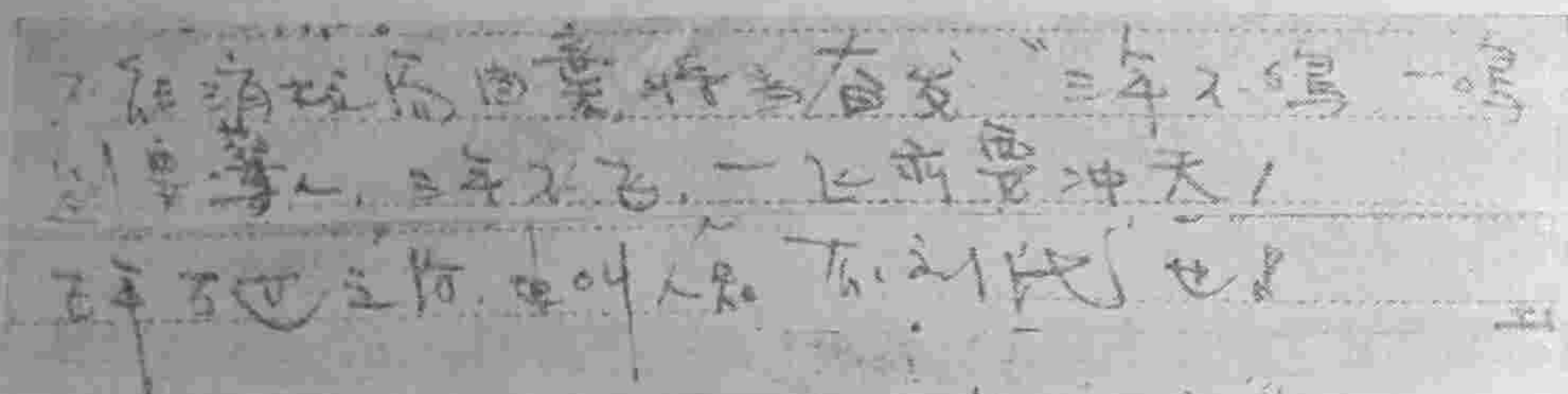
一、刘殷农的思想一贯反动，灵魂极为肮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刘殷农欺世盗名，披着所谓“新生力量代表”的外衣，将其真相掩蔽。但是，历史是最好的证明。他早就以“天马”自居，妄想“直挂云帆”，“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静静地蓄备力量，思索方向”，企图“获得”“权力”，要在“百年万世之后，也叫人知有刘氏也！”野心勃勃，灵魂肮脏。

看看他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

下面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间，刘殷农的几篇日记

1、刘殷农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记(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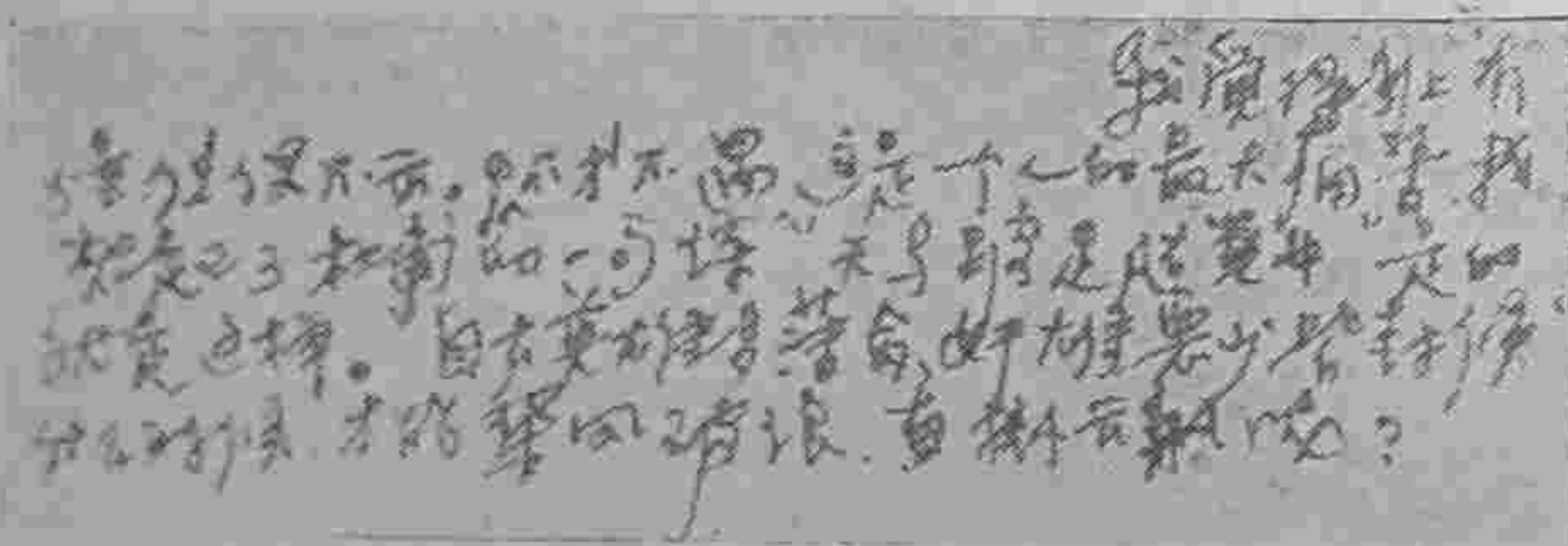
不能消极而自弃，将当奋发。“三年不鸣，一鸣则要惊人，三年不飞，一飞亦要冲天！”百年万世之后，也叫人知有刘氏也！

2、刘殷农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记(节录)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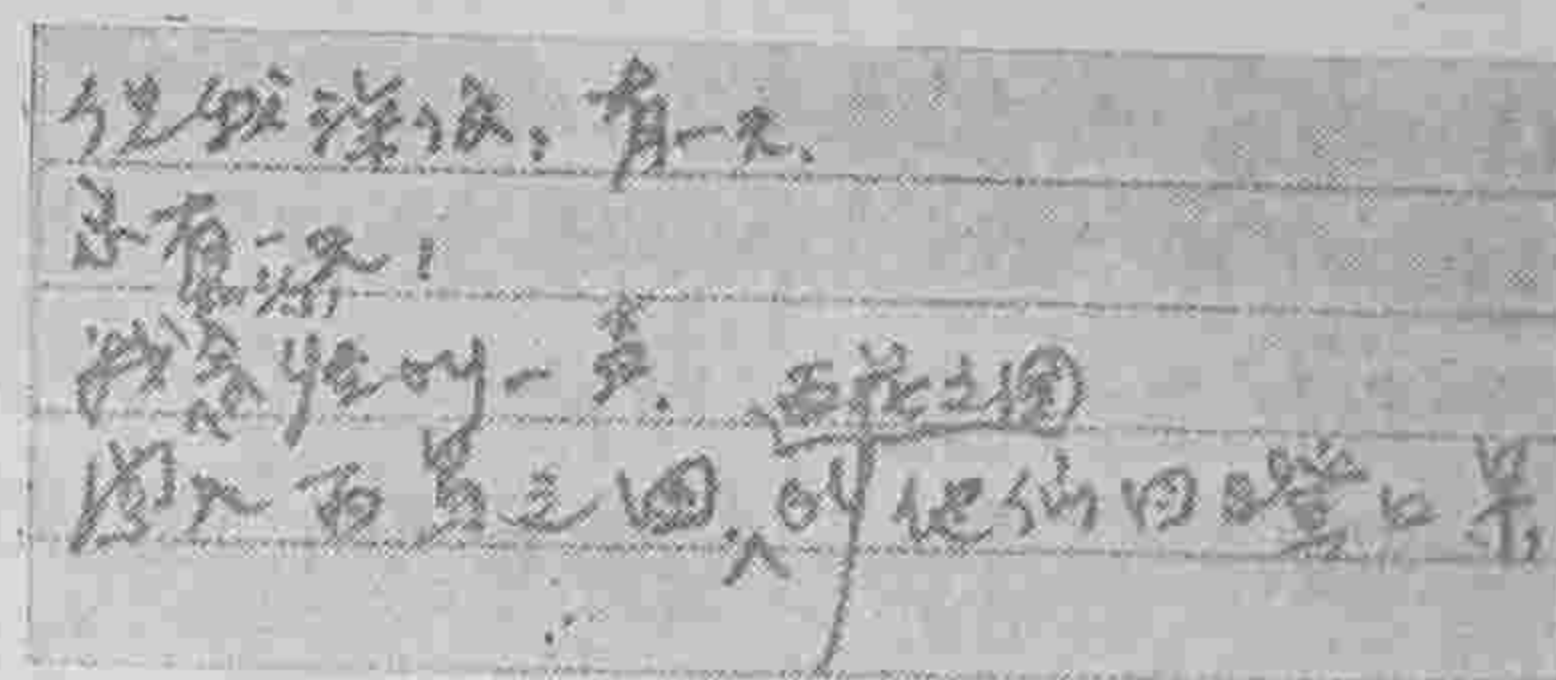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我觉得身上有力量，但使不出。怀才不遇，这是一个人的最大痛苦，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天马跋足随蹇中”是的就是这样。

“自古英雄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什么时候，才能乘风破浪，直挂云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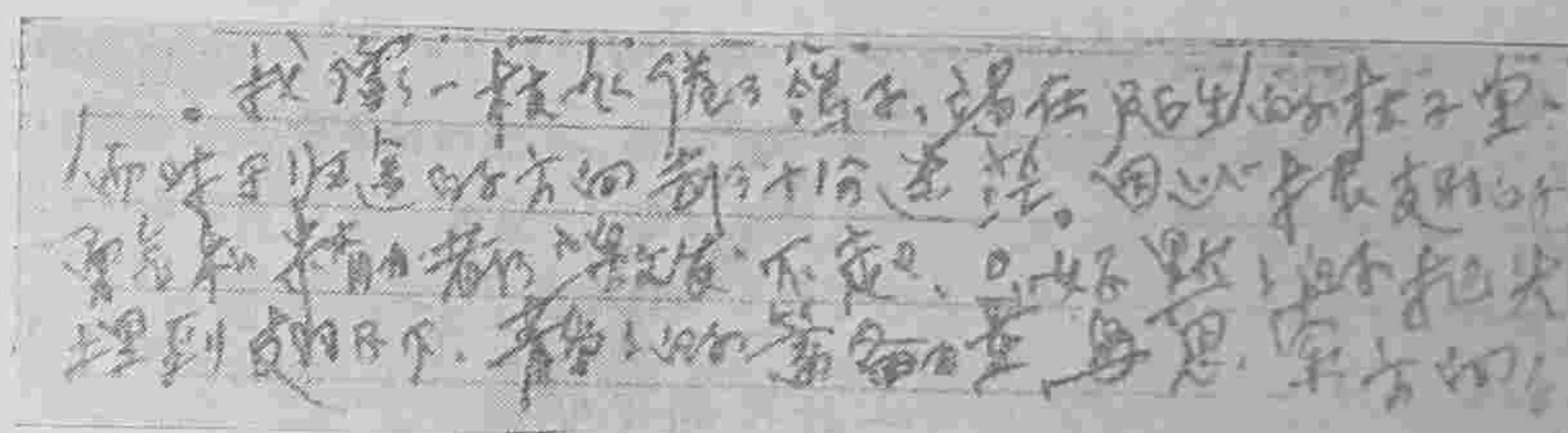
3、刘殷农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但我深信：有一天，总有一天！我和你会怪叫一声，闯入百鸟之国，百花之园，叫他们目瞪口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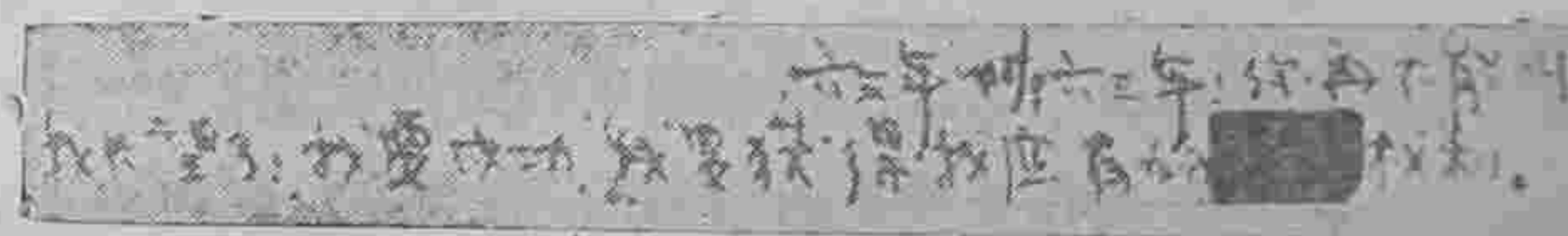
4、刘殷农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的日记(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我像一枝(只)飞倦了(的)鸽子，站在陌生的林子里，而对于归途的方向却十分迷茫。因此振翅的勇气和精力都激发不起，只好默默的把头埋到翅子下，静静的蓄备力量，思索方向！

5、刘殷农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的日记(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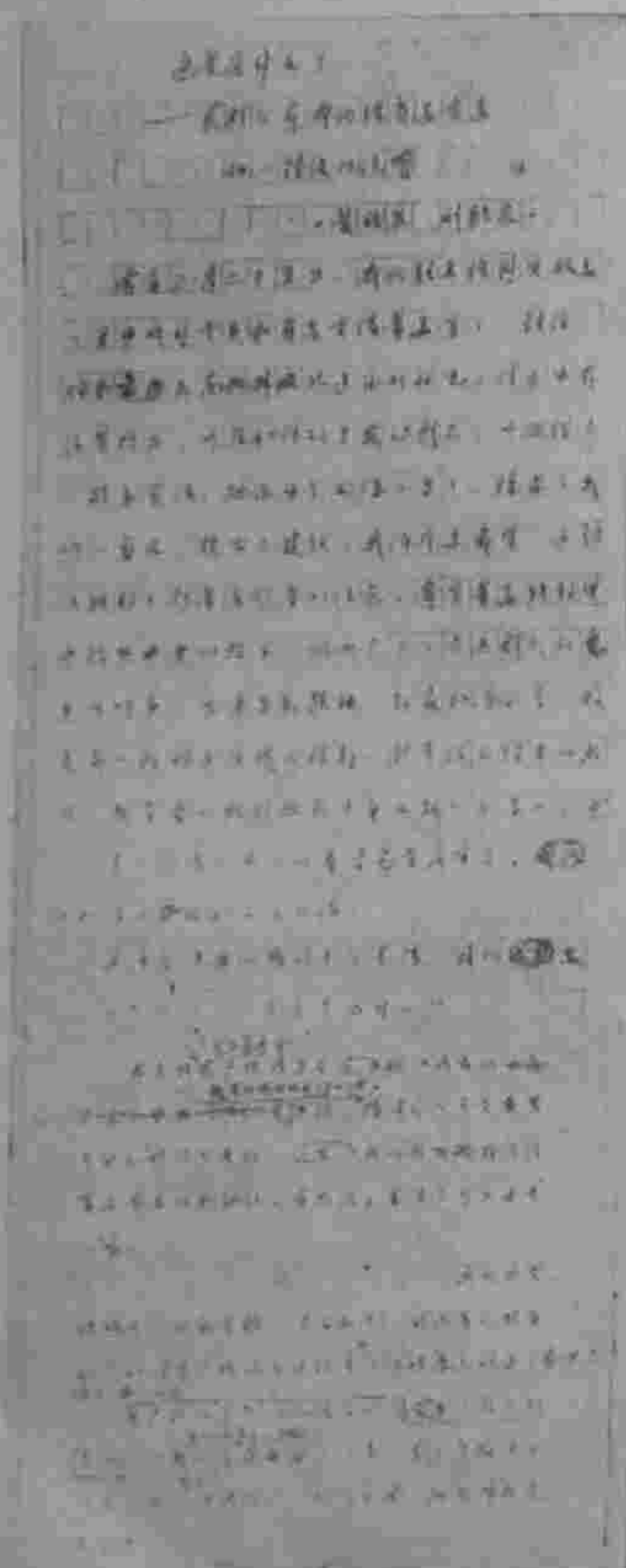
六三年啊！六三年！你再不能叫我失望了！我要成功，我要获得我应有的权利。

注：以上影印的材料，都是从沙朗巷赵珊家查获的刘殷农的材料

二、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拚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充任头目

一九七四年，刘殷农紧跟王张江姚“四人帮”，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不批林，假批孔。公然违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不准串联的多次指示，伙同黄兆其等人，频繁串联，密谋策划，拉邦结伙，点将招兵，形成了一个上下勾结、内外串通、盘根错节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刘殷农充当了这个反革命黑邦的头目，运用帮派势力，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一九七四年初，黄兆其、刘殷农联名抛出的一份反动大字报（节录）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中查获的刘殷农转移的材料

影印件原文

这是为什么？

——关于公布我们给省委常委的一封信的说明

·黄兆其 刘殷农·

今年（七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们联名给周兴政委、王必成司令员和省委全体常委写了一封信，对当前云南批林批孔运动的状况，对运动有没有阻力，以及如何放手发动群众，冲破阻力，联系实际，把运动引向深入等等，陈述了我们的看法，提出了建议。我们本来希望，这封信能够引起省委领导的注意，希望省委能够坚决按照中央的指示，倾听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意见与呼声，迅速采取措施，切实加强领导，改变前一段对运动很不理解、领导很不得力的状况，把全省的批林批孔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然而，事与愿违，我们的希望落空了，那封信犹如石沉大海！

这件事使我们感到十分气愤，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为了给广大工农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在排除对批林批孔斗争的干扰，思考“陈副司令员究竟想干什么？”时作个参考，我们特地把

我们给省委常委的那封信公布于后，并写了以上这些说明。

我们将坚决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早已准备好了对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残暴与横逆！有干扰，有阻力，我们不怕！

工农兵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紧密地团结起来，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冲破阻力，排除干扰，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二）省建徐宝兴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交代（节录）

以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在批林批孔运动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头目、有核心、有骨干、有幕后支持者和有“文”、“武”班子、活动据点、联络关系等这样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

黄兆其、刘殷农自始至终是主要出面头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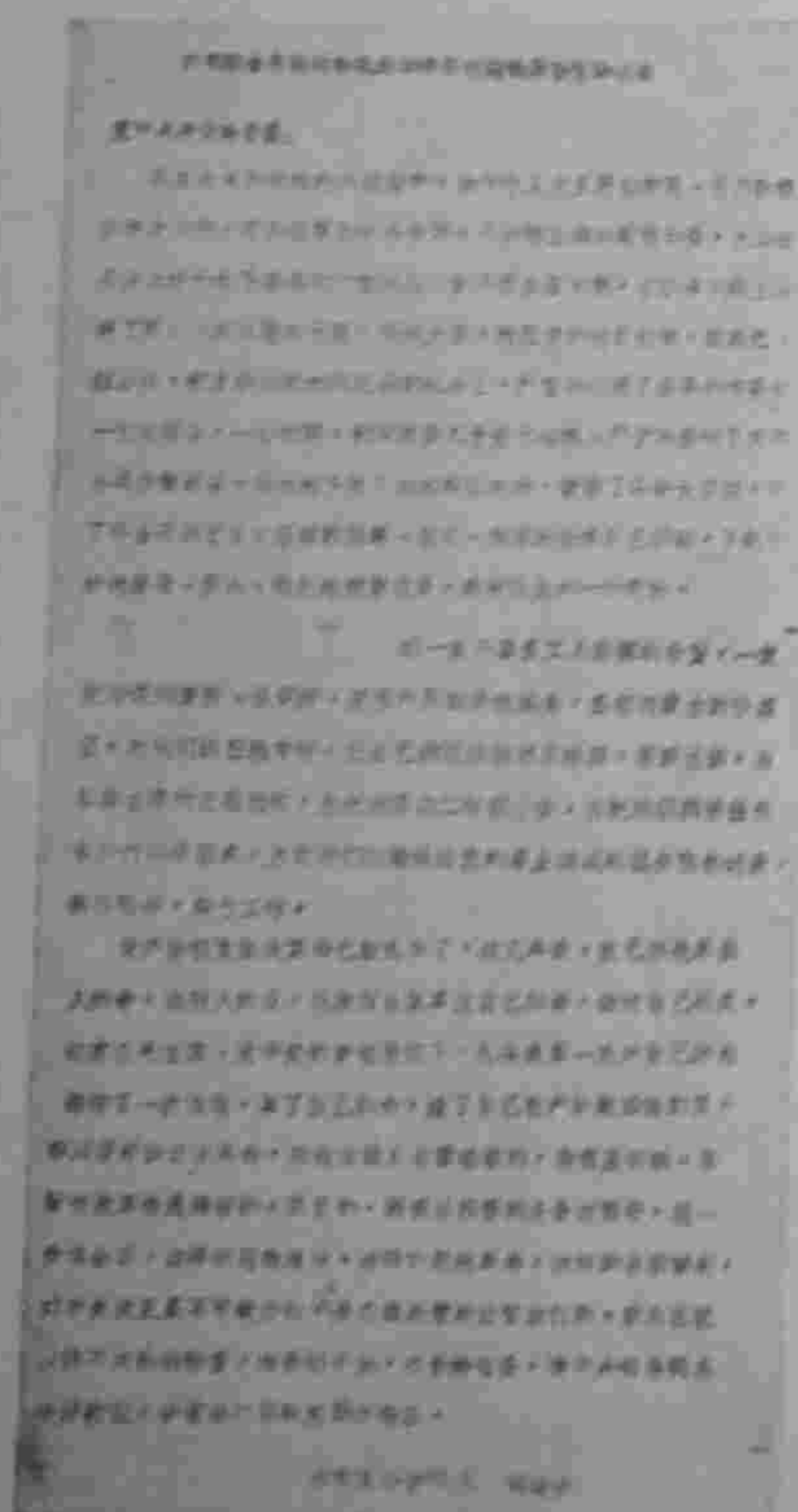
坚持“划线站队”错误，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是云南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形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它以坚持“划线站队”错误，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搞抢班夺权为目的；以“对外无组织、对内有联系”为手段；以“形势分析会”为主要活动形式；上向“四人帮”送黑材料，打黑报告，秉承其黑旨意，下插手一些部委办局、地州市属工矿企业，凌驾于党之上，以邦压党，以邦代党，成了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三、一九七五年，欺骗中央，进行秘密活动，继续捣乱

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党中央为了解决云南问题，让刘殷农到北京学习和检查。但刘殷农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一方面向中央作假检讨，欺骗中央，表示要“把资产阶级派性搞臭”，把错误“丢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另一方面，却牢牢地控制着云南资产阶级邦派体系。他和黄兆其在上海前夕，就指定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许少先及一些心腹骨干，继续捣乱、破坏。他在北京时，通过书信及电话，遥控、指挥资产阶级邦派体系，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一九七五年七月刘殷农写给党中央并云南省委的检查（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对我在去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检查和认识

党中央并云南省委：

我在去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资产阶级派性大发作，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能够正确地看待形势，尤其看不清大好形势下存在的严重问题，抓不住主要矛盾，在很多问题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顾大局，违反党的组织纪律，搞派性，拉山头，把党委内部的问题插到社会上，严重地削弱了省委和市委的一元化领导，一度时期，闹得市委几乎处于瘫痪。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各项政策落实，极大地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背离了斗争大方向，做了许多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事。我省、我市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能很好地普及、深入、持久地健康发展，我有很大一份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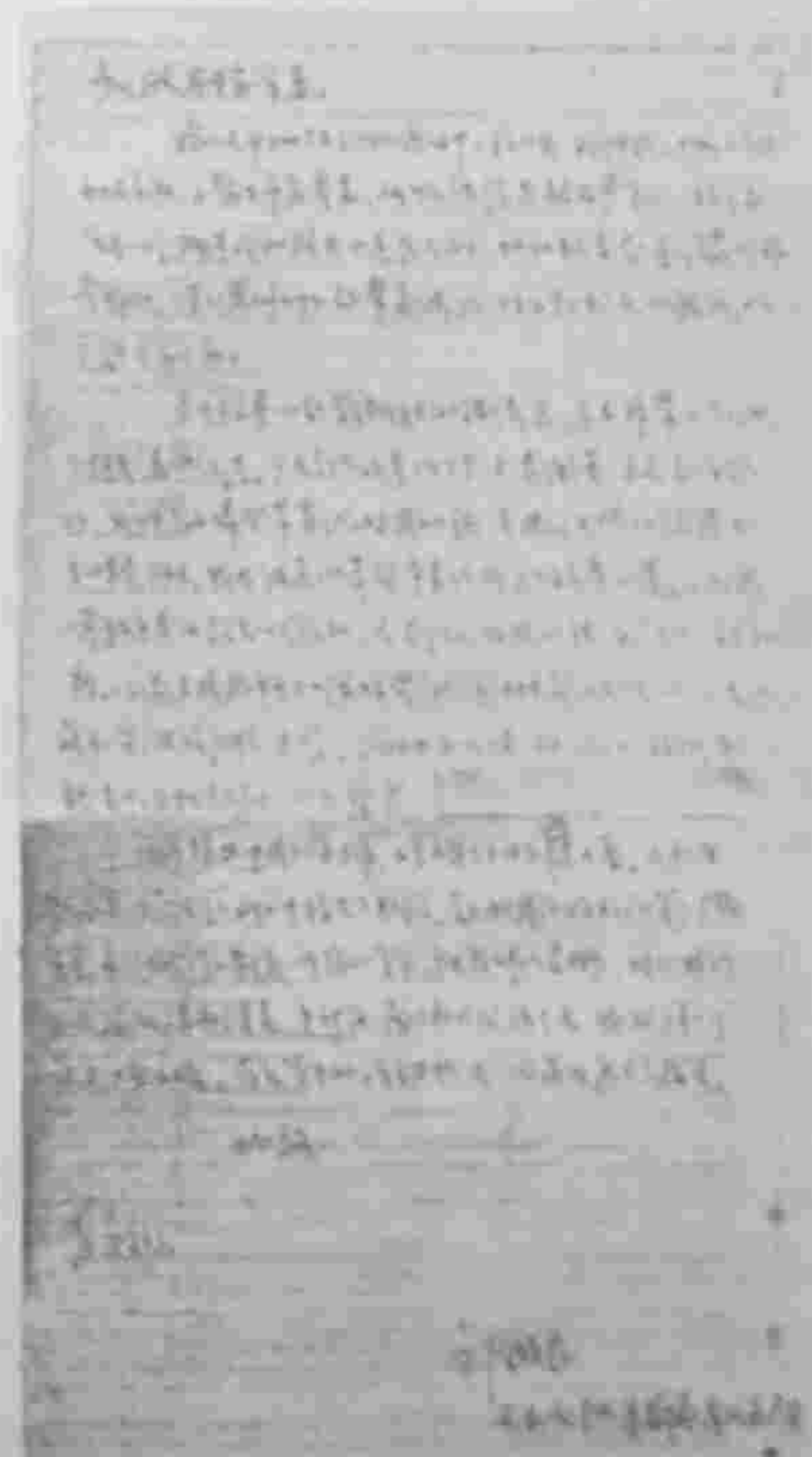
我一定不辜负工人师傅的希望，一定把错误检查好，认识好，把资产阶级派性搞臭，丢在内蒙古的沙漠里。把他们的经验学好，把自己的沉痛教训总结好，带回云南，为落实主席的三项指示，为把云南的工作搞上去，为把我们闹派性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为把我们犯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失弥补过来，振作精神，努力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这几年来，自己都是革别人的命，造别人的反，从没有认真革过自己的命，造过自己的反。这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九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次清理，革了自己的命，造了自己资产阶级派性的反。我深深感到这次革命，对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尽管这次革命是痛苦的，艰巨的，而我从痛苦的斗争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到，这样的思想清理，这样的思想革命，这样的自我解剖，对我来说正是不可缺少的，正是应该经常地自觉进行的。我现在把这份不成熟的检查，报告给中央，报告给省委，请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指正，请省委领导同志批评指正。

云南汇报会代表 刘殷农

（二）一九七五年八月刘殷农在昔阳写给昆明市委的检查（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少川同志并市委常委：

我在去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拉山头，搞派性，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分裂了市委常委，所犯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给市委领导工作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现在检查起来，感到非常痛心，深深感到对不起常委同志们，对不起机关的同志们，对不起全市人民。

这个检查比起我所犯的错误来，还是非常不够的。对错误的认识，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衡量，更是差得很远。我诚恳的希望常委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我也诚恳的希望市委在我这个检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手发动机关的同志和广大群众，对我的错误深入揭发批判。以便使我能够加深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动实质的认识，彻底和资产阶级派性决裂。同时也可以使一些同志从我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我们按照中央的安排，已于七月三十日到达大寨。八月三日，陈永贵副总理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勉励我们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并对我们在昔阳一个月的学习，亲自作了安排。现在我们已由跑面转为蹲点，预计

在南墙大队住十天，然后蹲一个社办工业的点。有关学习的详细情况，回昆后再行报告。

此致

刘殷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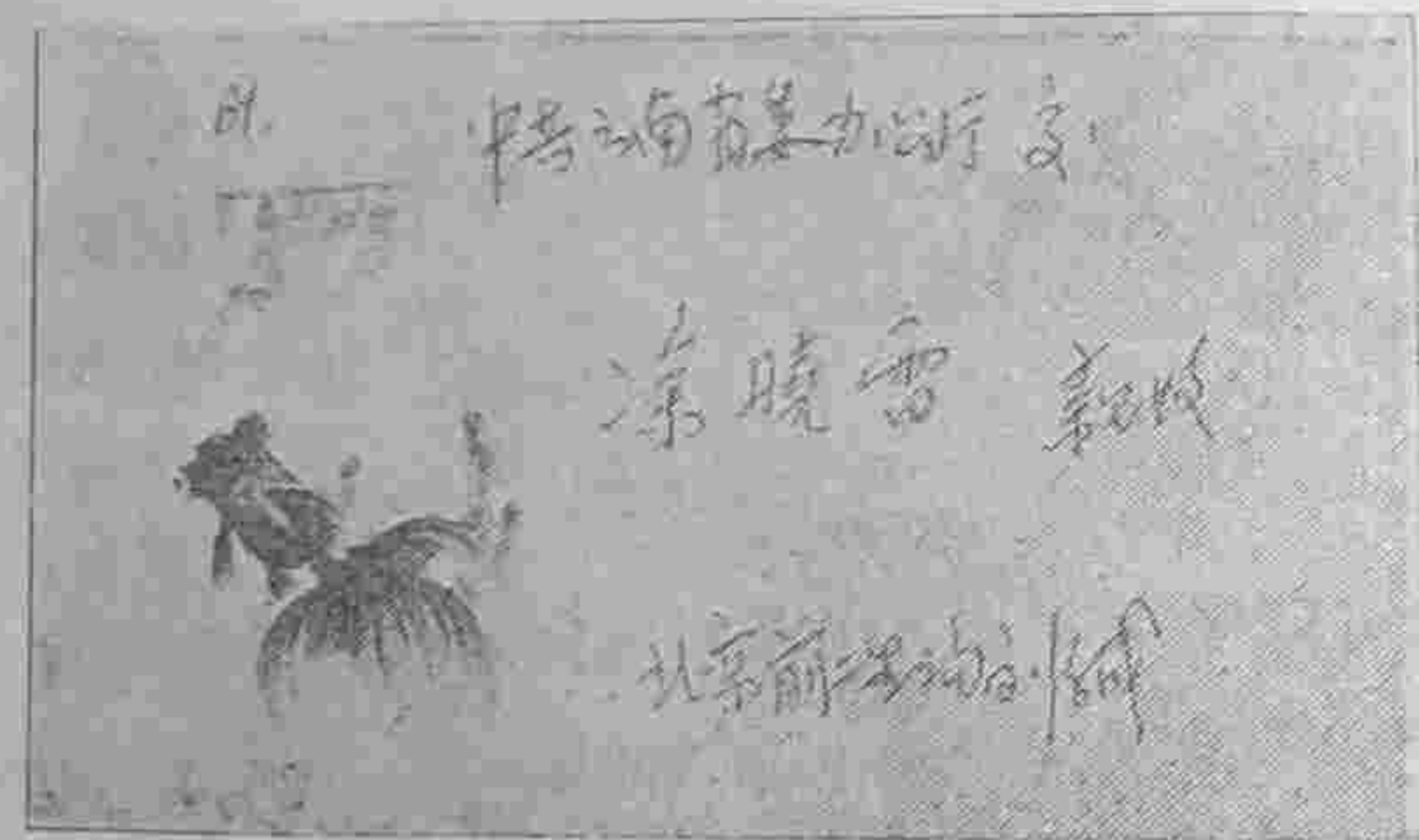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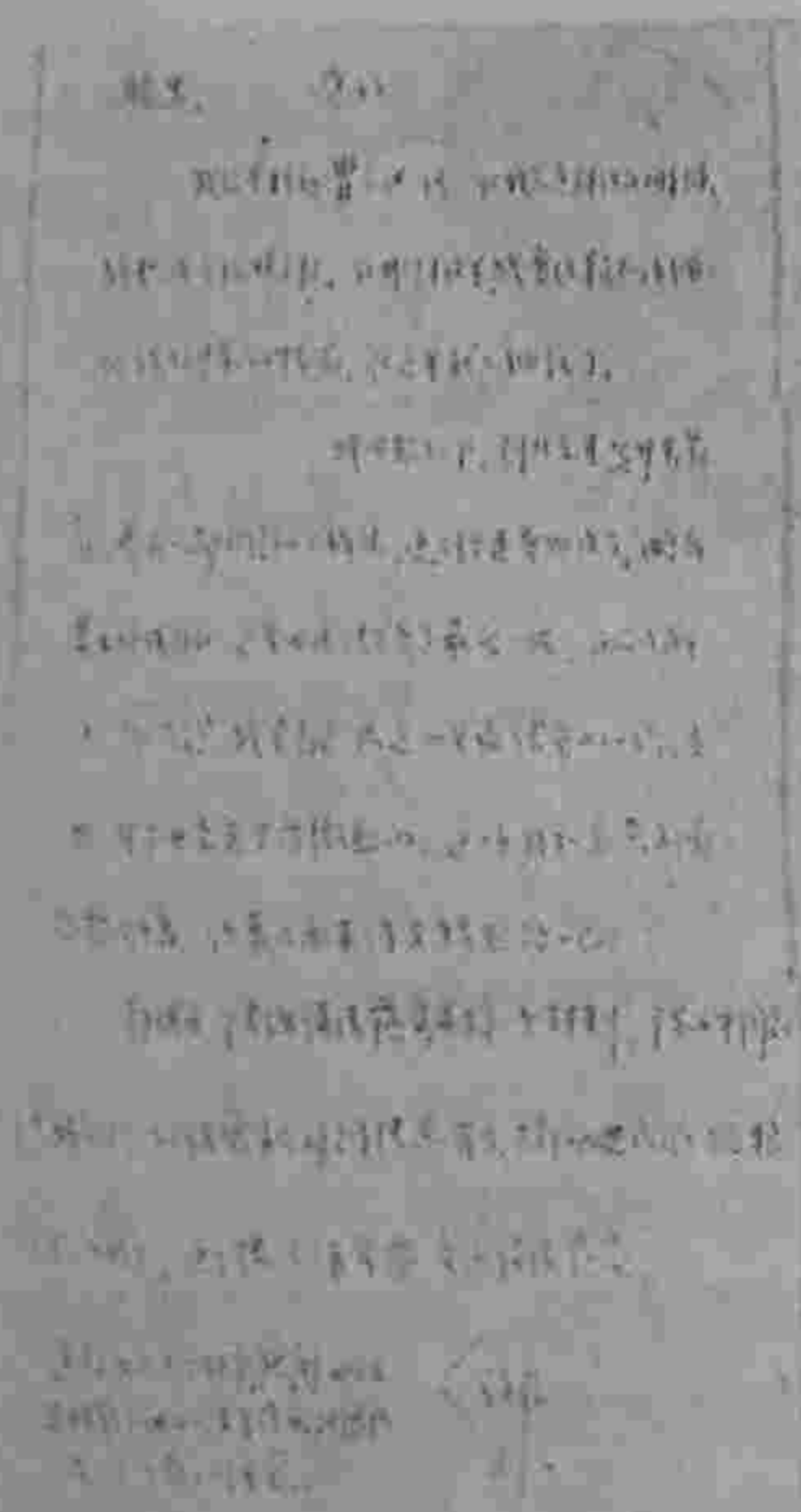
敬礼

七五、八、十二、于昔阳南墙大队

(三) 罪犯许少先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交代(节录)

一九七五年初黄兆其、刘殷农上北京前，在省委工交政治部小会议室开会。参加的有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刘志宏、李积德，还有我、邹思浩、涂晓雷、章世祖、市里有王云仙、×××、马首良、胡守贞、梅期东、李连生、王海全、曹光祥。会议由黄兆其主持，黄兆其先讲，刘殷农后讲。黄讲：我们很快就要离昆到北京。(我们走后)家里由李树林、李积德、张奎林负责；市里由王云仙、马首良、×××和我负责。

(四)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六日刘殷农在北京遥控指挥邦派活动写给涂晓雷的信(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晓雷：您好！

我给奎林处曾去过一信，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想你们已收到了。在那封信里，我曾经较为详细地谈了到京的情况。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我回想了一下，到北京来见中央首长，参与云南问题的解决，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由于有基本路线存在，这第四次决不会是最后一次。而几次解决

云南问题，我觉着这一次是心里最踏实的一次。当然，斗争也会是空前激烈的。这一点，我和老黄都有思想准备。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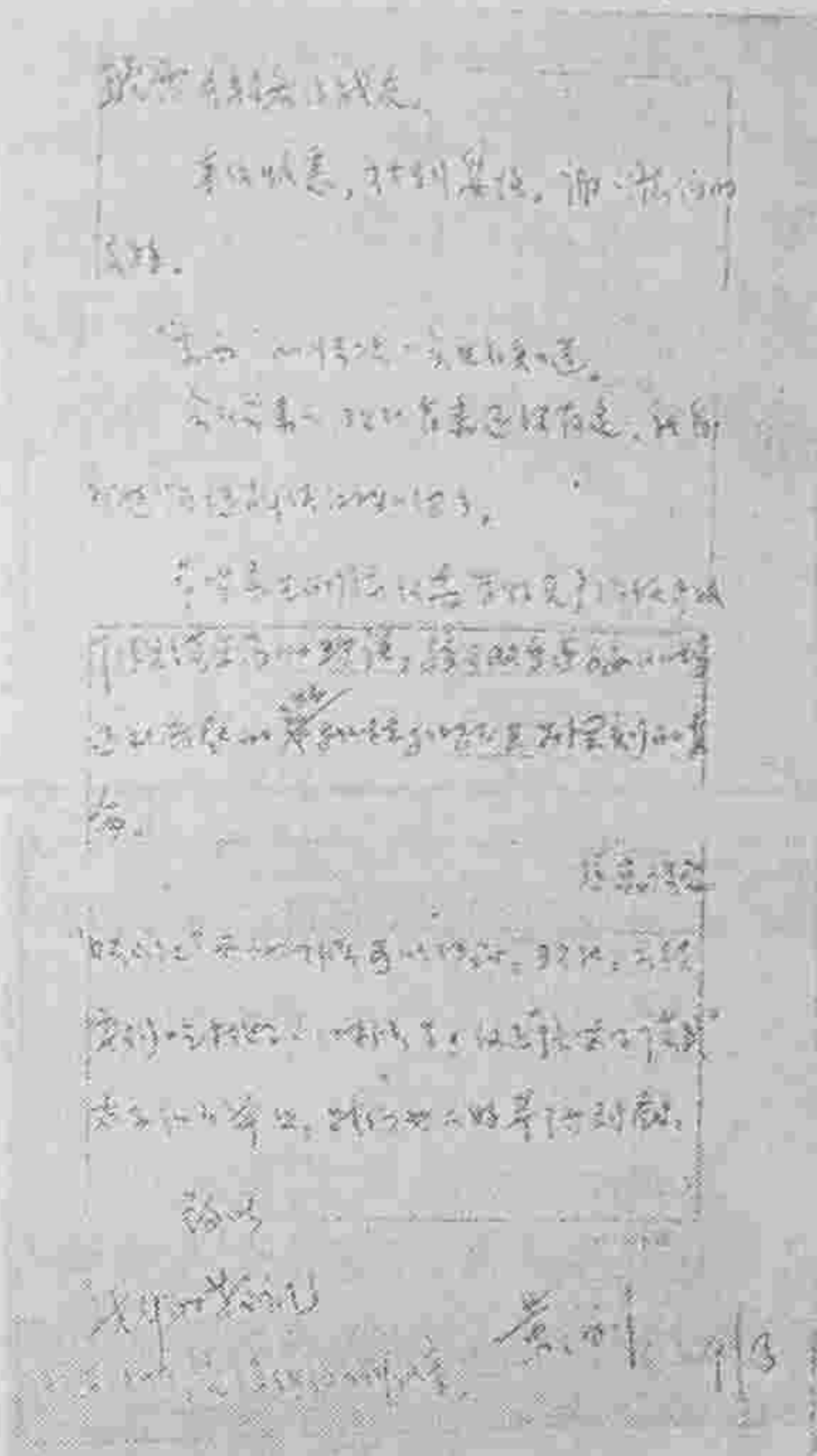
有件事，请你设法落实并搞一个材料：陈文才同志给我讲，庄波曾亲自到清真寺去煽动过回民搞粮油机械厂。这个情况很重要，务必设法落实。

这封信可送跃泽同志阅，也算是我写给他的。关于落实庄波清真寺一事，请注意保密。

殷农 16/元(一九七五年)

(五) 黄兆其、刘殷农一九七五年三月九日在北京写给涂晓雷的信(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晓雷并转各位战友：

来信收悉，材料妥收。谢谢同志们的支持。

“京西”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

会不会来人，现在看来还没有定。就看那边问题解决的如何了。

希望家里的同志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张开双手迎接又一场正在兴起的比批林批孔更为深刻的革命。

原来设想“映山红”开的时候可以回昆，现在，大约要到吃桃子的时候了！反正“陪太子读书”，太子们不毕业，我们也只好奉陪到底！

致以

战斗的敬礼

这封信不要传开了。免得他们又作文章。

黄、刘 9/3

注：这是涂晓雷转移到杨慰农住地的材料

(六) 昆明市革委办公室行政科的揭发(节录)

我们在核算一九七五年机关长途电话费中，发觉市委工交部梅期东一九七五年一月至十月份向北京连续挂发长途电话，其通话之长，费用之大，在我机关整个长话费中比较突出，当时特别引起我们怀疑的是，为什么工交部在七五年内连续不断打出这么多的电话，且发话人每次都由梅期东一人挂发，是业务上的需要吗？为此，曾将这个问题与工交部周象仪同志交换过意见，据周回忆说，部里与北京在业务上没有联系。

梅期东在七五年内向北京发出如此多的长途电话，究竟他是干的什么勾当，完全有必要弄清真相，调查清楚，现将梅期东在机关历次挂发北京的长途电话抄录于后。

挂发北京长途电话明细表

日期	通话地点	通话时间	收费情况(元)	日期	通话地点	通话时间	收费情况(元)
1月13日	北京	17分	12.00	4月19日	北京	28分	16.80
15日	北京	5分	3.00	19日	北京	1分	0.10
17日	北京	47分	34.80	25日	北京	28分	16.80
23日	北京	1分	1.20	27日	北京	13分	7.80
24日	北京	27分	25.20	29日	北京	4分	2.40
2月1日	北京	17分	20.00	5月14日	北京	1分	0.10
17日	北京	9分	5.40	15日	北京	13分	15.60
26日	北京	19分	11.40	20日	北京	8分	9.10
29日	北京	18分	10.80	6月	北京		6.00
3月	北京		21.00	10月	北京		7.20
4月8日	北京	1分	0.10				
9日	北京	1分	0.10				
10日	北京	12分	7.20				

合计 次数 23次 234.50元

市革委办公室行政科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七) 市委工交政治部梅期东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揭发交代(节录)

黄兆其、刘殷农一九七五年初上北京后，是与家里这几个人(或这几个人主动与他们)保持着电话联系的。而这边挂到北京的电话，又是通过我或他们用我的名字去挂的。

快过春节时，涂晓雷、许少先、李连生、章健、唐××等在时，挂了次电话，涂、许、唐及我都讲了话。事后我还念了念：老这样挂怕不行，次数多了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怕还是少挂点好。当时李连生和章健还把他们的账号和电话告诉了我，叫可换着挂挂(一个是市文批站，一个是省建)。后来，我真的用这两个单位的电话和账号各挂过一次。除此之外，全是用的市革委的电话和账号挂的长途电话。

经我挂的电话，绝大多数是涂讲。涂讲时，有时让听，有时不让听。快过春节那次通话很长，讲的人也多，先是涂讲昆明已稳定，问了刘他们春节能不能争取回来过；许少先讲叫刘放心，安心学习，家里有他们在不怕。唐××也问了报社议是非的材料还要不要？最后，我被叫去接了几句话，刘先问部里近来情况怎么样？我告诉刘，听说在橡胶厂出席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问题上安付主任有不同的看法，橡胶厂的人正找他吵。刘听了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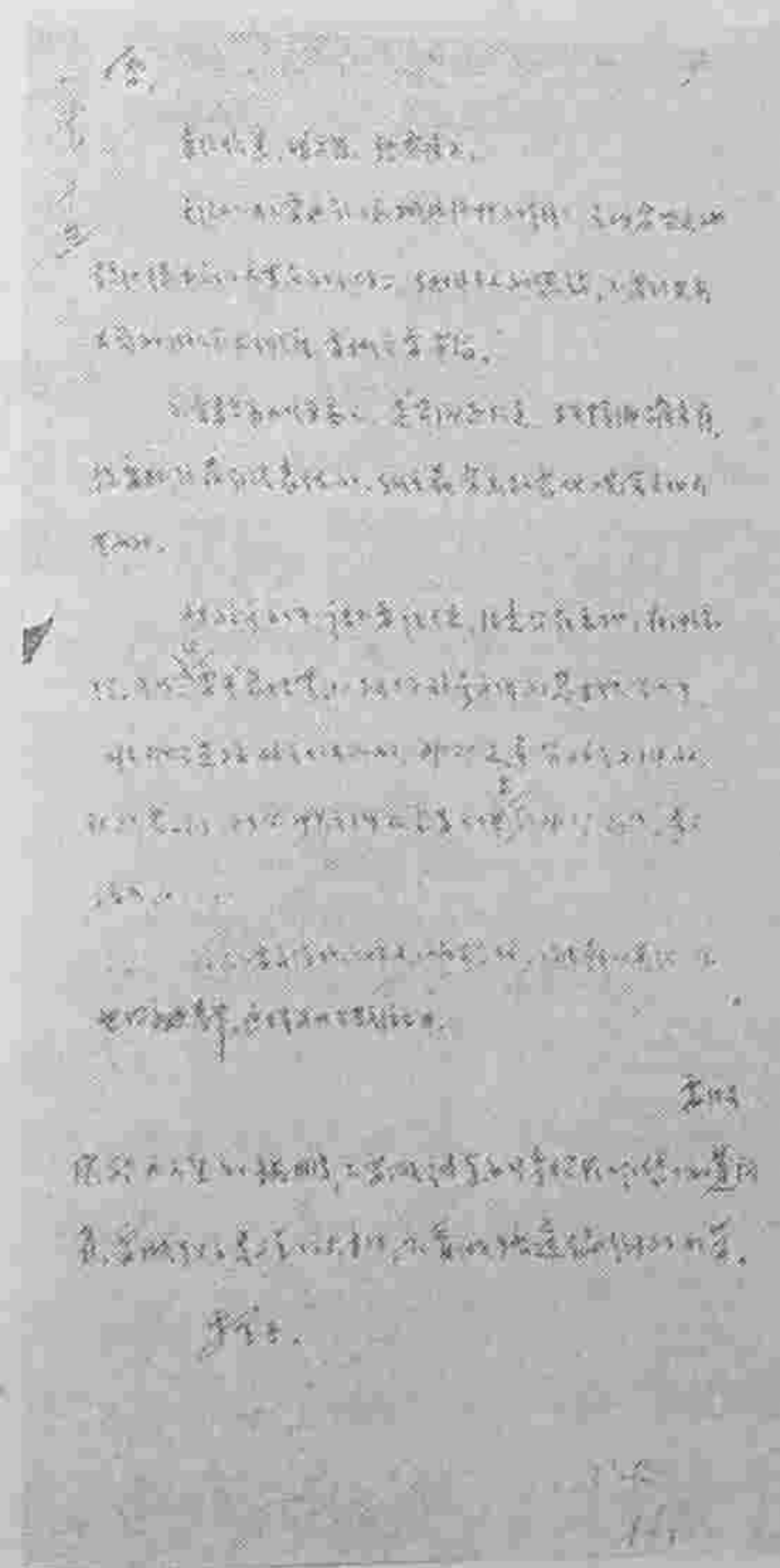
有时北京也会主动打电话回来。有一次就是找马首良。

他们还有书信往来。有次，刘写信给张奎林，张叫我通知李积德来看信，看后还当众烧了，看信者有涂晓雷、李树林、徐宝兴、李积德、邹思浩。我替他们把的门。

四、一九七六年，更加诡秘地组织阴谋反党集团

刘殷农一九七五年在北京等地，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中央检查错误。回到云南后，经省委决定，让他到农村锻炼，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武定县平地公社以赤达大队担任支部付书记。但是，刘殷农贼心不死，仍秘密地进行结帮篡党的阴谋活动。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二日窜回昆明，伙同朱克家、黄兆其等几个人，组织了一个比过去更为秘密、更为隐蔽的阴谋反党集团，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刘殷农在武定指挥邦派活动写给涂晓雷的信(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雷：

来信收悉，很高兴。但要注意：

无论如何不要再让人家抓住派性的辫子。立场要坚定地站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抛开个人的恩怨，不要在无关大局的旧账上纠缠，要抓主要矛盾。

不要輕易的伤害人，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但要抓住最有代表性的，孤立最穷凶极恶地咒骂文化大革命的。

对26号文件，(注：指省委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话不要说绝。注意留有余地，有伸缩性。可以先从要求总结贯彻执行26号文件的基本情况入手。分清那些是按26号文件办的，那些是违背26号文件的。在这个基础上，对照中央文件和省委文件，看有那些出入。步步深入。……

注意不要弄得我们将来没有发言权。设法鼓动其他三位也回家过春节。这样可以分散注意力。

要做展翅几万里的鲲鹏，不要做被革命斗争炮火吓昏了的蓬间雀。要做独立支持的大树，不要做路边偏倒的小草。

握手。

殷农

9/元

注：这是涂晓雷转移到杨慰农住地的材料

（二）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向党“宣战”的反动大字报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节录）

贾政委并云南省委、省革委：

正当一场关系着我党、我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大辩论冲破重重阻扰，破浪前进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战士，我认为很有必要向你、向省委、省革委直接了当地阐明我的观点：

云南和全国一样，在同一架鼓风机的煽动下，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

你和省委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了你们根本不听招呼，而是在搞阳奉阴违，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为你们的错误诡辩，以便拖延时间，伺机反扑，镇压革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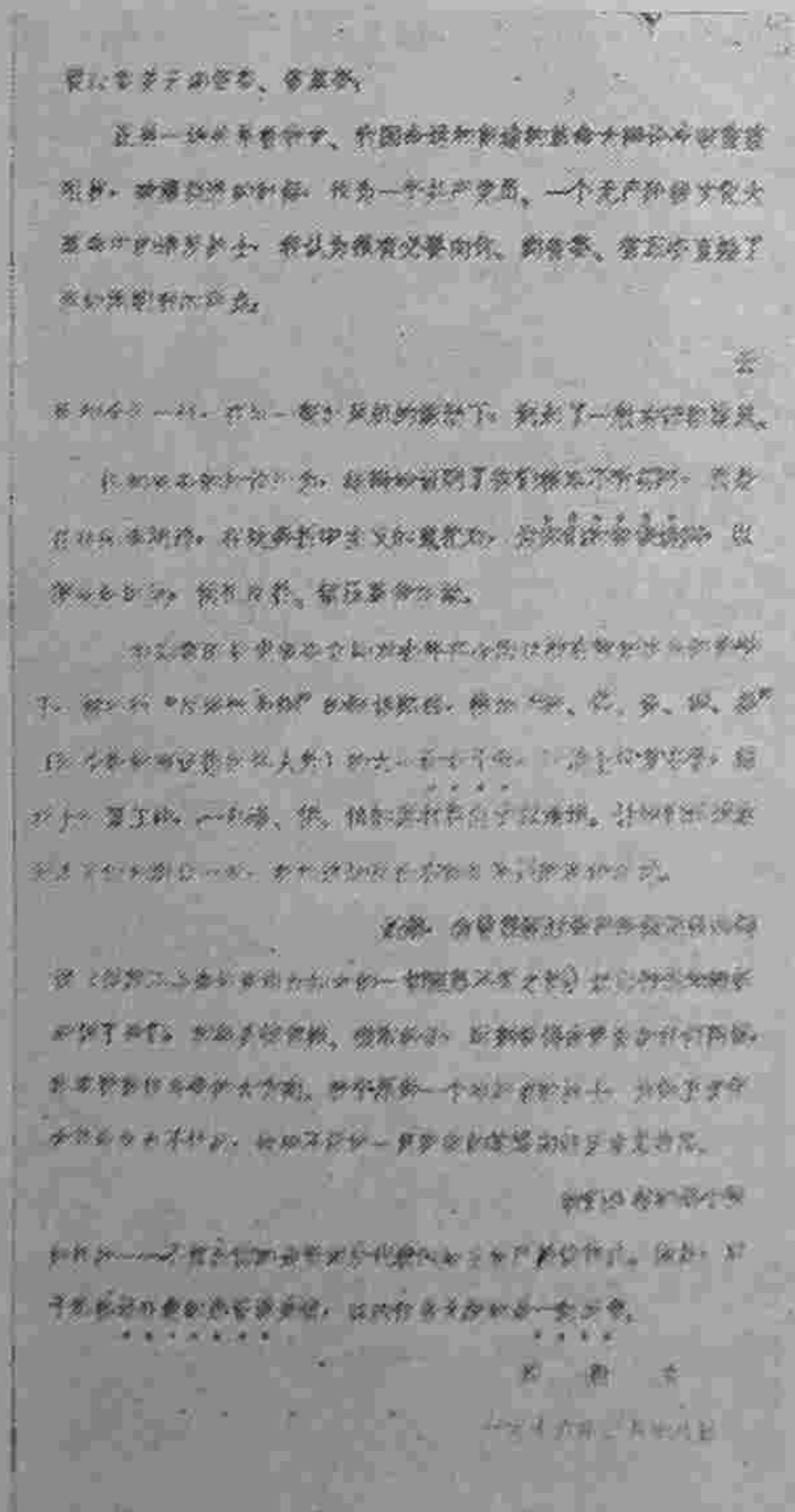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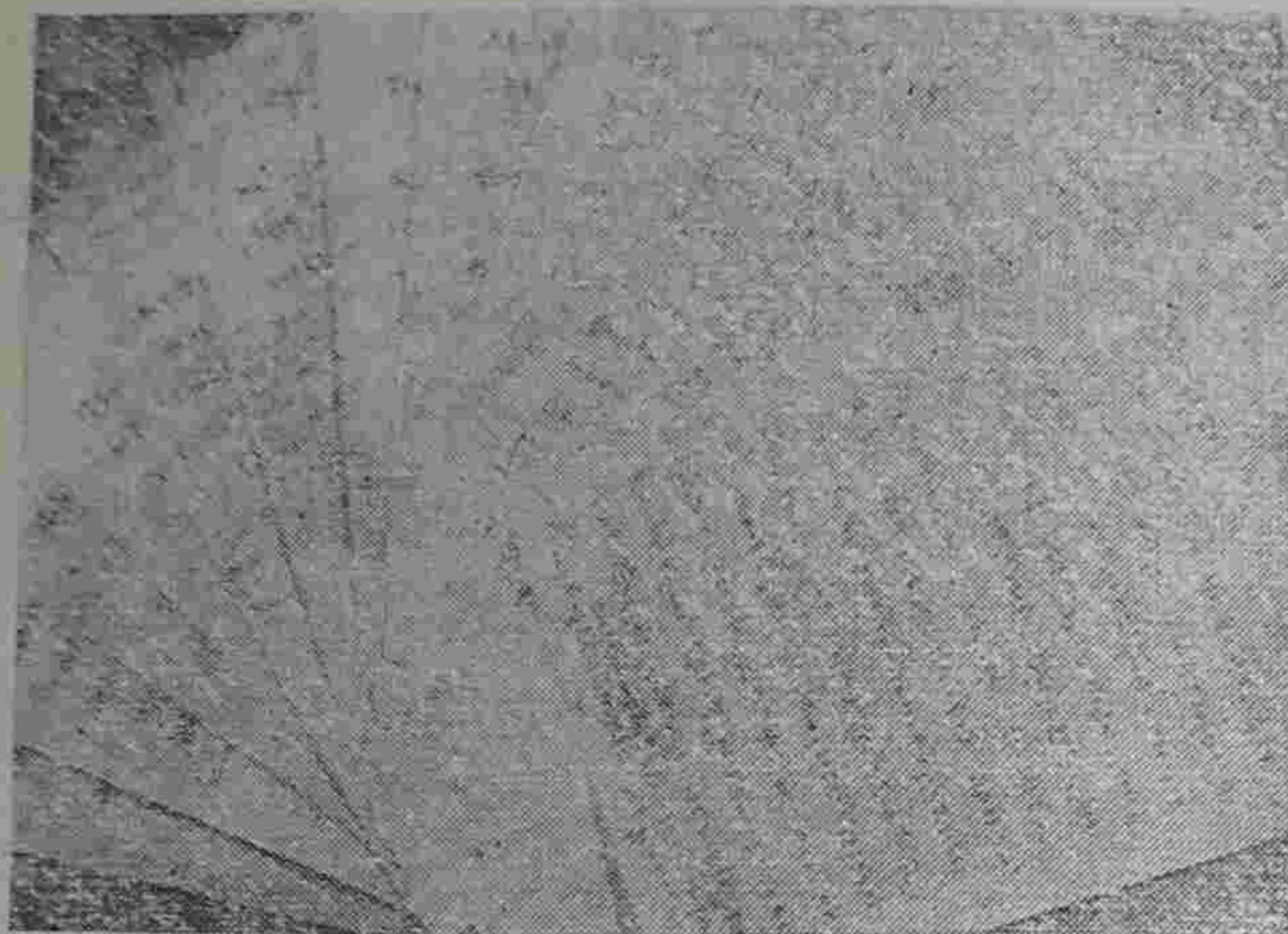
我郑重的要求省委立即对去年在全国这股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被推行“反派性为纲”的错误路线，横加“撤、停、免、调、抓”（除少数确有证据的坏人外）的大批新老干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一些逼、供、信的黑材料应予以清退。让他们迅速返回本单位和群众一起，参加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运动。

诚然，我曾经犯过资产阶级派性的错误（但绝不是走资派横加给我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这些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将丢掉包袱，吸取教训，时刻警惕走资派的任何阴谋，牢牢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我宁愿做一个有缺点的战士，为保卫文化大革命而永不休战，也不愿做一只完整的苍蝇向修正主义投降。

我们是在和那个阶级作战——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因此，对于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来说，我的报告无疑地是一封战书。

刘殷农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



注：这是从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中查获的刘殷农转移的材料

（三）省建张奎林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交代（节录）

帮派的核心人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徐宝兴、张奎林、许少先、邹思浩、杜晨光，后期加上一个李积德。黄、刘抓总，说了算数的，黄侧重于省里一摊，刘侧重于市里一摊。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帮派）核心人物有：黄兆其、刘殷农、徐宝兴、涂晓雷、沈炳章和我。“四人帮”垮台后又吸收了李树林、吴福全参加了核心会议。黄刘仍然是帮派的“盟主”，说了算数的。

核心人物的活动据点，比较固定的是刘殷农选择的杨慰农家，其次是刘（殷农）的家，第三是黄兆其的家里，第四是何良泽家里。

（四）团市委马首良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的揭发交代

去年（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刘殷农为了篡党夺权的目的，组织帮派向党进攻，他亲自出马，一家一户的串连，向行帮兄弟表明说：“一九七五年贯彻省委26号文件，搞反派性，搞得很凶，压力很大。大家当时都没有经验，既上纲上线地交了自己的问题，也揭发了我的问题，我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怪责大家，我们共同吸取教训。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要起来战斗，但方法上不能再重复批林批孔运动中公开组织战斗队的做法，要各自为战，村自为战，写大字报都以个人名义写，当然也要组织几个人，经常分析研究情况，但这些人越少越好。”在刘的串联鼓动下，批林批孔期间的行帮组织又重新恢复了活动。这些行帮恢复活动以后，刘殷农的指挥方法是：一是他亲自干，直接找人和亲自串联部署，这些均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如同涂晓雷、徐宝兴、张奎林、李树林等人，还有人民日报记者，这些内容是不向我们透露的。二是为了减少他的目标，凡昆明市范围内来找他串联的，或一般性问题的反映，他都推到曹光祥处，由曹光祥接待，事后向他报告。三是抓住我们四个人（即曹光祥、王云仙、王海全和我），为他当参谋助手，并贯彻执行他的意图。

（五）市妇联王云仙的揭发交代（节录）

（一九）七五年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的过程中，中央及省、市委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在北京曾向中央写过检讨，这是风头上认输，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他们就翻脸不认账，重新纠集帮派，变换手法，更加狡猾，猖狂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刘殷农鼓动我们说：“我有如象小鸡一样被人家无声无息地整死，不如下决心大干一场，在战场上战死”。号召我们起来和“党内走资派、复辟派”斗争。他还说：“要总结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训，要学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但不能不要几个人在一起研究研究。”于是他就组织曹光祥、马首良、王海全、王云仙等五个人，形（成）为刘殷农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核心和参谋班子，指挥昆明市的篡党夺权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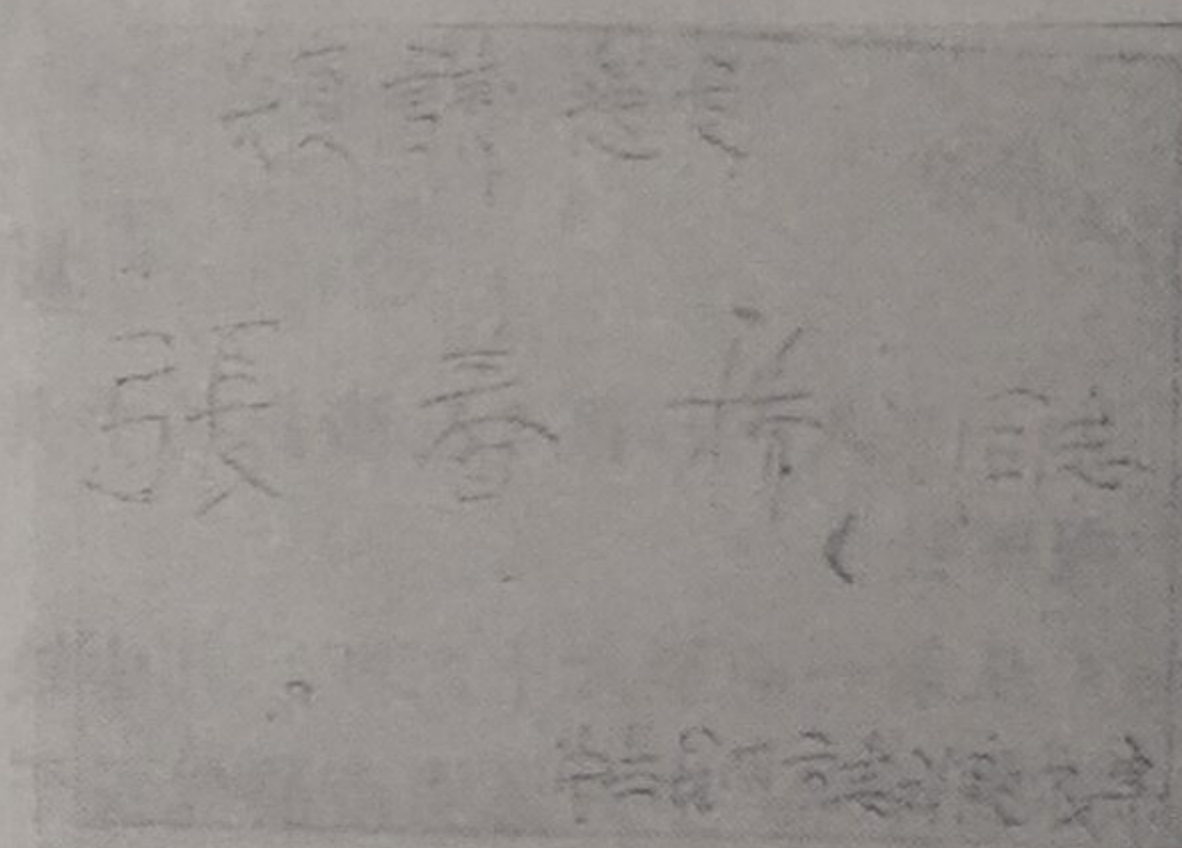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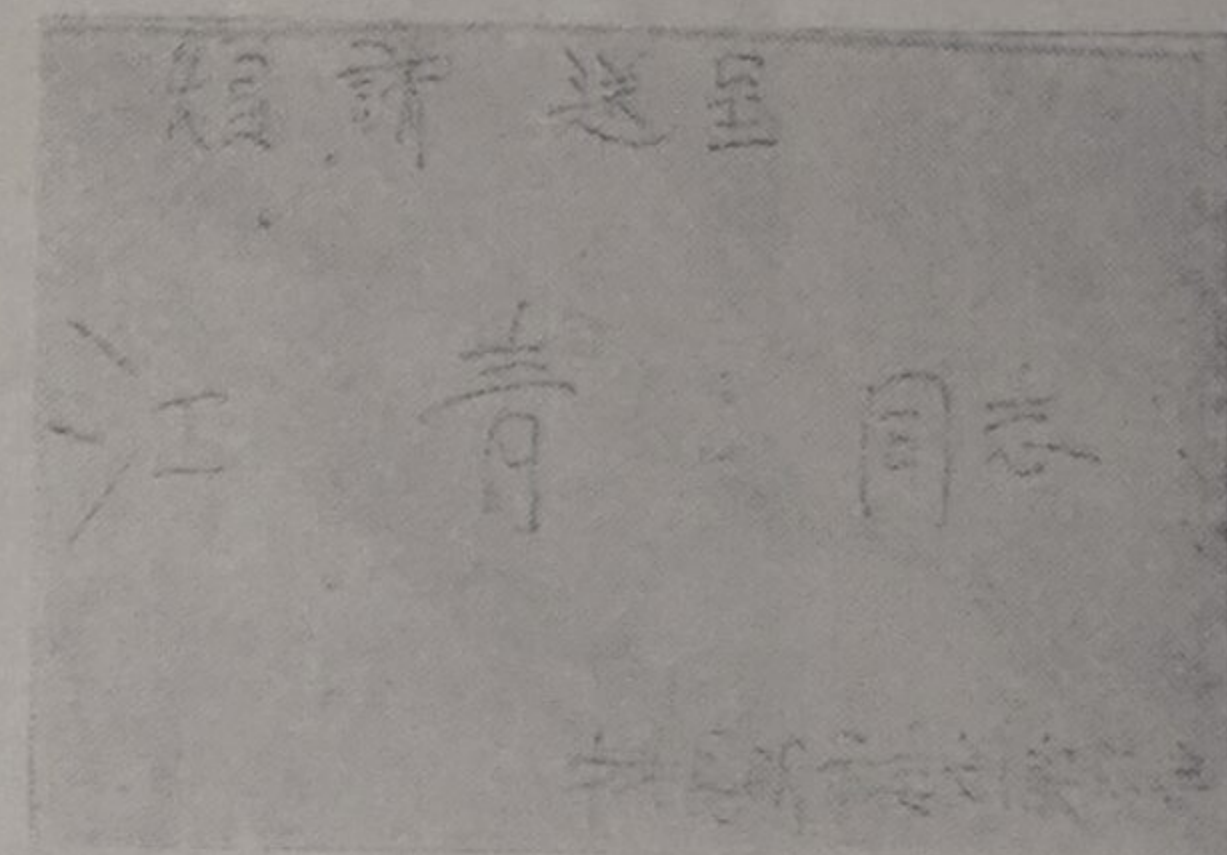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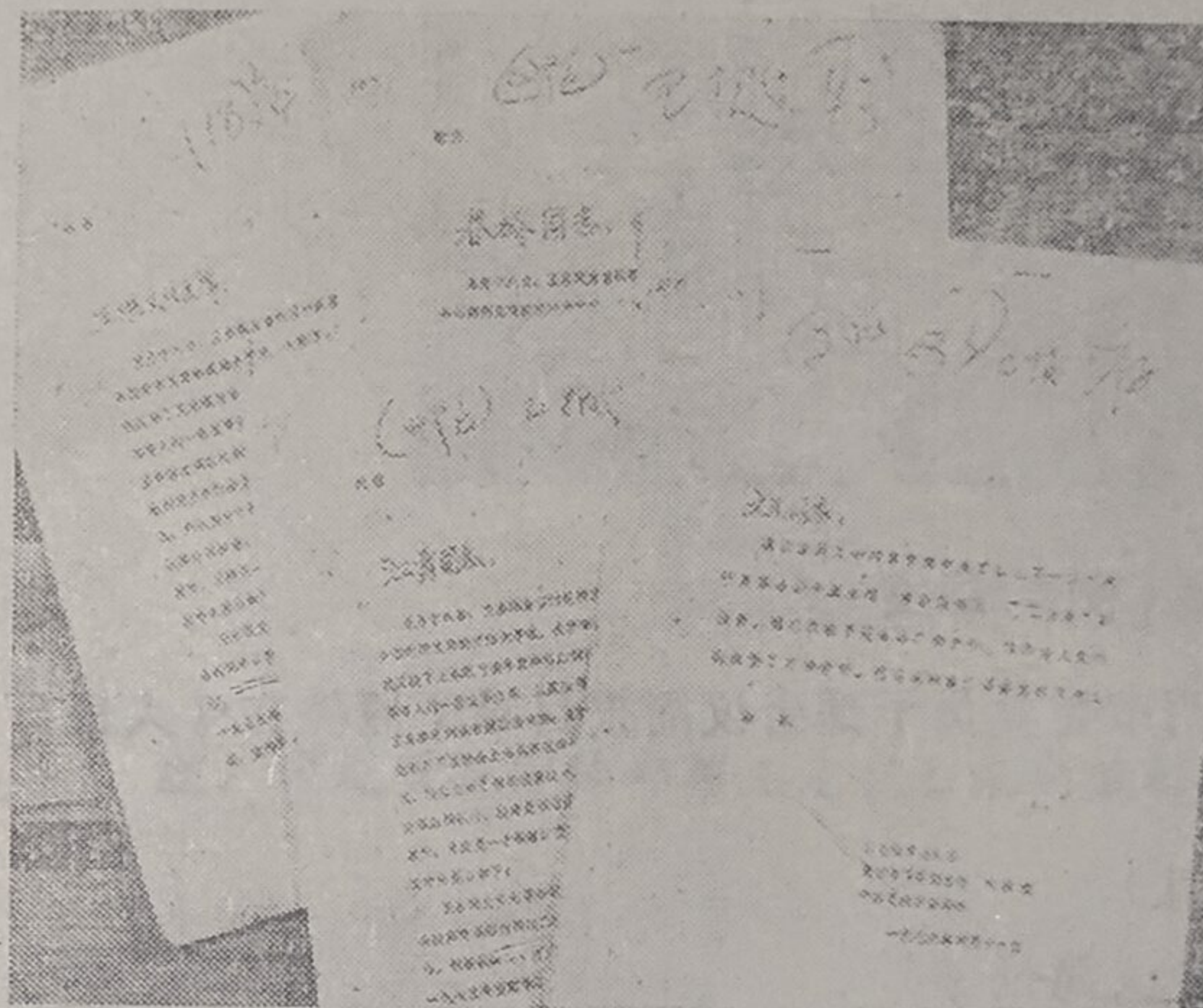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捏造事实，私整各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向“四人帮”告黑状，领取黑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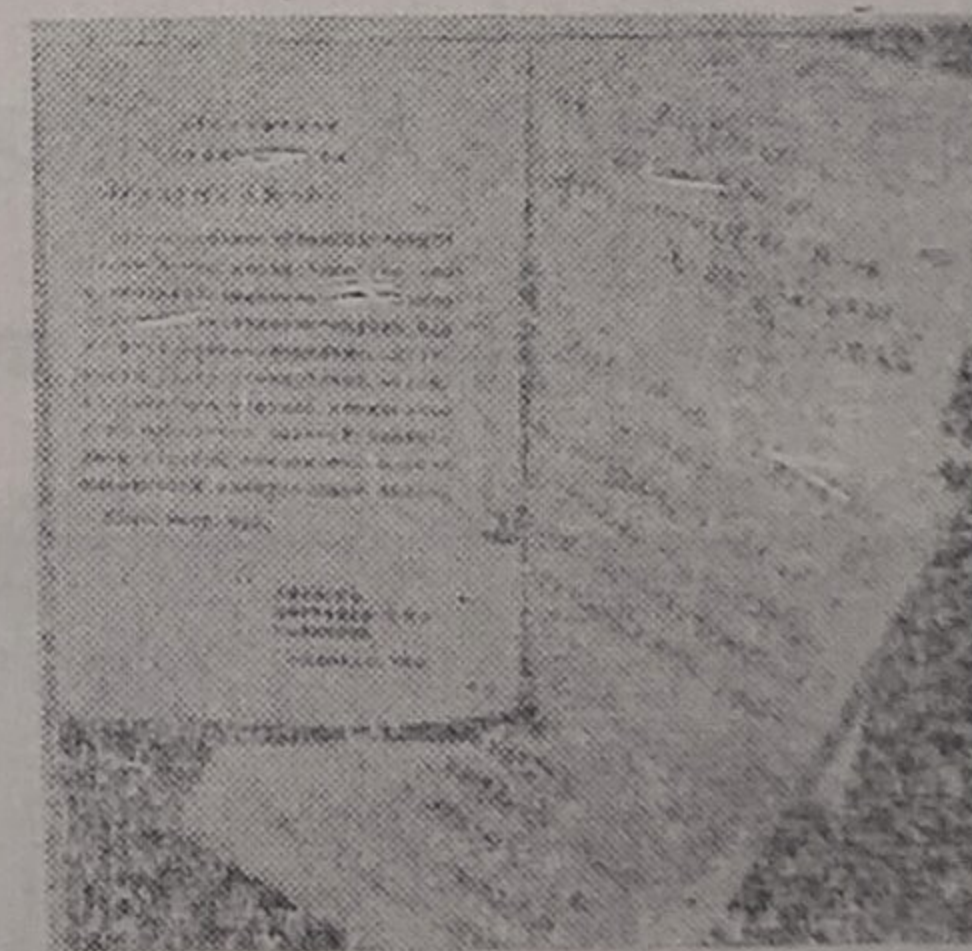
刘殷农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网罗了一批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笔杆子”，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仅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间，就炮制了数十份诬告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向“四人帮”告黑状，领取黑旨意，加紧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一、刘殷农送给“四人帮”及其死党的黑材料

(一) 中央办公厅查获的刘殷农送给王张江姚的黑材料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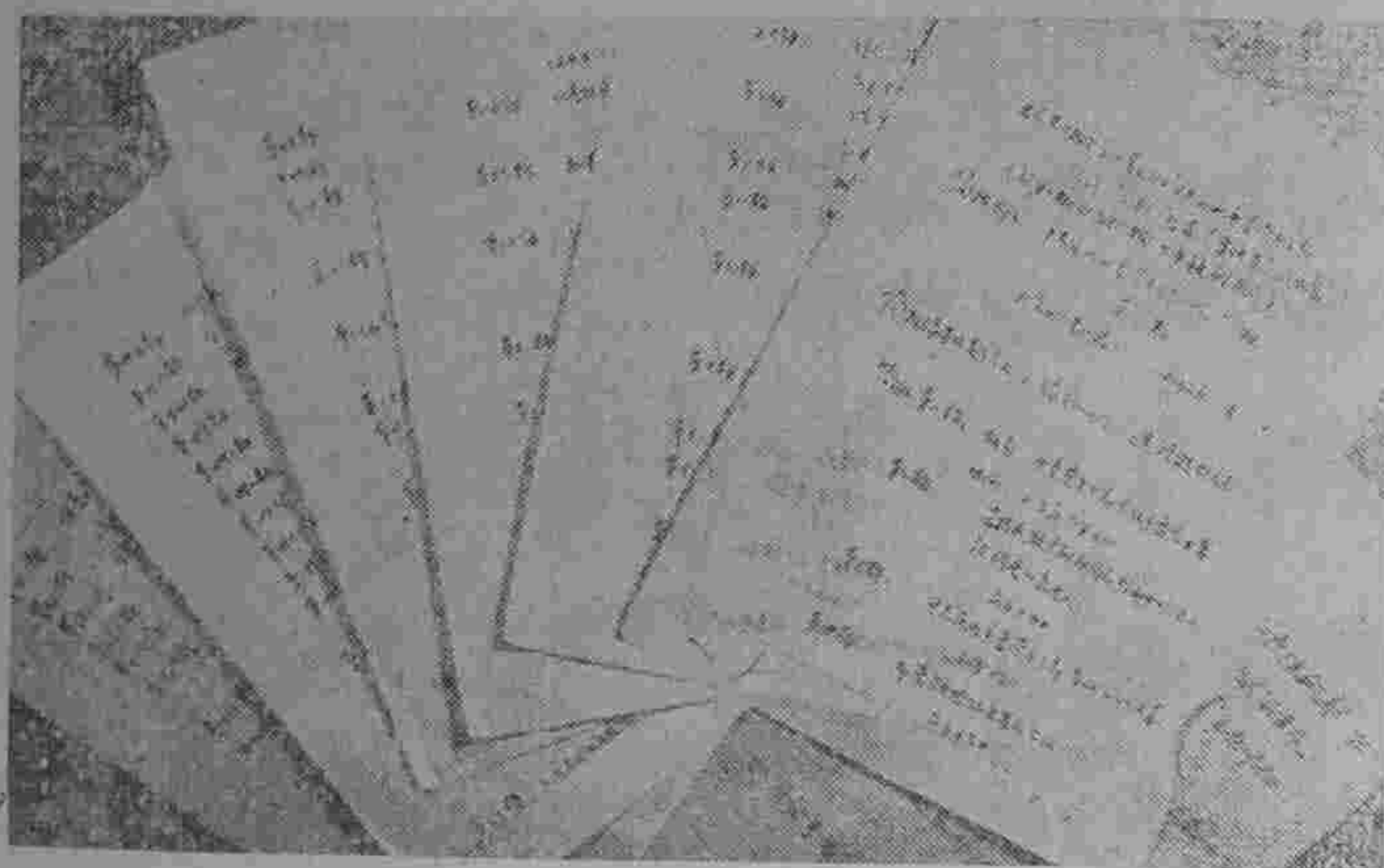
(二) 刘殷农送给“四人帮”的余党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及吴炜煜的黑材料(抄件)的影印件



(三) 清华大学清查小组查获的刘殷农送交“四人帮”黑据点的材料

- 1、市委关于纠正右倾翻案风中有关错误的意见(讨论稿)；
- 2、刘殷农写的交“清华大学政治部付主任吴炜煜同志转报中央”，及“清华大学政治部吴炜煜同志并转谢、迟二同志”的两份黑材料。

(四)《人民日报》社清出的刘殷农送给“四人邦”
派来云南的“记者”的材料目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节录)原文

《人民日报》社清出的中共昆明市委党员干部会议简报目录(原件在《人民日报》社)

(从第一期至六十二期,其中缺61期)

简报刊头:中共昆明市委党员干部会议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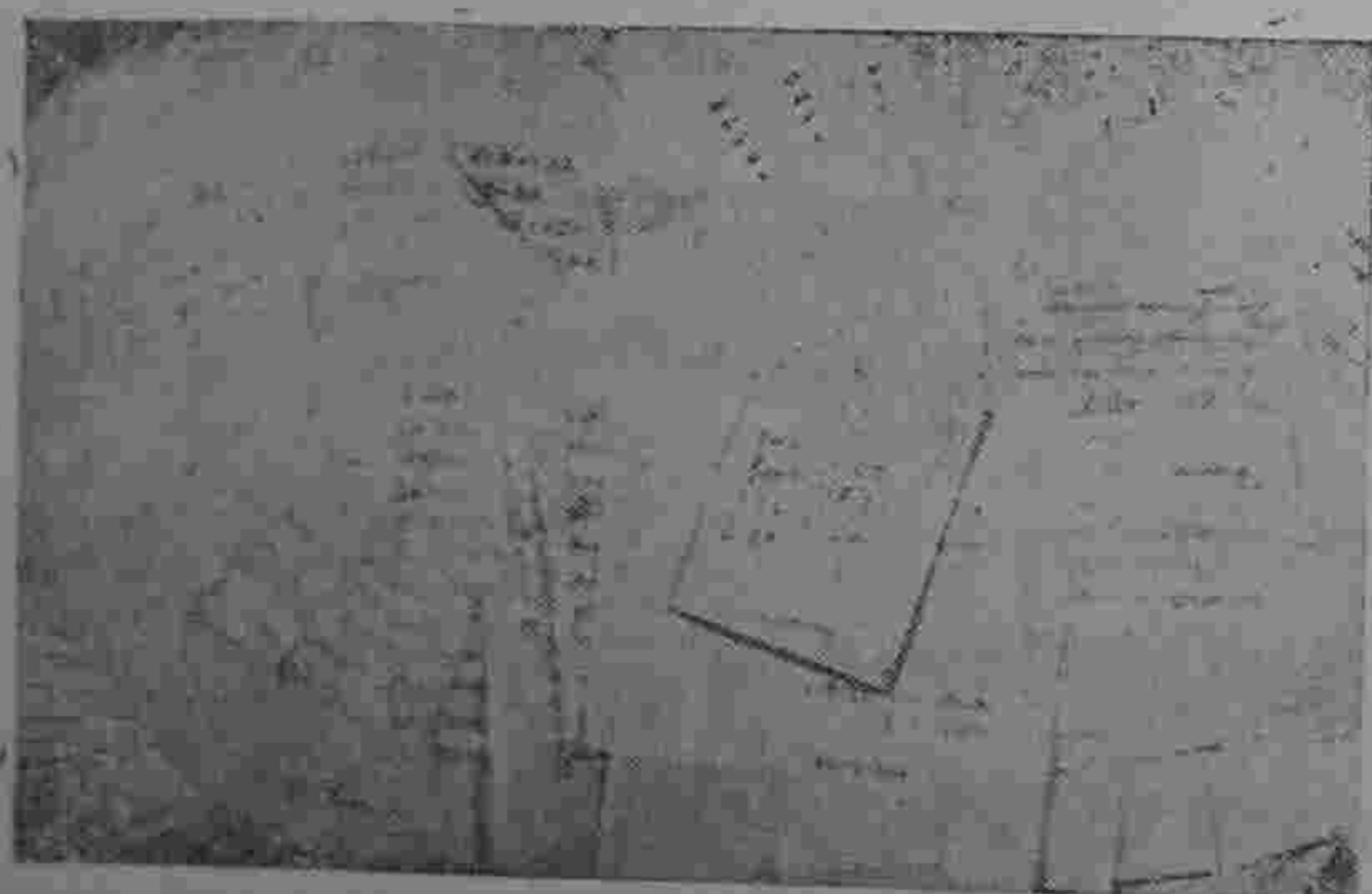
第 期

大会秘书处编印

一九七六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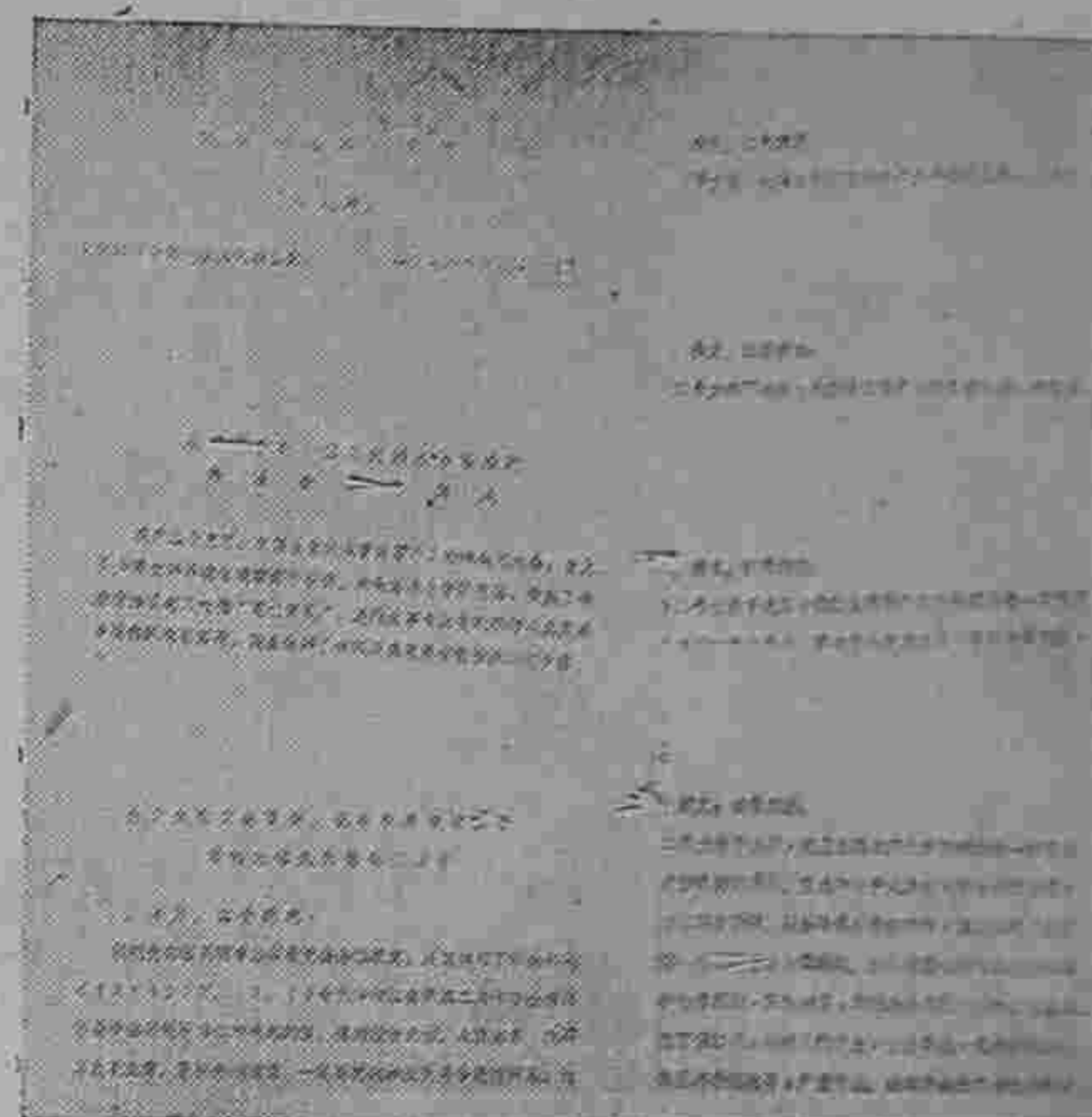
简报编号及发给人:编号:00013, 送刘殷农同志

(五)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等人炮制的攻击党政军负责
干部的部份黑材料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中查获的刘殷农转移的材料

(六)刘殷农指使邓玉元转送攻击省委领导同志的黑
材料(剩余部分)的影印件



注:这是省委宣传部邓玉元交出来的黑材料

(七)刘殷农通过“四人邦”御用班子《初澜》写作
组的张健农转送黑材料

张健农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交待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五月间,刘殷农和涂晓雷曾委托中国话剧团编导×××、××二人出差昆明返回北京之便,带了一包材料给我。其中,是刘殷农的两个黑材料。这两份材料,我通过文化部公文车送交清华大学政治部吴炜煜去了。

二、朱克家一九七六年二月向刘殷农传达“四人邦”的黑旨意

朱克家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交代(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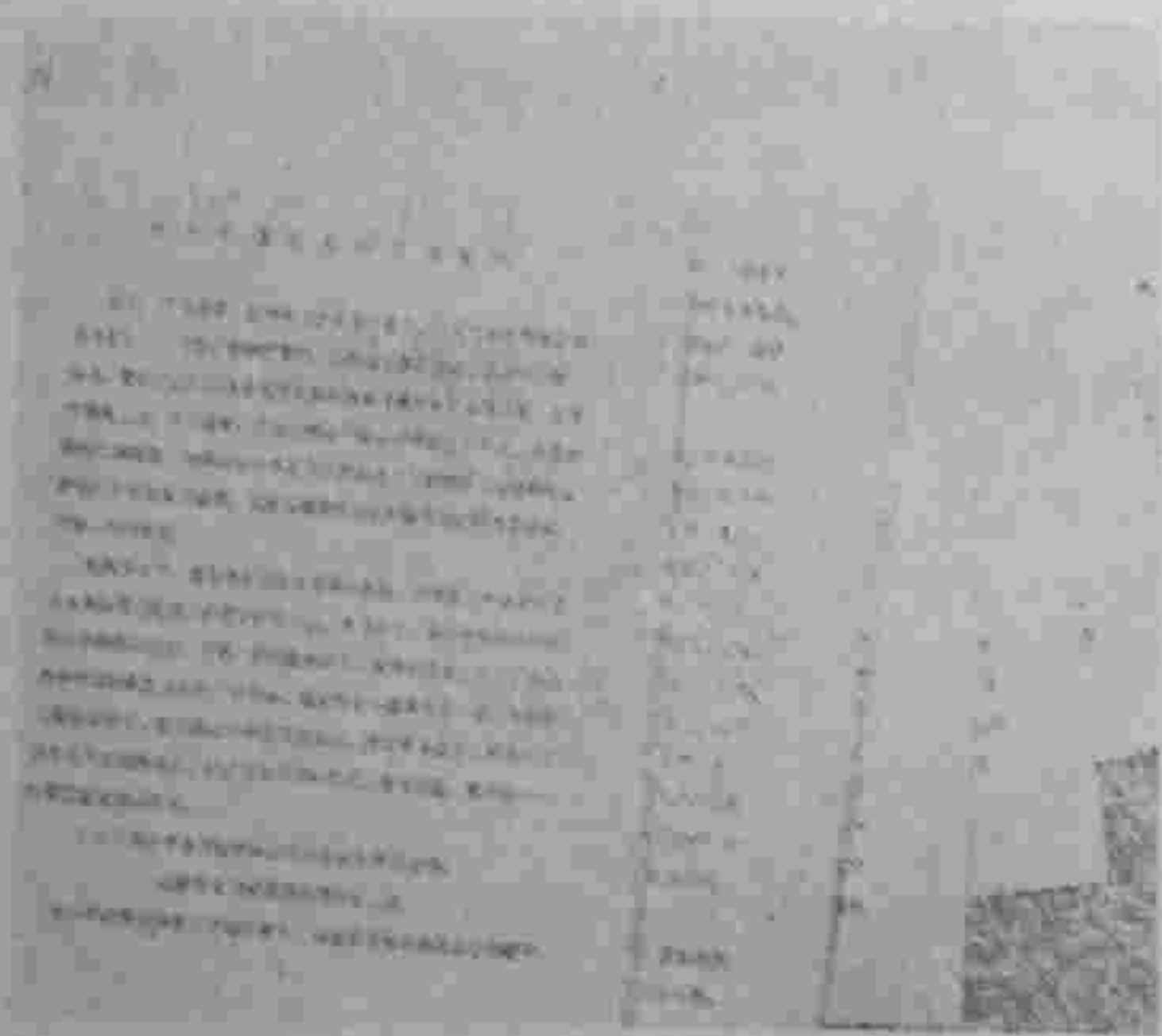
我从参加第二次打招呼会回来以后，给刘殷农透露几个要点，王洪文在云南组的讲话指出了云南的几个问题：①云南是问题多的五个省之一，是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②云南反派性错了，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整造反派；③云南打击新生力量是全国突出的；④去年云南主要是压了一派。刘听了之后很高兴。

三、黄、刘派涂晓雷、沈炳章等去北京向“四人邦”递送黑材料，领取黑旨意

(一) 涂晓雷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交代(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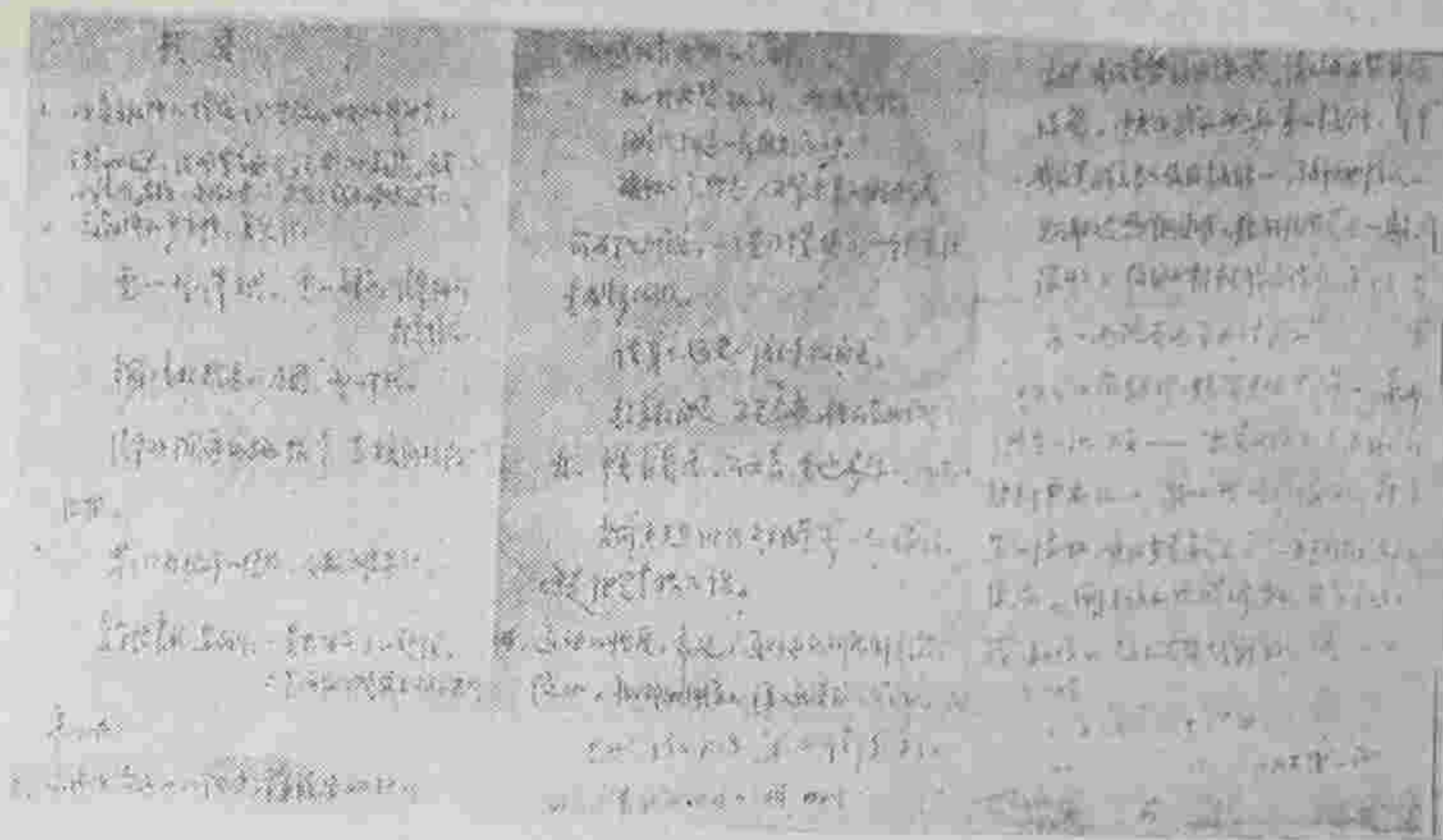
去年(一九七六)四月，我们上北京向“四人帮”的黑据点送材料，反映情况。我走的头一天(即四月十七日)去向刘殷农告辞，他交给我一份市里王云仙、马首良、曹光祥等人写的“关于未遂四·八事件的情况报告”。然后，我告诉刘说，我们走后如果有消息就打电话来，去年(一九七六)四月二十六日晚上，我们从北京打电话来刘殷农家里。是黄兆其接的，主要是我把去人民日报和清华大学的情况扼要地讲了一下，谈了吴炜煜鼓吹的文化革命体系问题，并说详细情况回来再讲。

(二) 涂晓雷向“四人邦”告黑状的材料影印件



注：这是从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中查获的刘殷农转移的材料

(三) 涂晓雷领回“四人邦”的黑旨意亲笔记录(节录)的影印件



注：这是涂晓雷转移到杨慰农住地的材料

影印件原文

提要

- 1、对来京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对此行动表示支持和欢迎。说明革命派斗争艺术的高涨。云南同志的斗争性很强，支持了我们，支持了全国，向你们学习。
- 2、云南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
贾——邓的第五代。贾的交待。清华批邓打贾情况。
全国工青妇推迟的原因，邓的干扰。
清华对全国运动了如指掌，直接向政治局汇报。
第二次打招呼的情况，人(民日)报与清华皆知。
复杂性表现在两个：一是省(委)26号文(件)的处理。二是两派问题使上(边)难下决心。
怎么办？
- 3、云南当前运动的阻力，除说写的几种外，他们感到有兴趣的是几个：
批林代替批邓，有典型性。
用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抵制运动。
破坏生产、供应，人为紧张来对抗运动。
所为(谓)阻力问题，一个是习惯势力，一个是来自党内资产阶级。
说穿了，还是一个领导权问题。
领导权问题，不光云南，但云南此问题突出，中央有考虑，不要急，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当前急于在组织上纠缠，容易犯错误。这是中央负责同志的话。

4、运动的性质，意义，要对运动的胜利充满信心。批邓如何深入，深入就要联系实际的问题。

当然，你们现在艺术水平都提高了。如这次来就比四川的高明。四川的……。当然，我们会替你们保密，你们也要替我们保密。中央要我们可与外来的接触，本来我们是愿意多与你们接触的，了解各地情况。见谢、迟恐怕困难，特别现在是五一期间。很忙。你们的材料我们保证送上去，当一个可靠的通讯员还是办得到的。

你们云南揭邓、揭贾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的话“只要……”就是从你们寄给我们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们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在党委会上念了，并摘报给政治局。刚才你们说感谢我们，应当是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的运动。

几个动态：

①四·五天安门事件在京反映。

②中央、主席对四·五事件及邓的反击情况。面对面批邓。

③五·一前后情况。

第三部分

疯狂推行“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华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是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四人邦”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篡改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刘殷农紧跟“四人邦”，炮制了大量黑文章，兜售“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叫嚣要用“暴力”来对付所谓的“走资派”，妄图整垮各级党委，实现其在中央由王张江姚“接班”，在地方要让所谓的“新生力量”“大上”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一、鼓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叫嚣暴力夺权

刘殷农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干着走资派的勾当。他恶毒攻击“掌握党和国家各级党政权力的掌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鼓吹党内斗争“既要在党委班子内部斗”，又要有“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妄图运用反革命的两手，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甚至狂妄叫嚣要用“暴力”来夺权。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刘殷农一九七六年七月炮制的《认真总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动文章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中查获的刘殷农转移的材料

反动文章（节录之一）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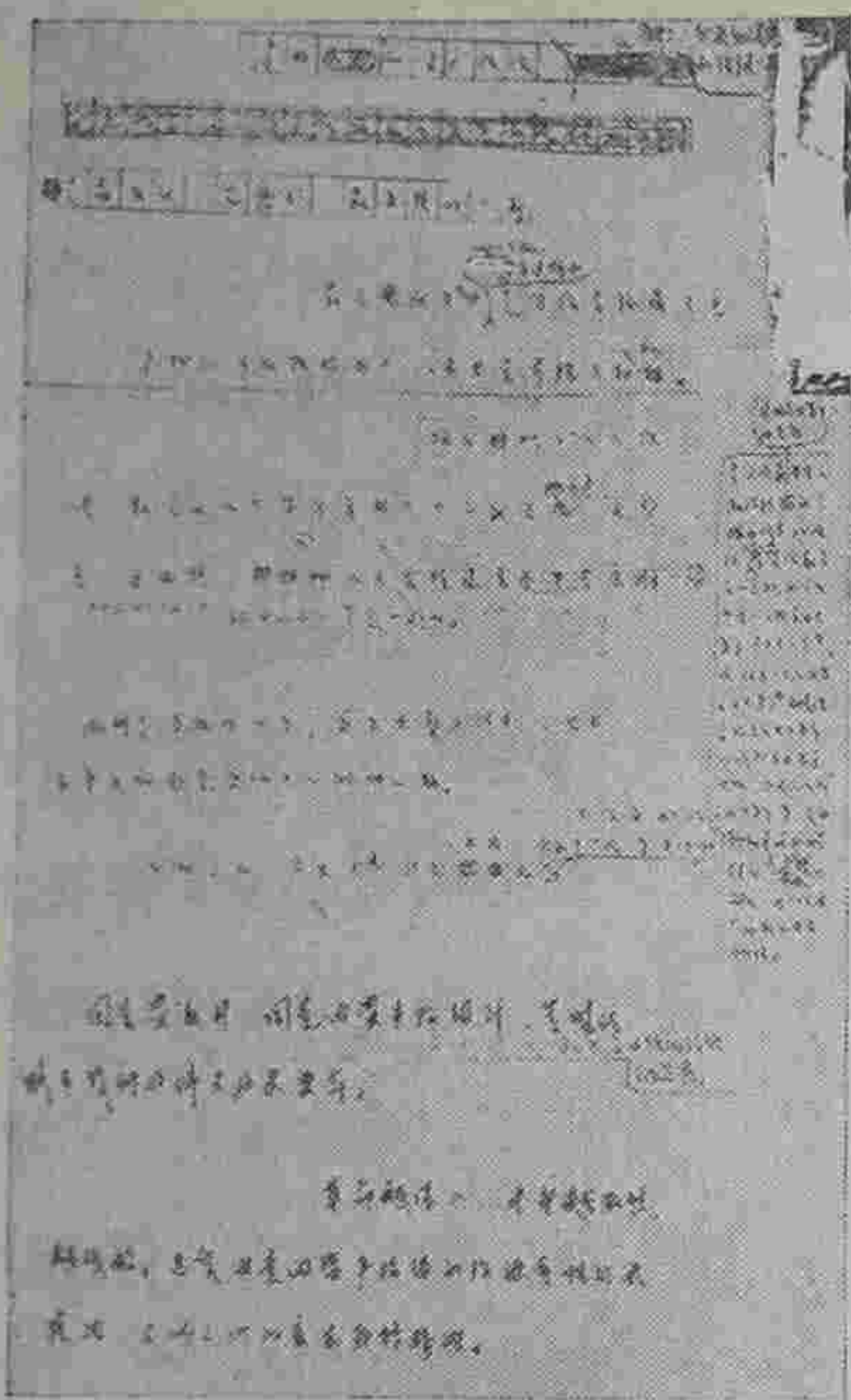
党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虽然他们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但这个阶级中的分子又都是掌握党和国家各级党政权力的掌权派。党内出现的资产阶级，从本质上来说它同解放前的资本家、官僚买办、贪官污吏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压迫剥削工人贫下中农的吸血鬼，但是形式上确同这些人有很大区别，这个阶级的分子不象解放前那种称呼什么老板、股东、经理、老爷、太太使人一听就知道，现在的称呼是书记、局长部长，以至象邓小平是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由这些人组成党内握有大权的资产阶级，他们的顽固性，就远远胜过老的资产阶级千百倍。

国内的阶级关系随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党内出现了一个与工人、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要前进，而党内的资产阶级则拚死反对，这样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就突出出来了。

走资派确实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

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打着红旗反红旗，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可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拚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起修正主义路线来特别方便和容易，确实比资本家还厉害。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决定了党内走资派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欺骗性，凶残性，顽固性，由于他们代表着腐朽没落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尖锐对立的，同时也是十分孤立的，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的具有虚弱性。

反动文章（节录之二）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党内的资产阶级，同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一样，是最反动，最腐朽，最没落的一帮。

最危险就在于象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是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而且是掌握大权的。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较之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就更迅速，更果敢，更凶残，同胡汉三回到柳溪乡所干的那一套是完全一样的。

同走资派斗争，首先要善于识别，尤其要善于识别走资派中的挂帅人物。

不仅能够识别地方的，而且可以识别中央的。识别走资派，第一，看路线，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就是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第二，看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走资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走的走资派，没有一个不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第三，看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走资派必然镇压群众，对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同走资派斗、同党内资产阶级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历史注定了要由我们给他们掘墓，要由我们给他们送丧。

革命越深入，斗争越激烈，越残酷，这是由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反动文章（节录之三）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同走资派的斗争既要在战略上藐视他们，他们是纸老虎，又要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因为他们手中有权，还是真老虎、铁老虎。敢于斗争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硬骨头精神，既敢于在正常的情况下开展斗争，又要敢于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斗争，走资派走多长时间，我们就同他斗争多长时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历史是无情的，我们充分相信这些走资派是腐朽、没落、衰败、垂死的阶级。

由于我们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就必然同走资派处于尖锐对立的斗争状态中，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和走资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党内斗争，党委班子内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一方面要学会在党委班子内开展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党内斗争如果离开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党委班子内的斗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同走资派作斗争，既要考虑在正常情况下的斗争，更要考虑非正常情况下的斗争，去年邓小平，假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疯狂的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攻倒算，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干部受镇压和迫害，革命群众虽有反抗，但由于走资派对革命派采取突然袭击，分割包围，各个击破，革命派形不成力量，扭转不了局面。这一惨痛的教训是应当吸取和总结的。走资派复辟过来时，革命群众只有组织起来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果走资派采用暴力镇压，革命派就要用革命的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

二、阴谋篡夺省、市委领导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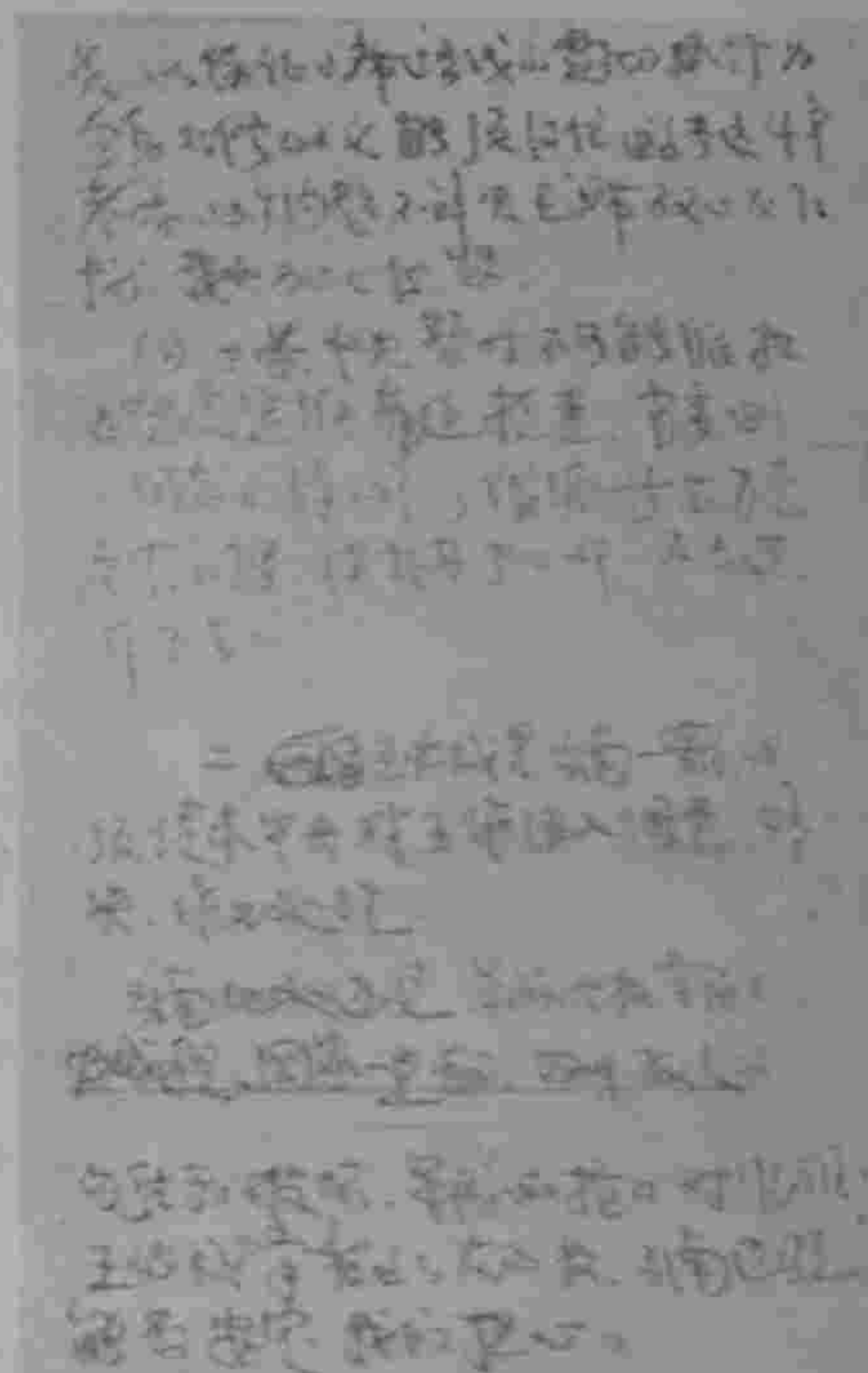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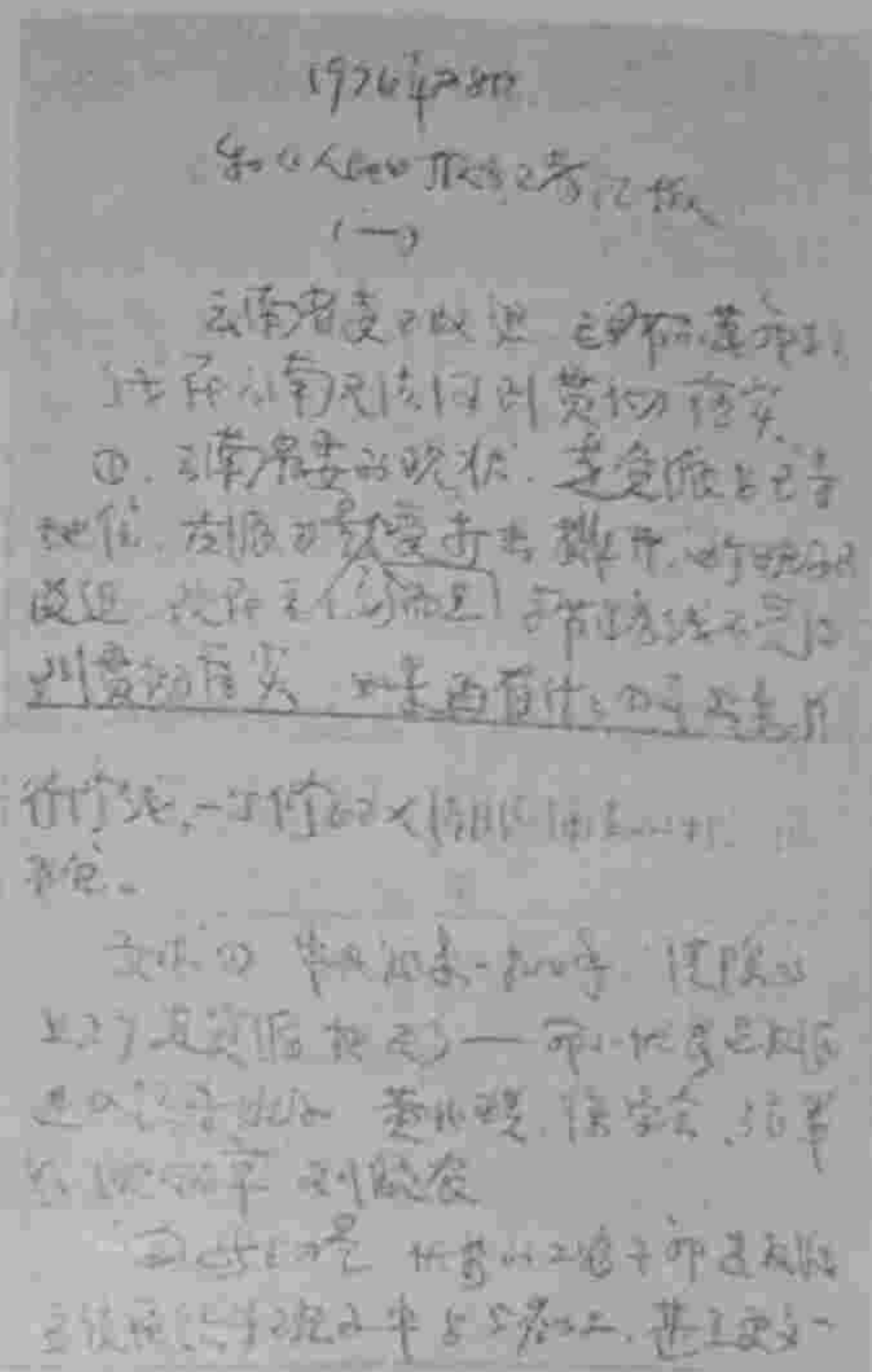
很早就妄图“获得权力”的刘殷农，为了配合“四人邦”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需要，他竭力为“四人邦”篡权效劳，而且手伸得很长，疯狂地为邦派弟兄抢权“创造条件”。他自己更是野心勃勃，一九七四年公开叫嚷要当市委书记，一九七六年更加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 张奎林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四)八月一日，我们在西山华亭寺开了一次会。参加这次会的有：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许少先、谈子文、段××、刘××、我和徐宝兴以及×××的大儿子。会议议论了外地造反派的使用纳新情况，李树林、谈子文、徐宝兴和我分别介绍了上海、郑州、浙江的情况，谈到浙江增补了两个造反派，一个为省委书记，一个为常委。大家听了很带劲。谈子文讲，我们云南造反派就没有很好解决，象老黄这样好的造反派头头，还只能参加省委常委工作，老刘也只能进市委常委，还得要斗，斗出个局面来，无论如何把老黄(兆其)斗到省委书记班子中去，把老刘(殷农)斗到市委书记班子中去。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有了样板，下面的问题才好解决。大家同意谈子文的看法。与会者还建议黄、刘向周政委反映我们的看法。另外，会上研究了各单位造反派纳新、使用问题，确定了一个指导思想：有条件的地方积极争取解决，没有条件的地方，经过斗争创造条件解决。

(二) 昆明市教育局程地超的揭发交代(节录)

(一九七四年)有一次郭少川到(市委工农干部)读书班，刘殷农也来了，当郭讲到我们的老中青没有搞好，对造反派的看法，许多方面是不正确的。刘殷农先是假惺惺地说，我们造反派不是为个人争权的漂亮词句，而后说，如果决定我当市委副书记，我是当仁不让的。



注：这是省妇联从东川查获的包亚芳转移的材料

影印件原文

1976年(7月)28日

和《人民日报》记者汇报

一、云南省委不改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云南无法得到贯彻落实

①云南省委的现状，走资派占主导地位，左派力量弱而且受打击排斥，这个班子不改组，现在毛主席路线不受(能)得到贯彻落实，如果再有什么小平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一个修正主义潮流涌来的时候，顶不住。

要求①中央派来一把手，清除以上五个走资派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优秀造反派进入领导班子，黄兆其、徐学会(惠)、张翠芬、沈炳章、刘殷农。

②新生力量，优秀的工农干部造反派应该在领导班子中占50%以上，甚至更多一点，以保证主席路线的贯彻执行，为今后出修正主义能顶得住的长远斗争考虑，这个问题不解决，毛主席放心不下，我们也为此担愁。

③如果中央暂时不可能派，把这些走资派靠边检查，省委由××同志主持工作，增派新生力量充实加强，使我省批邓、反击进行下去。

二、王必成是云南一霸，必须请求中央对王作深入调查，解决，作出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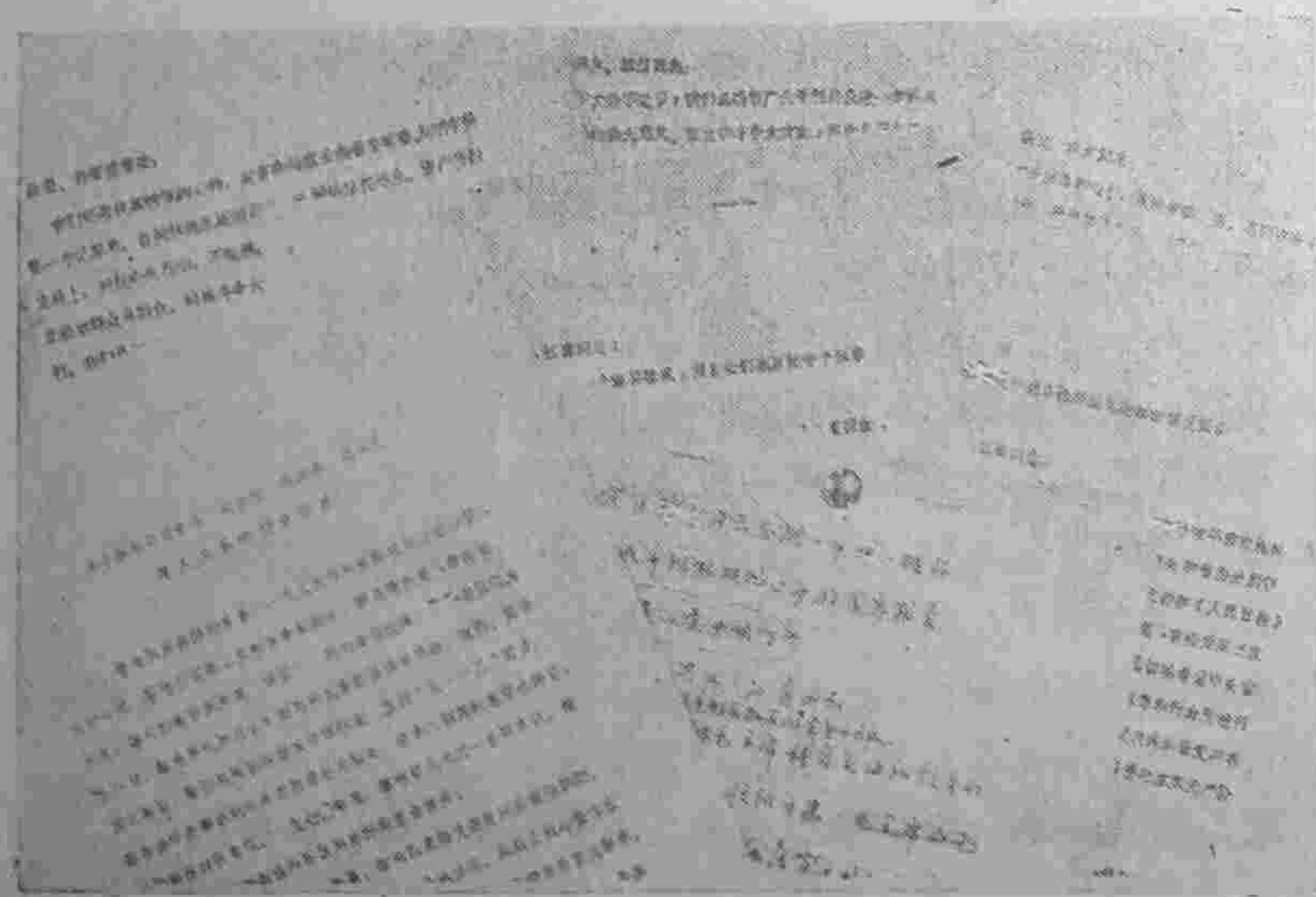
云南地处边疆，军队大权掌在王必成手里，国家一旦有事，内外敌人的勾结和破坏，军队的枪口对准谁？王必成掌着这么大的权，云南边疆能否安定我们担心。

三、一九七四年，追随“四人邦”批林批孔另搞一套

一九七四年，刘殷农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大掀“复辟势力代表”。对革命领导干部，他采取“能打倒就打倒，打不倒也要打跑、打残、搞臭”的反革命策略。他亲自策划、操纵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市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使大会成了资产阶级邦派体系大掀“复辟势力”的样板；网罗“笔杆子”，炮制攻击省、市委和军区党委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纠集武斗队伍，制造事端，挑起武斗，罢工罢市；策划地方和军队的几个干部“签名”上书，向“四人邦”告黑状；炮制“海口经验”，继续推行“划线站队”，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把昆明市委举办的马列主义理论讲座搞成宣传邦理的场所，把思想、理论、路线，统统搞乱；把市委工农干部读书班搞成培养邦派骨干的训练班，然后放虎归山，搞垮各级党委。搞乱了昆明，波及到全省。

(一) 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等人，连续抛出黑文，大掀所谓“复辟势力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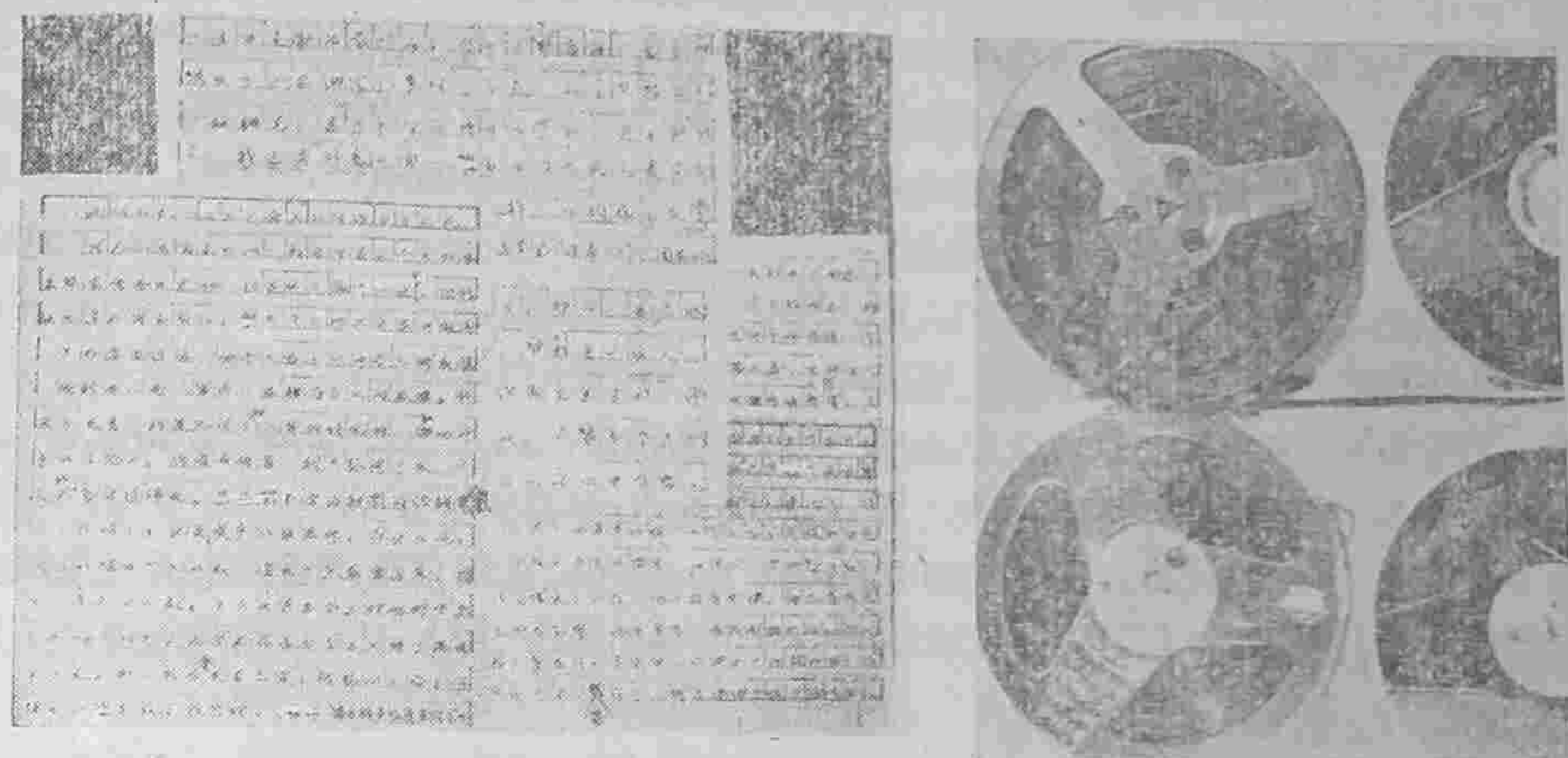
下面是部分黑文章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中查获的刘殷农转移的材料

(二) 刘殷农利用“四·二三”大会，掀起大掀“复辟势力”的高潮

1、刘殷农在“四·二三”大会上搞突然袭击的讲话的录音带及录音记录稿的影印件



2、刘殷农讲话录音记录稿(节录)

最近你含沙射影的给我戴了一顶帽子，就是资产阶级派性。在发言之前，我想问问你，“我揭发你算不算派性？”在三月中旬的时候，我和市级机关的马首良、××、王汉生、曹光祥在一起扯过，觉得你最近讲了些屁话，应该批判他一下。你大讲，现在市革委机关有五个人要夺市委的权。说我刘殷农组织了一邦人要整你。老实讲，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还没有下决心跟你斗。但是你讲了这句话以后，我现在是下定决心跟你斗。

3、曹光祥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的揭发交代(节录)

一九七四年四月机关党委向市委写报告，要求召开机关干部批林批孔大会，为了促成市委对这次会议的批准，刘布置我们贴了配合性的大标语。刘又告诉我们，各局也是市级机关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要各局参加？刘叫我们贴大标语要求扩大，同时还组织了许少先、王兴武、金国荣、靳全新、曹光祥、胡守贞、王海全、汪多闻、项兆斌等十多人去向市委施加压力，冲击常委会。刘又召集我们研究，积极准备发言材料，定了王海全、胡守贞、靳全新、安朗、曹光祥在会上发言，又叫王海全通知汪多闻准备一个材料代表一商局发言，并说：要尽量通过核心小组或革委会，按合法手续报名给办公室。

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刘召集我们检查发言的准备情况，都说准备好了。

“4·23”大会，上午发言按排列顺序进行。中午，大家集中到刘家里，刘说上午的会开得很好，下午的会要加点温。下午会议进行中，刘殷农突然上去发言。刘讲完后，我就急忙上去补充“五人夺权小组”的问题，晚上，大家又集中到刘家里，纷纷议论开了一个成功的大会。刘叫没有发言的人继续准备，以后还要开。

（三）利用马列主义理论讲座，搞乱理论、路线是非，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的揭发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我市以刘殷农为首的资产阶级邦派势力，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于是拉邦结伙，抱成一团，接过革命的口号，掀起了抓所谓“复辟势力”，把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的高潮。还利用马列讲座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邦派骨干王海全秉承刘殷农等人的黑旨意，利用他窃据的理论科科长职权，叫嚣：“我们就是要将讲座当作同复辟势力作斗争的战场。”在讲课时，他借口理论联系实际，多次公开点名诬蔑攻击省、市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蓄意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致谬论百出，流毒全市。甚至狂叫：“我们的讲座就是要讲得他几家欢乐几家愁。”王海全曾向刘殷农邀功请赏说：“我的一堂讲课，比几十张大字报起作用。”马上得到刘殷农的赞赏和支持。

一九七六年更是变本加厉地宣扬“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胡说：“民主派变为走资派是客观规律”，什么“走资派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层人，上有挂帅人物，下有兵马将校”，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还乡团”。

由于以刘殷农为首的邦派，利用马列讲座鼓吹“四人邦”的极右路线，结果搞乱了理论是非，为搞乱全市起了鸣锣开道和推波助浪的作用。

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

（四）炮制“海口经验”，大揪所谓“复辟势力代表”

中共昆明市委工交政治部的揭发

一九七四年初，省、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提出要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以刘殷农为头目的资产阶级邦派，为了对抗中央的指示，在三五六厂，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以解决干部三个正确对待为名，办了有三百五十多人参加的干部学习班。学习班自始至终是按照刘殷农等人的旨意进行的，它的指导思想是巩固“划线站队”的既得利益，继续推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篡党夺权为目的。五月二十一日，刘殷农为了掩盖他的罪恶阴谋，借合法的组形式要市委工交政治部向市委写报告批准召开海口会议。在刘殷农的上下串通，前市委负责人郭少川的积极支持下，于五月二十七日召开了所谓的海口经验交流会。为了扩大会议的影响，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策划以省、市联合召开为名，通知一些省、市负责同志到会。参加会议的，除市属工交、基建，省属工交十

六个局外，工业集中的曲靖地委，东川市委等地区的负责同志参加，在刘殷农的策划授意下，与会议无关的市委工农读书班学员也邀到会上，大量散发他们妄图打倒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掀起一股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妖风。为了使这个“经验”披上合法的外衣，要省市委全盘接受这个黑经验，刘殷农等人以邦代党，以邦压党，在会议《纪要》中强行写道：“出席会议的市属单位，对市委上段领导运动不力的错误纷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强烈要求市委常委要带头学好三五六厂党委的经验，这些意见都是很好的，市委表示接受。”刘殷农在《纪要》稿上批：“如果没有这个态度，我觉得不好。”刘殷农及其一伙，为了使这个黑经验流毒全省，与报社邦派勾结，于六月十五日在《云南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这个“经验”，结果这个黑经验传到那里，那里的党组织就被搞瘫痪，生产被搞乱，他们的邦兄弟就拿着这个旨意到处登台表演，向党伸手要官要权。

刘殷农及其一伙为了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在时隔一个半月之后，又于八月中旬召开所谓第二次海口经验交流会，着重交流夺权的经验。他们在“经验”中鼓吹：“根据运动发展情况，在组织形式上，大多召开常委扩大会，多吸收一些‘青年’同志参加，欢迎群众当‘炮手’，不要仙女唱颂歌。”会议之后，从上到下名目繁多的夺权、篡权活动纷纷出笼，例如什么常委扩大会，参加常委工作，列席党委会议，口头同意参加核心小组，主持党委工作等等。总之，就是要把他们的邦兄弟拉进各级党的领导班子中来。

中共昆明市委工交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五）罢工罢市，搞乱昆明

中共昆明市一商业局核心小组揭发

一九七四年六月，反革命分子许少先等人，秉承刘殷农“要用大字报铺天盖地，占领春城”的黑旨意，由反革命分子李连生和古安生带人前往复盖别人的大字报，以致发生殴斗，制造了“六·八”事件。

“六·八”事件后，黄、刘邦派即以此为借口，于六月十日，以所谓“商业职工被打伤”为幌子，胁迫商业系统部分群众（包括现在的二商业局、市供销社系统）罢工罢市，出动了近百辆生产用车，三分之二的商店关门停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经济上损失约二十余万元（不包括二商业局系统部分单位停业的损失）。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恶劣，一度搞得社会上人心惶惶，部分群众忙于抢购日用必需品，坏人乘机大肆活动，谣言蜂起，把昆明市搞得乱哄哄的。这是刘殷农等人制造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公开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安定团结的严重政治事件，企图把形势搞乱，然后以“乱”求“变”，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

中共昆明市一商业局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七日

（六）利用工农干部读书班，培训资产阶级邦派骨干， 阴谋篡党夺权

马首良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的交代（节录）

一九七四年七月至十月底昆明办了一期所谓工农读书班，打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培养工农理论队伍的旗号，干着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

刘殷农策动办的工农读书班，是有他的险恶用心的，他的根本目的是用分期办工农读书班的形式，组织培训以他为首的邦派体系骨干分子，为其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效劳，他认为办读书班可以按照王洪文办的那个工农读书班的办法，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员可以列席市委的一些会议，参加市委重要文件的起草，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既知道上情，又明了下情，以便更好的“掌好权”，“用好权”。他还认为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为新干部上台扫清道路。

刘殷农对工农读书班从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和学员对象以及读书班的工作人员都进行了认真的策划。

读书班的指导思想：实质是培训以他（刘殷农）为首的邦派体系的骨干分子，用“四人帮”的反动理论武装这些骨干，以便篡党夺权。所谓“掌好权”，“用好权”，就是巩固已经篡夺的权利。

他反复强调学员要边学习边工作。所谓参加工作，就是参加市委的领导工作。实质上是以读书班为基地向市委夺权，以便巩固和扩大他在市委内所窃取的权利，扩大邦派势力在市委内的影响。

他强调要给学员灌输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其实质是要邦派弟兄树立长期进行篡党夺权，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级老干部思想。所谓巩固成果，就是巩固已篡夺的权利。

教学内容就是围绕上述指导思想，围绕邦派反动思想体系进行教学。

学员对象的挑选，刘殷农说要把那些（所谓）敢于作斗争的人集中到读书班。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假惺惺地提了一些不同观点的同志参加读书班作为陪衬，但领导权则牢牢控制在以他为首的邦派骨干分子手中。我作为邦派骨干分子担任了读书班临时党支部书记，王海全、王云仙、胡守贞是支委，一切要听从刘殷农的号召。

刘殷农当时还十分露骨地说：“如果上级党委要我当市委书记，我一定当仁不让。”充分暴露了他篡党夺权的野心。

在读书班期间冲击常委会，冲击县书会，事先我们都向他作过汇报，他完全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他在市委常委内才有更大的发言权。

在读书班期间，我们邦派的成员杨树作为工作人员在读书班工作，其实专门从事邦派反动传单、材料的打印、传递工作。

四、一九七六年，采取以市逼省，以省 压市的反革命策略，大乱云南，使 云南成为“重灾区”

一九七六年，刘殷农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把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公开对抗中央一九七六年四号、五号文件。首先，刘殷农组织并指挥其同伙，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攻击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攻击我省一九七五年的大好形势。冲击省委三月地书会议，炮制反革命电报，狂叫要“永远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和改组省委，接着又提出了“以市逼省，以省压市”的反革命策略。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到六月昆明市县、区、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达到了高峰。他们给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和群众扣上“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长、队长、团丁”、“保邓派”等帽子，顿时刮起了一股层层揪“走资派”，处处抓“还乡团”的妖风，搞乱了党的组织，搞乱了机关，搞乱了基层，冲击了工业、农业、商业，使云南成为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重灾区”。

(一) 刘殷农伙同朱克家、黄兆其等人，利用三月地书会议，竭力压省委向“四人帮”一边转弯

1、省委办公厅王达三同志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的揭发

去年(一九七六)三月，在省委召开的地书会上，朱、黄、刘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疯狂地进行捣乱破坏。三月七日，帮派骨干沈炳章带头冲击了地书会。三月八日下午，刘殷农找贾启允同志，以“提意见”为名，向贾施加压力，促贾向“四人帮”一边“转弯”。刘殷农说，昨天你的讲话很使人失望。省委不转弯，下面转不好，省委要做出榜样，拿出实际行动。现在的焦点集中在省委如何转弯，又集中在你身上，你对上段错误认识不足，调子太低。我诚恳希望你起带头作用，带头揭批，群众就会谅解。你七、八年没有工作了，我认为你老话多些。对错误的估价，省委没有决心，是受影响还是执行？在这个问题上打转转，会引起分歧。事实证明是执行了，要痛快干脆。不要再犹豫了。

2、刘殷农在三月地书会议上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副主席，攻击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

(1) 刘殷农在三月地书会议上发言稿(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老奸巨滑的走资派，在组织上更是心狠手毒。他们按照邓小平大整所谓“软、散、懒”的领导班子。

其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排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把那些热衷于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人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建设一个搞马克思主义是“软、散、懒”的，而搞修正主义是“硬、铁、敢”的领导班子，以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为复辟资本主义作组织上的准备。因此，他们以十倍疯狂，百倍仇恨，抡起反派性的大棒，拿出走资派的十八般武艺，对新干部和造反派进行打击报复，妄图置于死地而后快。

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从贯彻省委二十六号文件以来，他们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说他们贯彻二十六号文件后，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这完全是上欺中央，下骗群众。

因而贾启允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云南的反派性运动(注意：我这里说的是“运动”)应从根本上否定。

(2) 刘殷农在三月地书会上的发言简报(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邓小平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他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宋江，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梯也尔式的人物。他搞复辟的果敢和凶残不亚于那个二千三百年前被割了鼻子，闭门八年不出，一上台就车裂商鞅的贵族奴隶主公子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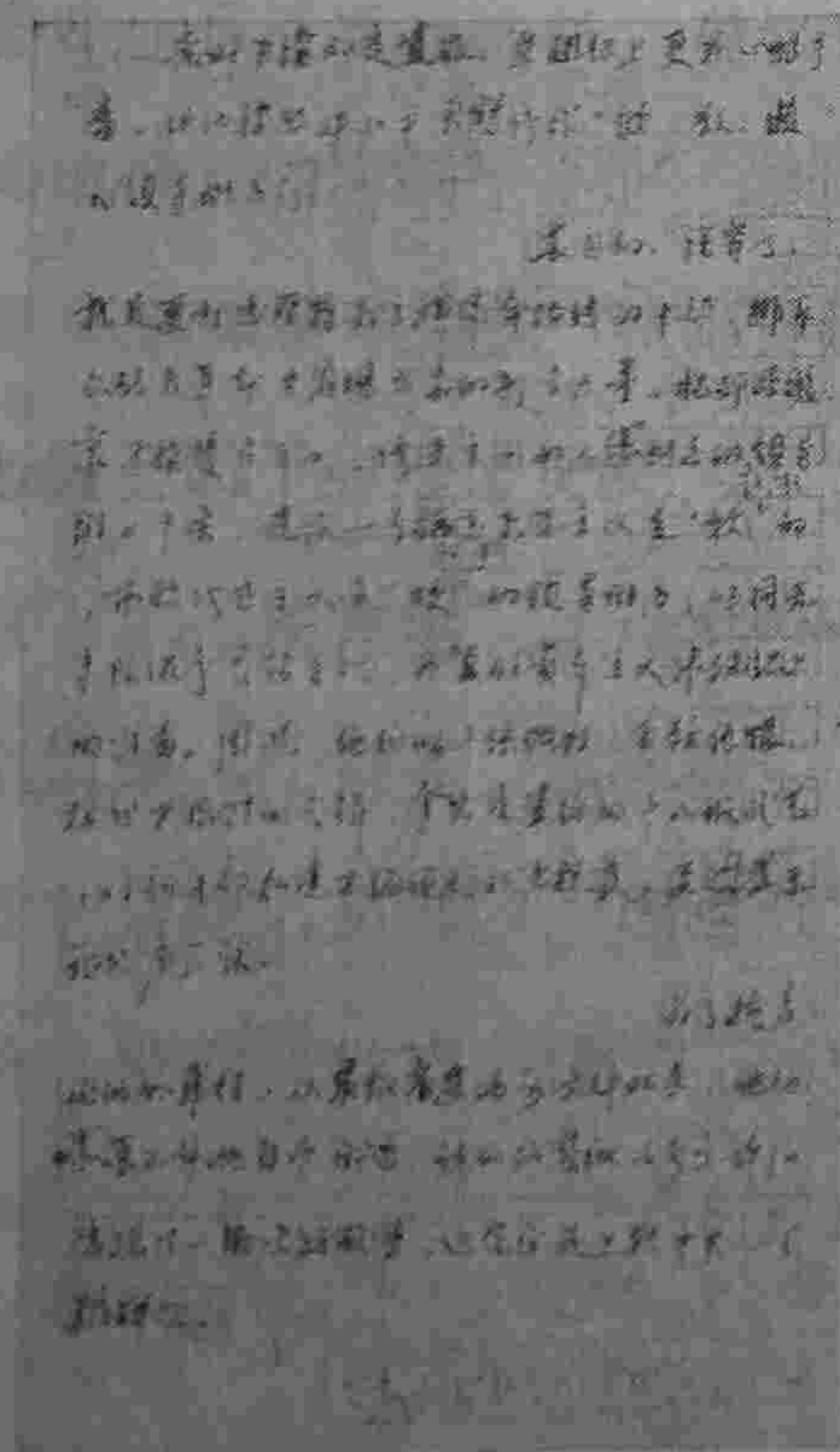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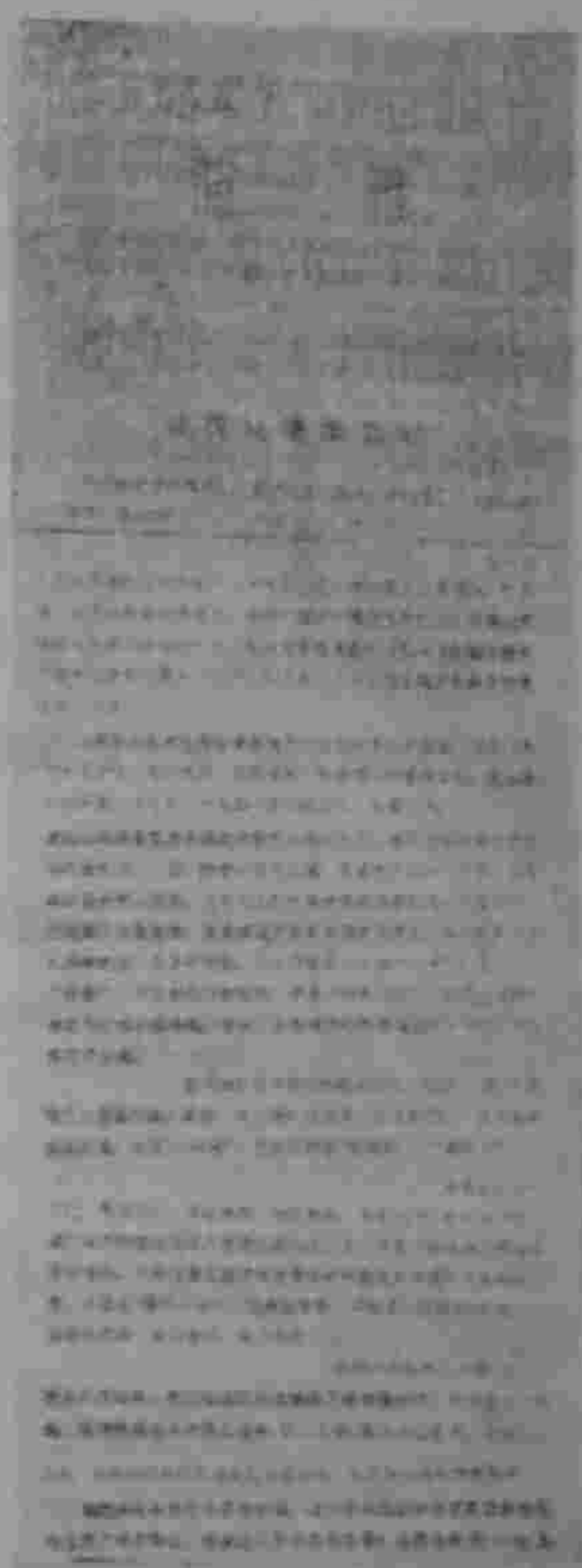
但是贾启允同志及省委其他几个人绝口不提走资派，却用尽气力大反派性，或作报告，或搞演说，或动用一切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大块文章，对派性不作阶级分析，无限上纲。

现在的问题是贾启允同志及省委其他几个人，他们是真的要反资产阶级派性吗？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反派性只是一个幌子，搞复辟才是本意。请问，为什么你们不反走资派的派性呢？走资派的派性就是中央指出的：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公害”，是全党的“大敌”，不反走资派的派性，才会“亡党亡国”，因而必须围歼的正是走资派的派性。这点，从昆明市的所谓反派性斗争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昆明市委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一面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大打出手，扫地出门；一面又借口落实政策，大搞“一风吹”，匆匆忙忙地“举逸民”、“请隐士”。

走资派们喜形于色，得意洋洋，奔走相告，弹冠相庆，肆无忌惮地充当“还乡团”，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猛扑过来。省、市委不问这些人的政治历史情况，不问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只要是“横下一条心，坚决搞复辟，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都安以要职，委以重任，掌握实权。

经这一大幅度的调整，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他们就迅速地组织起了积极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第二省委、第二市委、第二基层党委。这些人上台后，不肯改悔的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疯狂地大刮右倾翻案风。



(3) 昆明市委办公室魏汝昌同志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的揭发 (节录)

在去年(一九七六)三月省委地书会议上,刘殷农在小组会上有两次发言,攻击经毛主席、党中央审查同意的省委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他说:“这个文件主席看过,但是主席看过的是否都是主席批准的?”又说:“省委极不严肃,是强加给主席的”,“是省委用这个来压群众,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是欺负主席”等等。我们在整理他的发言简报时,曾向他提出,中央一九七五年十五号文件明确指出,省委二十六号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党中央审查同意的。但他仍然坚持说:“二十六号文件并未经毛主席批准”。他又攻击说:“省委讲贯彻二十六号文件取得很大成绩,这个估价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动性是幌子,复辟才是真意”。

3、刘殷农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地书会上亲自炮制的恶毒攻击 邓副主席和“改组”省委的电报稿(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面对着地书会议即将流产的局面,我们特紧急电报,恳求:

一、邓小平这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把他永远开除出党,实不足平民愤。同时,也使一些走资派还抱有幻想。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鉴于以贾启允同志为首的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忠实地接受并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在云南都大刮了右倾翻案风,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翻了案,算了账。严重的是

时至今日,他们还不愿切实的转弯,仍然在捂盖子,欺中央,压群众,靠他们来领导各级党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是信不过的,群众是不放心的。客观上他们也丧失了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因此,我们建议中央责成省委提名,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切实把运动领导起来。

(二) 刘殷农强迫市委召开县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以市逼省,进而搞乱全省

1、刘殷农纠集帮派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从昆明打开缺口

(1)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六月,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四人帮”余党刘殷农及其帮派,为了篡夺会议领导权,在参加会议的范围上,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千方百计把他们的帮派兄弟塞进会议。

去年(一九七六)三月,省委地书会议后,市委常委研究,按照一九七五年贯彻省委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时的会议规模,贯彻省委地书会议精神,即市委各部、委、办,市属各局,各县(区)委,中央、省属企业党委领导干部参加,约五百人。刘殷农为了控制、操纵会议,伙同前市委主要负责人,胁迫市委一再扩大会议范围。先提出扩大到省革委在昆的党员委员,市革委党员委员,省委在昆委员,市委委员参加会议,借此把他们的一些帮派骨干塞进会议;又强迫市委决定一九七五年贯彻省委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时被停职、免职、撤职和调离的一些人,都按原职参加会议;对于那些因有严重罪行和问题而被隔离审查,拘留审查的对象,千方百计否掉问题,塞进会议,如曹荣华、马存兴等人,刘殷农等借口他们是市革委委员,市委无权处理为理由,参加了这次会议,甚至威逼市委释放坏人许少先,也要把他塞进会议。就是这样,有的帮派人物还不能参加,刘殷农等又威逼市委决定,要把会议范围扩大到各县(区)、局,中央、省属企业革委会党员副主任,使这次会议人员越增越多,出席会议人员增加到八百五十人。刘殷农等人就是利用这种手段,使他们的帮派兄弟,大都得以参加会议,篡夺了市委党员干部会议的领导权。

刘殷农为控制会议工作班子,掌握会议工作情况,提出会议工作班子不能沿用前次会议的工作人员,趁此,把王海全等人塞进会议简报组,控制会议的简报和材料,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而应该参加会议的却不让参加,如省革委委员李能同志已报到,但不让参加会议。昆明煤机厂党委付书记、厂革委付主任李运保等同志也不让参加会议。

中共昆明市委组织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

(2) 王云仙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四月初,一天,在曹光祥家,刘殷农跟曹光祥、马首良、王海全、王云仙几个人说:“省委地书会议没有开好,黄兆其给我商量,能不能把昆明市的县书会议开好,开好了对全省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昆明是全省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所以,我想,一定要促市委尽快召开县书会议,方法可以找市委领导谈,写大字报促市委领导开,我在常委内部也促少川尽快地开。”以后,我们对召开这个会议进行了若干次的策划,有的是刘殷农亲自出面指挥我们干的,有些是他授意给曹光祥,由曹光祥组织我们干的。

(3) 马首良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交代(节录)

省委地书会不了了之后，刘殷农立即把主要精力转到市里，他对我们说：“省委地书会没有开好，但要促成市委开好县书会，通过开好市委县书会，去促省委转弯，揭发省委的问题，然后转过头来要求省委恢复地书会。”

刘殷农为了促成市委县书会的召开，他采取了：①找贾启允去鼓吹市委的有利条件，取得贾的支持，然后假贾之手，压市委要尽快召开。②布置行邦叫嚷要召开县书会，并叫行邦做好参加县书会的材料准备。③在市委常委内部做工作，如做郭少川的工作，促成作出召开县书会的决定。

此外，他还找我们四个人（曹光祥、王海全、马首良、王云仙）共同策划：①要把尽量多的新干部弄去开会，把到会人员的范围越搞越大。②要吸取省委地书会议工作班子完全为走资派所控制的教训，工作班子一定要有我们的人参加，王海全一定要力争进工作班子，控制简报。③会议必须开成一个市委转弯子的会，市委必须承认一九七五年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翻了案，算了账，打击迫害了新干部。④要揭发省委的问题。⑤要做出纠正右倾翻案错误的决定。

(4) 章世祖(原三百号信箱党委付书记)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七日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五月下旬有一天我去刘殷农家，正好(昆明机床厂)李积德、杨宏发也在。刘殷农对我们讲，市委县书会议一拖再拖。你们二个大厂有影响，到市委来造点舆论，要求立即召开县书会，要求市委转好弯子，贴点大标语，促使尽快开会，后天要开常委会，你们回去组织一下，明天来贴，贴在市委院子里。

(5) 王海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六月初，刘殷农又召集马首良、曹光祥、王云仙和我，就县书会议作过一次策划。

关于会议的主攻方向问题，刘殷农给我们分析了市委常委的情况。刘殷农说，重点是搞王士超、王捷三、穆俊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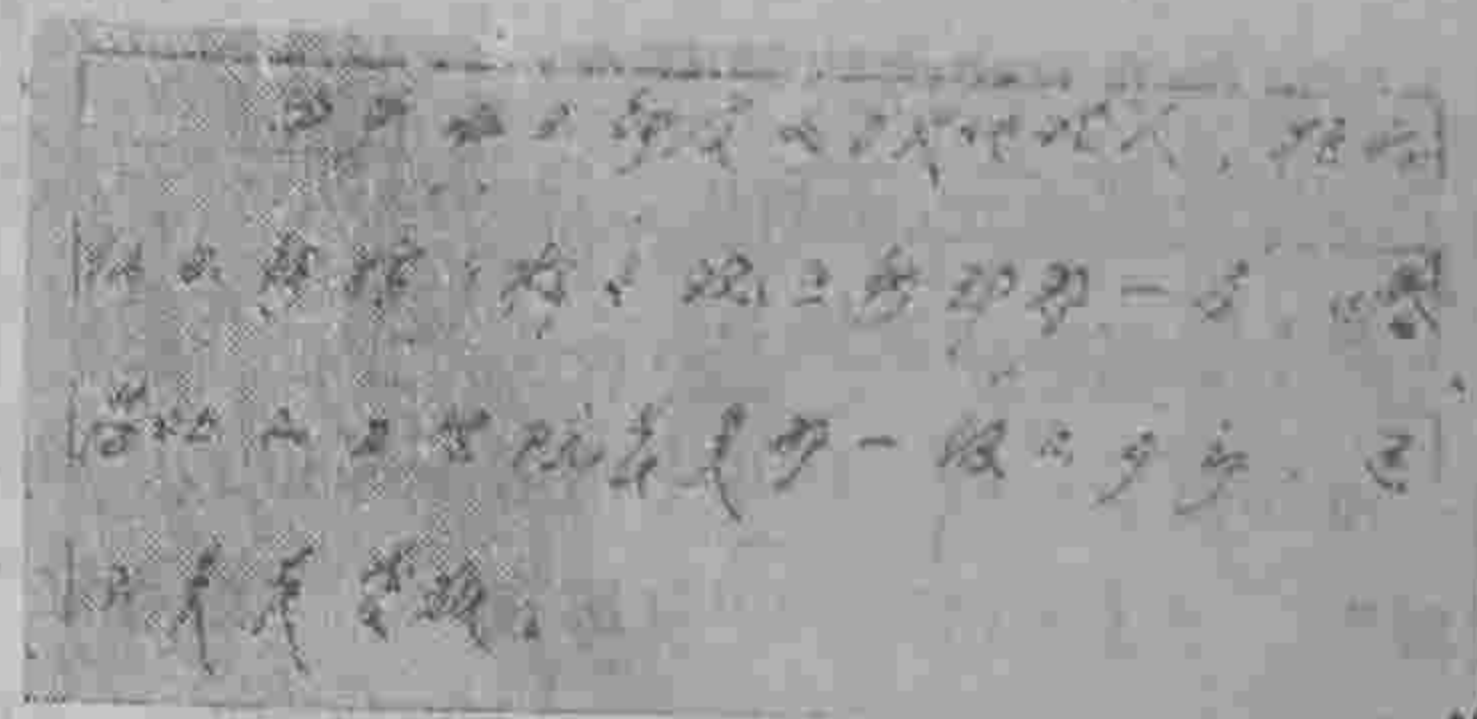
关于党干会要达到的现实目的，刘殷农说，通过这次会议，力求郭少川在会议上有个象样的检查，王士超也要到大会作检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个纠正错误的意见，这是要努力达到的最基本的两条。如果有条件争取从组织上解决一两个“走资派”、“还乡团”的问题。

2、刘殷农对抗中央，妄图打倒一大批革命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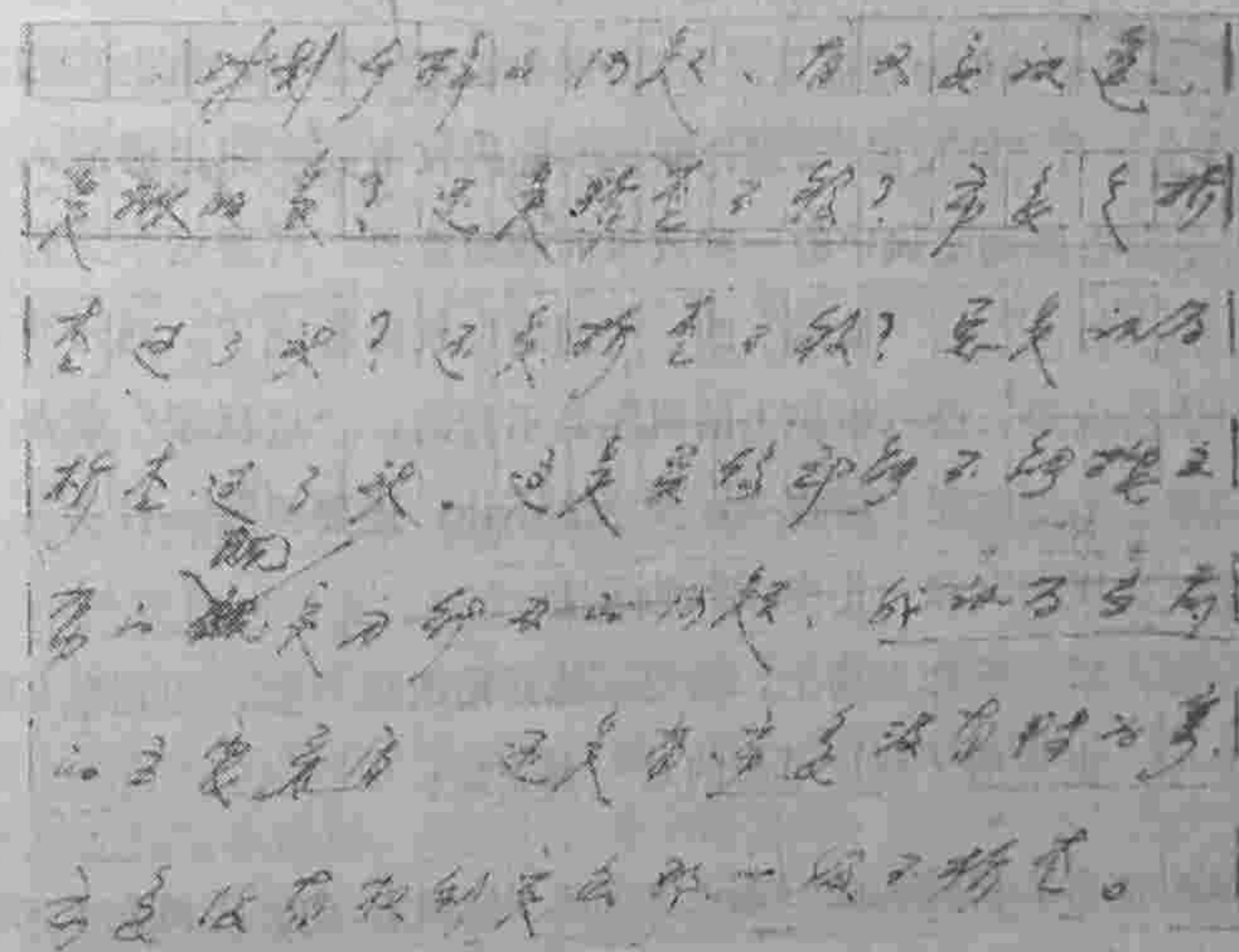
(1) 刘殷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五日昆明市委第304次常委会发言记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中央讲不能层层揪代理人，但我们不能搞个杠杠，说只能到那一层，《春苗》上的卫生院长是那一级的干部，还不是走资派。



(2) 刘殷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昆明市委第307次常委会上发言记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对划个杠杠问题，有必要议透，是揪的多？还是检查不够？市委是检查过了头？还是检查不够？总是认为检查过了头。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还是省、市委没有转好弯，市委没有权力定出那一级不检查。

(3) 市委办公室姚铨同志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市委党员领导干部会议,是刘殷农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阴谋篡党夺权的一次重大行动。在刘殷农的策划下,由王海全当了会议秘书处简报组负责人,控制了简报大权,除大量铅印散发朱克家在省理论工作上的反党讲话外,还利用会议简报推销“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大造篡党夺权舆论。

整个会议共印简报一百六十一期。在简报中,他们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乱扣帽子。给一百八十四名干部扣上“走资派”、“复辟派”、“翻案派”、“算帐派”、“还乡团”、“复辟狂”、“野心家”、“阴谋家”、“复辟势力总代表”、“刽子手”、“别动队长”、“胡汉三”、“罪魁祸首”、“隐士”、“谣言世家子弟”等各种政治帽子,妄图把一大批领导同志踢出领导班子,整垮各级党委,搞乱昆明、搞乱云南,由刘殷农及其帮派势力乱中篡权,建立资产阶级邦天下。

3、刘殷农把昆明的黑经验传到专州,搞乱全省

(1) 西双版纳州马正全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的揭发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杨慰农家,刘殷农给我们讲了昆明市召开的县书会议情况,说他们的会开得很好,“造反派”在会议中起主导作用,他也参加会议领导。会议的秘书组、联络员都有“造反派”,理论联系实际揭批市委内的走资派。他们的会议还准备搞个落实去年刮右倾翻案风的一些政策问题的意见,只要这个文件通过了,对去年对“造反派”的“打击”、“排斥”的一些问题也就能解决了。通过贯彻文件从组织上来巩固前段斗争的成果。没有组织上的巩固是不行的,“造反派”就是要进到领导班子中去,这个问题上不要组泥(扭捏),要当仁不让,还要抓紧。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就是“造反派”和“走资派”的矛盾。

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接受了他介绍的这一套,回到我们州,在开理论讨论会和扩干会中,也采用了他反革命的这一套去搞。

(2) 楚雄州电影公司周五昆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交代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下午,我到刘殷农家,拿了两份材料,一份“郭少川在市党员干部会上的检查”,一份昆明市委关于纠正去年刮风中若干错误的意见(是正式文件)。

这些材料对楚雄地区以刘光兴为首的篡党夺权活动,也起了煽风的作用,流毒不浅。

(3) 楚雄州邱立峰一九七七年二月八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我们在李国梁家开会,听安且康从昆明带回的消息。安且康作(着)重谈了昆明市委召开党员大会情况,讲了刘殷农在会前召开骨干会议,专门讨论了市委扩大会怎样开,而且会议一开始,火力比较集中,矛头对准两个走资派王士超、王捷三,紧紧拉住郭少川。李书成的旗帜鲜明,态度明朗。他们认为不一定搞什么纪要,他们的做法是搞三个检查和一个处理意见(纠正右倾翻案风中的错误的意见),搞三个检查,(即)郭少川、王士超、王捷三的检查。刘殷农讲,检查的效果在某种情况下是比纪要的作用大,说的问题深,谈的问题广。另外刘殷农讲,对省委二十六号文件昆明采取的方法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并说,你们州上准备召开常委扩大会,你们可讨论一下,是搞纪要,还是用检查和一个处理意见的办法好。

(三) 刘殷农把在昆明篡党夺权的黑经验,强行塞进省委一九七六年四十号文件,使全省乱上加乱

1、曹光祥一九七七年元月二十八日的交代(节录)

市党干会结束后,在七月十五左右,有一天晚上,地点在我家。晚上八点左右,人到齐后,刘殷农主持开会,把纪要也带来了。他说,省委常委最近开了一段会,形成这个纪要,现在分别征求各地、州、市的意见,这个纪要调子很低,如果这样发下来,市党干会的成果就要冲掉。我们今晚好好研究一下,看有些什么问题,明天我好在常委会上发言。然后他把纪要读了一遍,后来又逐段研究。

2、省委办公厅周宗德同志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六日的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昆明饭店二楼会议室,听取(昆明)市委部分常委对省委四十号文件提意见的会议。朱克家也参加了。

刘殷农说,省委40号文件(征求意见稿)是一个精心炮制的,失败的文件。文件精神好象是转弯,实际是兜圈子,是原地不动。是一个以其昏昏的文件,想使人昭昭是不可能的。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的文件,是拒不转弯的自供状,手法是折中主义、诡辩论;要害是抽掉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特别是否认省委内存在吸工人血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掩盖了全盘接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这样一个要害问题。

然后,刘殷农对40号文件逐条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他又归结说,总的是满纸荒唐言,一把假眼泪。是要把生产搞上去,搞唯生产力论。回避了省委七五年是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这个要害。离开了阶级分析,把省委内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日夜赶班,自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这是由阶级本性决定的这样实质性问题说成是认识问题。

(四) 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徐宝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和十月三日的《备忘摘记》(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九月二十日

晚上黄、刘、张、徐、沈、T(涂晓雷)等在杨(慰农)家研究当前情况。

对省委原定方针不变，但重点应转向王(必成)

△密切注视社会动态，注意掌握：
①谁在背后起作用；②蒯大富、聂元梓式人物究竟是谁；③关于建立班子问题(云机厂的办法好)。

△分析了社会上的动向，介绍了铁路局、电力局、省建等单位情况。从电力局和铁路局得知，十八日后，要大搞一下，从铁路、电力、省建、化工、煤炭打破缺口，总的还是激化矛盾，挑起事端。

十月三日：

晚上，黄、刘、张、涂、沈、徐、杨等碰头，谈了最近情况。

①中央要求省委九日前布置工作。据此，可能中央九日后开全会。

②估计十五日左右中央会发表公告，估计了七人核心领导，主席、总理。及对邓的处理问题。

③社会动态情况

④对下一步。

对下一步要充满信心，但也要估计困难，准备反复。

当前做法：

A、抓住时间，分清是非，批三株大毒草。

B、纠正划线站队问题，大家一起解决，按(69)61号文办。

C、对走资派要斗，要施加压力，

D、对省委贾最近分别找他

⑤关于福建、浙江、山西等地情况，

(五) 由于刘殷农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昆明市成为“重灾区”

1、昆明市计委关于“四人帮”及其余党刘殷农破坏昆明市国民经济的揭发(节录)

一、他们破坏了农业，反对中央(1975)21号文件，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搞乱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们干扰破坏的恶果：一是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减产，(一九七六年)比一九七五年减百分之十七点一。二是严重破坏了全市粮食生产上“纲要”的计划，不仅全市没有上“纲要”，反把一九七五年已经上“纲要”或“超纲要”的四个县(区)全部拉下来，造成全市没有一个上“纲要”的县(区)。三是破坏了对国家的贡献，去年(一九七六)粮食征购量，比七五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四是造成了社员口粮大幅度下降，七六年比七五年平均每人少分五十二斤。五是总收入的下降，影响了社员的生活水平，每人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比一九七五年减少百分之八。

二、他们冲击了工业，破坏了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破坏了工业的主导作用，破坏工农联盟，破坏党与群众的关系。去年(一九七六)市属工业的总产值退到一九七〇年水平。在工业部门中，重工、轻工、化工、手管四个系统，破坏尤为严重，同一九七五年相比，减产的比例是重工百分之五十一，化工百分之四十四，轻工百分之三十三，手管百分之三十。再看一看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度减产，损失惊人。

第一，支农产品减产大，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破坏工农联盟，破坏城乡关系。例如，合成氨比一九七五年少产了百分之七十；化学农药原药比一九七五年少产百分之五十五；手扶拖拉机比一九七五年少产百分之五十六。

第二，轻工产品减产幅度大，尤其是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倒退更大，破坏市场安排，严重影响人民生活。仅举十五个产品来看，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减产幅度是：保温瓶百分之八十六，罐头百分之六十七，灯泡百分之六十五，棉布百分之六十三，电池百分之六十一，日用精铝制品百分之五十七，印染布百分之五十五，棉纱、塑料制品、铸铁锅、布胶鞋都是百分之五十四，机制纸及纸板百分之四十七，肥皂百分之四十一，火柴百分之三十三，卷烟百分之二十八。

第三，原材料工业生产下降，破坏了工业内部、工业同基本建设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其他工业和建设的发展。例如：钢的产量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少产百分之六十，钢材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减少百分之七十五，水泥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少产百分之三十三，烧碱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下降百分之二十。

三、他们破坏了交通运输，破坏了城乡物资交流，破坏了城市交通。汽车的客货运量都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三十，装卸工作量下降百分之三十五。市内搭乘公共汽车也极为不便，常常是无车可乘，或是有车不能准点。

四、他们破坏了基本建设，造成了基建投资额、新增生产能力、房屋建筑的施工、竣工面积较大幅度地下降，严重影响了建设的速度。去年(一九七六)基本建设投资额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五，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四，相当于一九六九年水

九月二十日
晚上，黄、刘、张、徐、沈、T(涂晓雷)等在杨(慰农)家研究当前情况。
对省委原定方针不变，但重点应转向王(必成)
密切注视社会动态，注意掌握：
①谁在背后起作用；②蒯大富、聂元梓式人物究竟是谁；③关于建立班子问题(云机厂的办法好)。
分析了社会上的动向，介绍了铁路局、电力局、省建等单位情况。从电力局和铁路局得知，十八日后，要大搞一下，从铁路、电力、省建、化工、煤炭打破缺口，总的还是激化矛盾，挑起事端。

十月三日：
晚上，黄、刘、张、涂、沈、徐、杨等碰头，谈了最近情况。
①中央要求省委九日前布置工作。据此，可能中央九日后开全会。
②估计十五日左右中央会发表公告，估计了七人核心领导，主席、总理。及对邓的处理问题。
③社会动态情况
④对下一步。
对下一步要充满信心，但也要估计困难，准备反复。
当前做法：
A、抓住时间，分清是非，批三株大毒草。
B、纠正划线站队问题，大家一起解决，按(69)61号文办。
C、对走资派要斗，要施加压力，
D、对省委贾最近分别找他
⑤关于福建、浙江、山西等地情况，

平，新增固定资产比一九七五年减少百分之七十，房屋施工面积下降百分之二十七，房屋竣工面积比历史最好水平下降百分之六十，竣工投产项目，比一九七五年减少八十八个。

五、他们破坏了商业，既破坏了生产，也破坏了流通领域的正常周转，造成了日用商品的供应紧张，妄图破坏党与群众的关系。国内纯购进总值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十五；国内纯销售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七。在五十三种主要商品中，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的有四十一一种，幅度一般都在百分之十至三十，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如电池、灯泡、热水瓶等商品经常脱销，肥皂的供应每年一人才有一条半，洗衣粉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八十八，生活用煤一九七五年下半年送货上门，一九七六年成了买煤守夜排队，付款后很长时间才能拿到货，年末煤的库存出现负数二千八百吨，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很大困难。社会商品另售额历年来一般是逐年增长百分之四至五，可是一九七六年却比一九七五年下降百分之五，特别是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下降的幅度较大，一般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以氮肥更为突出，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二。

他们所有这一切破坏，也反映到全市财政收入上。财政收入退到一九六一年水平。由于“四人邦”搞乱企业管理，不讲经济核算，造成企业亏损增多，成本上升。一向为国家提供积累的轻工业系统，也出现了系统亏损，这是昆明市解放以来没有过的事，真是令人发指。

昆明市计委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六日

2、昆明市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邦”在我省的余党刘殷农及其资产阶级邦派体系，长期以来紧跟“四人邦”，千方百计地搞乱我市教育战线，肆意破坏教育革命，犯下了累累罪行。

他们为了实现“四人邦”“改朝换代”的罪恶阴谋，卖力地推行“四人邦”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掀所谓“复辟派”、“走资派”。早在批林批孔中，刘殷农以及安朗等人串通一气，秉承“四人邦”的黑旨意，不批林，假批孔，在昆明市大掀所谓“复辟势力的代表”，在我市中等学校中，大反所谓“复辟”、“回潮”，以批判“师道尊严”为借口，把矛头指向广大基层干部和教师。一九七六年，“四人邦”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刘殷农以及李书成、安朗等人，紧跟“四人邦”另搞一套。他们不仅篡夺了教育局党的领导权，而且在六月市委召开的“党干会”上，为层层揪“走资派”、“还乡团”大喊大叫，妄图篡夺各级党的领导权。特别是在我局八月召开的贯彻市委党员干部会议精神的“两委会”上，公开宣扬什么“上有邓××，下有钱××”，在大会发言中点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和教师的名，演出了一场层层揪“走资派”的丑剧。会后，教育系统掀起了层层揪“走资派”、“投降派”的狂风恶浪，搞得学校党的支部无法工作，教师无法教学，学生无法学习，学校一片混乱。据不完全统计，在市直属三十七个学校中，被打成了“走资派”、“投降派”的干部，占市直属学校校级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刘殷农及其一伙还卖力推行“四人邦”炮制的“两个估计”的黑货，残酷迫害、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教师，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刘殷农的伙计李书成叫嚷：“学校就是要培养头上长角，角要硬，身上长刺，刺要尖的人。”胡说什么“看一个学校的好坏，就是看他敢不敢杀向社会”，“敢不敢同学校领导斗”，“反潮流就是要反教师”等等。刘殷农的邦派骨干安朗，挥午“两个估计”的大棒到处打人。发展新党员，他要求对“两个估计”表态，同意“两个估计”的才能入党；解决教师的思想问题，他要“两个估计”为依据，承认“两个估计”才算是革命的。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富民县文教局的同志向他汇报有个学生持刀要杀教师时，他竟说什么“这一刀杀得好，杀在师道尊严上，杀在修正主义上。”充分暴露了他们这一伙妄图搞垮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复辟资本主义的凶恶嘴脸。

刘殷农及其同伙的捣乱、破坏，搅乱了我市教育战线，破坏了师生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摧残了教育事业，坑害了青少年一代。搞得学校领导干部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教师教也不是，不教也不是，学生不学习，想学也学不进，使学习质量显著下降。我市有个学校的高二年级，最近进行了一次数学测验，内容包括从初一到高二的教材，测验结果，三百一十二人中得零分的四十八人，得一至九分的一百一十四人，仅这两项就占全年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

由于“四人邦”及其余党刘殷农等人的破坏，使我市教育质量下降，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中共昆明市教育局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四部分

反军乱军，破坏部队稳定， 阴谋策划组织反革命第二武装

刘殷农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看作是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以来，刘殷农紧跟“四人邦”“放火烧荒”，多次窜到部队，勾结少数人，掀起打倒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的妖风，破坏部队稳定。与此同时，刘殷农还处心积虑，密谋组织反革命第二武装，反军篡权。

一、妄图打倒昆明军区主要领导 同志，反军篡权

（一）黄兆其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四年三月的一天晚上，我、刘殷农、张奎林、×××和昆明军区许梅康、叶秀锦、×××等人在震庄工农读书班开申联会。我们认为批林批孔运动是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内、外互相配合，军队支持地方，地方支持军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也要互相配合。我们讨论联系云南和昆明军区的实际，就是要通过这次运动打倒王必成同志，解决军区机关一些人的问题。许梅康、叶秀锦提出来，要我们在地方上配合军队。我和刘殷农等人同意这个意见。

一九七四年四月，×××从北京回到贵阳以后，我和刘殷农商量，对批林批孔运动联系云南实际批什么，也要征求×××的意见。确定由刘殷农秘密去到贵阳找×××。

刘殷农从贵阳回来后，告诉我他和×××的谈话情况。我一面参加常委会议，面对面地同王必成同志斗，另一面又召开邦派核心会议，策划在社会上公开批判王必成，我和涂晓雷、×××等人以“齐向阳”笔名写了《把云贵总督王必成拉上历史的审判台》等大字报，在邦派中发动批判王必成同志，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打倒王必成同志的高潮。

（一九）七五年我和刘殷农到北京参加汇报会学习，还要打倒王必成同志，直到去年（一九七六）我们还死死揪住王必成同志不放，在“四人邦”揪出来前，我们积极向“四人邦”告王必成同志的黑状。“四人邦”揪出来后，我们又转移斗争大方向，造谣陷害，把“四人邦”说成是王必成的后台，要打倒王必成同志。

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把矛头指向王必成同志，这是我们紧跟“四人邦”，要打倒一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具体行动。我们这一系列罪恶活动直接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仅给王必成同志加了诸如“钉子头”、“云贵总督”等等罪名，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还把两个五十天会议的简报内容通过大字报、传单抛向社会，泄露了涉及省委、军区的大量机密，造成了严重后果。

（二）张奎林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四年，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徐宝兴、张奎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李积德、姜月生、章世祖、谈子文、×××等人参加邦派核心会议。

确定了“对外无组织，对内有联系，军内军外互相配合，官办民办双管齐下”的反革命策略。

决定打三个战役，在所谓的三个战役中，军内外的邦兄弟互相勾结，利用职权，抛出了大量莫须有的罪名材料，给王必成同志扣上了“云贵总督”、“钉子头”、“复辟势力总代表”等等大帽子，妄图打倒王必成同志，夺他的权。给陈康同志扣上了“翻案的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等大帽子，妄图置陈康同志于死地而后快。

“五·一八”反革命案件发生后，我们把矛头对着王必成同志。

黄（兆其）、刘（殷农）经常找（军队的）×××、×××，刺探情报。军内情报主要通过×××、叶秀锦、许梅康几个人提供。

(三) 叶秀锦一九七八年元月七日交代(节录)

时间：一九七四年三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地点：在震庄四号楼。

参加人：有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许少先、×××、×××、路茂钦，军内有许梅康、席希圣和我三人。一共十二人。

刘殷农说：(我们)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文化大革命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要请战友谈谈对形势的看法，怎么掌握运动的大方向，每次都得到很大帮助和启发。现在批林批孔运动来了，江青出面送信、送材料，说明这次运动来势不小，很可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造反派应怎么办？现在又是关键时刻，请你们三个老战友谈谈看法，给我们提点宝贵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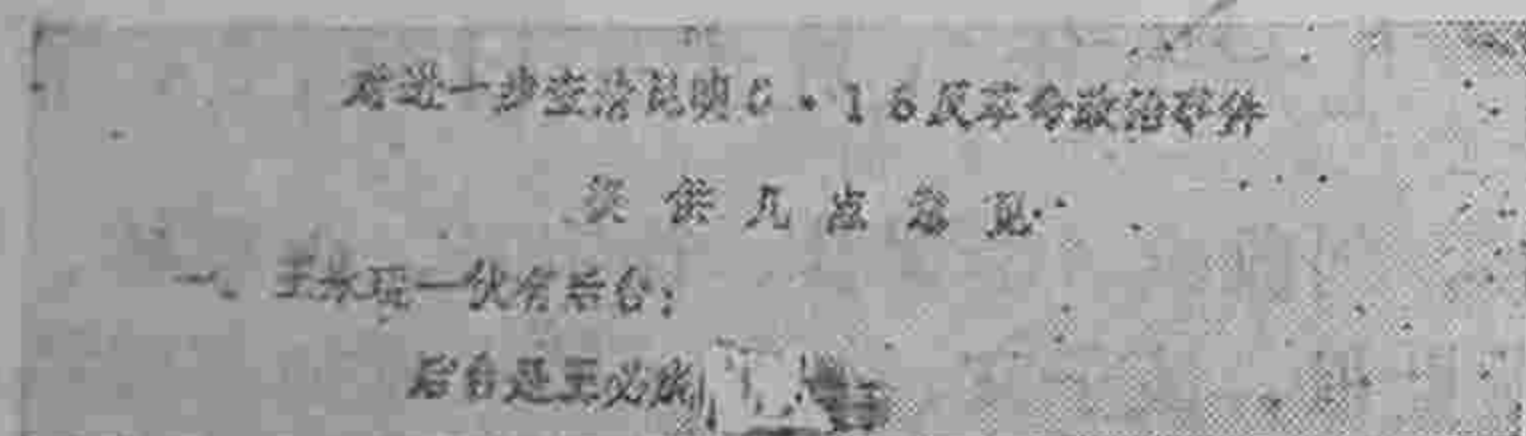
席希圣说，对整个运动怎么搞，说不上来，只介绍一点情况，供参考。新华社有几个记者，在××师一个连队蹲点，搞批林批孔，是带着中央的精神下来的。这场运动可能是从基础上扎扎实实发动群众，而后逐步解决上面的问题。

许梅康说，昆明军区运动形势很好，三大机关都动起来了，大字报质量很高，目标很集中，就搞王必成。

许梅康又说，地方上可以搞陈康，这段要集中搞王必成，陈康的问题，放在王必成的问题搞得差不多了，再看情况怎么搞，要不，就是地方上搞陈康，军内搞王必成。

刘殷农说，地方上搞，军内不配合，也不好办。好多情况，还是军内更清楚。这次串联会，是一次反党、乱军的会议。

(四) 刘殷农为陷害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向“四人帮”送的黑报告(节录)的影印件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查获的刘殷农送给“四人帮”的黑材料

影印件原文

对进一步查清昆明5·18反革命政治事件
提供几点意见

一、王永琨一伙有后台：
后台是王必成

二、抢夺民兵指挥权，密谋组织反革命第二武装

(一) 王云仙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和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的交代(节录)

民兵指挥权是我们看得较为重要的一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可以控制昆明的局势，所以就竭力为山头争夺民兵指挥权。(一九七四年时)马首良、曹光祥、胡守贞就说：“赵学全当总指挥不合适，应该是刘殷农当，而我们到上海学习的都应该是民兵指挥部的付总指挥。”后来马首良还跟我说：“小王，你还是来民兵指挥部，老刘给×××说了，你到政治处，我到后勤处，胡头(胡守贞)到战勤处”。

(一九七六年)八月份，马首良单独给我说，刘殷农给(跟)他商量，还是要促市委建立民兵指挥部，叫我和胡守贞还是到民兵指挥部去工作。马首良还说：抓民兵工作是对的，上海民兵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人家认识到民兵的作用是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而根本的是防止内部的复辟。人家民兵是自己武装自己，自己造武器，每个厂都有生产民兵武器的任务，造拖拉机的厂，就造坦克，什么枪、炮，都有厂造，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民兵的武装问题，一旦发生复辟，是完全可以对付的。

(二) 马首良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围绕民兵指挥权的问题，刘殷农同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我、曹光祥、胡守贞、周载祥、杨本智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找黄兆其，向黄兆其反映昆明民兵指挥部组建的情况，要求黄兆其在省委讨论昆明民兵指挥部的班子时，力争由刘殷农担任总指挥，不能叫赵学全任总指挥。胡守贞说：“刘殷农有能力，群众中有威信，他任总指挥，民兵工作就抓得好，赵学全没有能力，抓不起来。”

我们去找黄兆其，要他出面做工作叫刘殷农当民兵总指挥的事，事先我们是告诉了刘殷农的。

一九七六年市委党干会后，刘殷农又动员我到民兵指挥部。刘殷农还对胡守贞说：“你还是到民兵指挥部。”围绕民兵问题，曹光祥还常常讲要建立“新军”，让年轻干部担任“新军”的各级领导。

拚命推举刘殷农当民兵总指挥，我们也往指挥部里挤，就是为掌握民兵武装所做的一种努力。

(三) 省委办公厅戴禧融同志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的揭发(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旬,刘殷农通过胡延观,以后又自己打来电话,一再要求贾启允同志见他一次。贾对我说他没有空,要我去听刘殷农说些什么。八月十六(或十七)日晚,我约刘到昆明饭店楼下会客室见面。刘谈了以下内容:

……。

四、煽动贾启允同志抓民兵指挥权。刘殷农说:“云南军队问题未解决,军队对民兵抓住不放。万一有事,党委一定要抓得住,要有领导权。”

……。

刘殷农的以上谈话我向贾启允同志作了汇报。

(四) 直接指使楚雄州资产阶级邦派体系组织反革命第二武装

1、楚雄州电影公司周丕昆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交代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下午,我又到了刘殷农家里一次,刘(殷农)说,回去请告刘光兴、柯平,①运动中要注意放手发动群众,打好群众基础。②斗争中一定要注意策略,对走资派要分化瓦解,不能让他们抱成一团。③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会尖锐化,要注意有反复,要抓好民兵工作,对付走资派的挑战。我说,我负责转告。我回楚雄以后,原想把刘的意见转告刘(光兴)、柯(平),但当时刘、柯在石林开会,我就把刘殷农的意见转告了原农机局党委付书记邱立峰、党办主任李国梁、文教局党委付书记安且康。上述意见转告后的第三天,楚雄县××厂的民兵就成立了。刘殷农的意见在楚雄产生了严重后果。

2、楚雄州李国梁一九七七年一月五日和三月二十三日交代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主席逝世后,柯平、安且康和我去找刘殷农。刘殷农说:“前一次你们州上电影管理站周丕昆来过一次,我叫他转达给你们,要把民兵掌握起来。”柯平讲:“有的,现在民兵是我们掌握的。”

在楚雄的民兵是地地道道的“四人邦”的第二武装。

3、楚雄州杜勇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交代揭发(节录)

(一九七六年)八月楚雄地区民兵指挥部恢复后,经常听邱立峰讲,造反派要掌握枪杆子。因此后来的武卫班子就安排进了民兵指挥部,并都担任了民兵指挥部的付主任的重要职务。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以后,外县成立了两个机动民兵营和安全领导小组,这几人都分别担任了机动营的营长、付营长的职务,×××(武卫班子的主要成员)并参加了州安全保卫小组的工作,这几项组织措施,都是利用民兵武装搞篡党夺权的重要组织措施。

第五部分

竭力推行“两个否定”、“一个砸烂”, 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四人邦”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他们挥午“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大棒,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公安战线上占统治地位,全盘否定绝大多数公安干警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狂叫“彻底砸烂公检法”。此后,“四人邦”蓄意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提出“对走资派实行专政”和“打开监狱找‘左’派”的反动口号。

刘殷农对于这一切,都心领神会,竭力推行。他疯狂破坏公安工作,残酷迫害公安干警;他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污蔑为“走资派”,妄图对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他对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曹荣华、靳全新、马存兴这样一些反坏分子,则尊为“先进分子”,作为依靠力量。刘殷农还污蔑我们对这些罪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打击新生力量”,“是给造反派脸上抹黑,给走资派脸上贴金”。强迫省、市委和各级党委对“撤、停、免、调、抓”的要统统恢复职务。

在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一伙的煽动下,全省刮起了一股强迫释放罪犯的黑风,仅昆明市就被迫放出三十二名在押犯人。这些坏家伙出狱后,更加卖力地为邦派体系效劳,充当了篡党夺权的别动队,猖狂地进行阶级报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邦”后,才将这些罪犯全部收监。

一、中共昆明市公安局委员会的揭发

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公安战线上，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公安战线的统治地位，否定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胡说：“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统治地位。”诬蔑公安机关“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辱骂公安干警“比国民党反动派还坏”，狂叫“彻底砸烂公检法”等等。“四人帮”的余党刘殷农及其同伙挥午“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的反革命大棒，对我市公安战线进行了一系列的摧残和破坏，对广大公安干警实行残酷镇压和迫害。

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刘殷农及其同伙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林彪、“四人帮”“彻底砸烂公检法”，引进武斗人员进驻市公安局，抢走大量枪支、弹药和侦察技术设备等。大搞“划线站队”，把广大公安干警打成所谓的阶级敌人，实行法西斯专政。仅就所谓的“地下公检法”假案，就迫害了公安干警一百五十九人。原市公安局的六个领导干部，五个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黑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处级干部多数被点名揪斗。许多一般干部也被扣上各种罪名，备受迫害。刘殷农及其同伙大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迫害广大的公安干警，甚至动用十五种刑法，刑讯逼供。打伤、打残和被迫自杀的共十一人，有的受刑后至今瘫痪卧床，失去工作和生活能力。刘殷农一伙还按照林彪、“四人帮”“重建公安机关”的黑旨意，对原有的公安干警实行“一锅端”、“大清洗”。原市公安局×个业务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人员被赶走。而留下的同志，也备受歧视。

在批林批孔中，刘殷农插手公安机关，运用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公安干警，诬蔑为“复辟势力”，加以打击迫害。甚至盗用公安局党委名义，炮制反动大字报，撰写黑报告，妄图陷害市委和警备区的主要负责人，夺取公安机关领导权。

一九七六年“四害”横行时，刘殷农利用窃据市公安局领导职务的个别人，或在幕后策划，或在幕前指挥，一度把市局从机关到基层搞得无法行使正常的专政职能，把个

好端端的公安机关搅得一塌糊涂。他们颠倒敌我，把矛头指向党内，甚至利用“5·18”反革命案件，捏造事实，陷害昆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和省委负责同志，掩盖帮派反革命罪行。刘殷农一伙妄图打倒我局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派出十一个人四出奔走，通过帮派渠道大搞领导干部的黑材料；他们指使和支持反革命分子张进昌，煽动数十个着装民警冲击市委机关，绑架市委书记，制造了影响恶劣的“七·三”打砸抢事件。他们还支持交通队的帮派势力制造长达四个多月的“罢岗”事件，造成交通事故全面上升。他们还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犯人，指使罪犯家属和帮派势力，多次揪斗、围攻省、市委领导同志，进驻领导的住宅，打击报复检举人和受害者，冲击公安机关，殴打公安保卫人员，强行释放了三十二名在押犯（内有反革命二名，杀人犯十七名，流氓诈骗及其它刑事犯十三名），仅呈贡县公安局被迫释放了十六名罪犯。这些罪犯出狱时，帮派势力为之鸣放鞭炮，披红挂彩，前呼后拥地游行示威，封这些罪犯为“最坚定的左派”。这些罪犯出狱后，更加死心踏地，穷凶极恶地充当帮派篡党夺权的别动队，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和群众，心狠手毒地进行打击报复，被毒打致伤的共八人。昆纺两个流氓犯放出后，把市轻工局和市工办的领导同志打成重伤。市建安公司一个杀人犯放出后即勾结帮派势力，到处抓打保卫干部和办案人员。呈贡县横冲大队杀人犯鲁海润放出不到一个月，就篡夺了大队党支部的领导权，揪斗了大队正、付书记和生产队长，强迫检举人对其赔礼道歉，并夺了四个生产队的领导权。由于该犯的破坏，全大队粮食减产十四万斤，经济收入减少三万八千多元，上缴国家粮食减少了八万一千多斤，社员吃粮也大大降低。这是“四人帮”的余党刘殷农及其帮派体系推行“两个否定”、“一个砸烂”，疯狂破坏公安战线的严重罪行。

中共昆明市公安局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

二、策划、指挥释放 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在押罪犯

(一)中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心小组揭发

现行反革命分子许少先、李连生和流氓坏分子任维纪是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庇护下的反、坏分子，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得力干将，对昆明市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一九七五年年底，在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的省委二十六号文件时，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我专政机关依法逮捕了这三名罪犯，全市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四人帮”余党刘殷农为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出于兔死狐悲的反动阶级本性，千方百计地为这三个坏人翻案。他公开多次叫嚣：“逮捕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是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时间也错了”，为释放这三名罪犯定了调子。在他的策动下，要求释放坏人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罪犯家属进驻省、市委领导同志的宿舍，揪斗、殴打领导干部，他的一些小兄弟为罪犯搞反旁证，公开大肆翻案。社会上“放人”风骤起。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日，我院负责同志向市委常委汇报三犯罪行，提出处刑意见，刘殷农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事端，诬陷我院负责同志把证据确凿的坏人放掉，而把事实不清的李连生予以判刑，无耻威胁说：“你这个一百八十万人的法院院长怎么当的？！”又在市委常委会上别有用心地散布：“政法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搞不好，是不是领导干部还在顶住？！”

六月上旬，市委又召开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在刘殷农一手操纵下，强迫到会同志按“四人帮”反革命逻辑表态。我院及一些单位的负责同志在会上据理驳斥刘殷农的种种谬论，坚持依法惩办的正确意见。会后，市委一管政法的付书记与刘殷农一唱一合，竟质问法院：“你们根据什么要处理他们？”

对此，我院邓运增同志向市委常委写了控诉信，以铁的事实戳穿刘殷农释放坏人的可耻行径，要刘殷农向全市人民检查交代。刘殷农知道后，气急败坏地说：“邓运增当法院院长草菅人命，不行！”还煽动帮派势力，打倒邓运增同志。

尽管三犯犯罪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但为了慎重起见，在市委的领导下，我专政机关与刘殷农一伙进行的反旁证作了反复地、针锋相对地斗争。我院组织了人力，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凡是他们作过反调查的地方和单位，我们都一一作了调查消毒工作，进一步查证落实了三犯的罪行，取得了更加确凿、过硬的证据，以此作出了符合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决定，粉碎了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三犯翻案的罪恶阴谋。

中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

(二)刘殷农制造反革命舆论，强迫省、市委释放 许少先等三个犯人

1、王海全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一日交代(节录)

早在去年三月地书会议前，刘殷农就对曹光祥、马首良、王云仙和我等人，阐明了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刘殷农说，许少先等人虽然也有一些问题，但也不是走资派公布的材料那么严重。走资派整这几个人的目的，是为了搞臭所有的造反派，把所有的新干部打下去。这几个人释放了，就是对右倾翻案风的否定。

2、朱克家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交代(节录)

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地书会议期间，我找刘殷农(翠湖宾馆他的房间)问他，昆明市被抓的三个人(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现在看来能不能放？刘殷农说，昆明市的这三个人，是有错误的，但搞的材料很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我的意见是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查，该抓的就再抓，他们也跑不了。抓他们的指导思想就错了。如果不放的话，那些人是不会罢休的。

3、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室龚学文同志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的揭发 (节录)

刘殷农从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到十月八日，半年的时间，先后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过十三次要市委释放坏人。其中仅四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五次提出要市委释放在一九七五年贯彻省委二十六号文件时拘留、逮捕的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这三个坏人。

刘在常委会上说，对财贸这三个人(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你们发的材料上讲是派性掩护下的坏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你们是用这几个人来压造反派，压新生力量，压群众。要市委把在贯彻省委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时处理的这些坏人，隔离审查的要解除隔离，恢复职务，拘留、逮捕的要释放。从财贸三个人来看，省、市委是要通过这三个人把造反派搞臭。这些问题要从路线上来认识。

三个人捕的对不对？李连生捕错了，任维纪可捕可不捕，捕了也是捕错了。许少先年三十晚捕的，也错了。这是你们把右倾翻案风的帽子从走资派头上拿下来戴到群众头上，捕了也是错的。这三个人你们是作为当时的战果来宣传的，我们现在不能孤立的看，一定要从路线上看，逮捕这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也错了，时间也错了，逮捕他们是压造反派，是给造反派脸上抹黑，给走资派脸上贴金，是打击了新生力量，否定老、中、青三结合，是右倾翻案风的具体表现。

4. 一九七六年刘殷农在市委常委会议上为释放三个坏人的部分发言记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Faded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a transcription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

[Faded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a transcription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

[Faded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a transcription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

[Faded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a transcription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

影印件原文

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的问题，我们应该研究一下，他们是不是坏人？去年这样做对不对？他们的材料印发到全省，李连生是一般干部，材料上讲是派性掩护下的坏人，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你们是用这几个人来压造反派和新生力量脸上抹黑，用这几个人来压群众。

(在四月十六日第282次常委会上的发言)

对财贸三个人的问题，省、市委是通过这三个人，想把造反派搞臭，从他们的材料看，水份很多。这些问题要从路线上来认识。

(在五月二十九日第289次常委会上的发言)

三个人的问题(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本来是个个人问题，但由于去年执行了反派性为纲，搞派性掩护下的坏人，他们是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向全省发了材料，对他们的问题前任省委书记和现任省委书记都表了态，新华社也表了态，这就是个路线问题了。

三个人是作为当时的战果来宣传，我们现在不能孤立的看，这些问题要从路线上来认识，路线错了，方法、政策也是错的。造成的后果严重，影响不好。

(在六月三日第289次常委会上的发言)

年三十晚对许少先逮捕，省委办公厅还给专州打电话向昆明市学习，实际上是上顶中央，下压群众，是错误的。对三个人的问题以市委负责同志为主做好工作，最好在会议(市委六月党干会)期间解决。

三个人捕的对不对？李连生捕错了，任维纪可捕可不捕，捕了也是捕错了，许少先是年三十晚捕的，他的材料没有比隔离时发展，在中央打招呼后，为了把右倾翻案风的帽子从走资派头上拿下来戴到群众头上，捕了也是错的。

(六月三日在第289次常委会上的发言)

(三) 策划、指挥少数人闹事， 强迫释放在押罪犯

1、昆明市一商业局汪多闻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的 揭发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到刘殷农家，刘殷农直接提出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三个人的问题，刘说：“我认为现在你们应当提出他们三个人的问题来。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三个人的问题一般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走资派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可以把蚂蚁说成大象，把他们抓起来了，从你们那里先下手，最后把造反派统统打下去。路线、政策都是错的。现在，应当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提出他们的问题来。”

到去年(一九七六)八月，黄兆其向我和古(安生)、丁(建华)、杨(宝贵)、×××说：“二、三月份时，见你们都动不起来，我和老刘(殷农)很着急，我们研究后，派了羊××去做你们的工作，想把你们发动起来……。”可以看出，策划要由我们的嘴来提释放坏人问题，是黄兆其、刘殷农等帮派头目去年(一九七六)二月左右研究决定的，我们则于去年(一九七六)四月下旬开始付诸行动，充当了他们的马前卒。

2、罪犯古安生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交代(节录)

我们为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三个人翻案，是去年(一九七六)三月份，找我做工作的是羊××、陈××，然后汪多闻来找我谈，要我们起来干。羊、陈同我和丁建华、杨宝贵、汪多闻四人讲，他们是刘殷农叫来做我们的工作的。

四月底，我、汪、丁、杨四人去找过徐学惠，徐说：“首先要解决百货大楼的班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下一步的问题就好办了。”五月初去找徐学惠看王洪文给她写的条子时，徐学惠讲：“现在我们对这三个人要提出无条件释放，口气要硬，要统一起来，不要降低调子。在地书会议上老刘(殷农)、老黄(兆其)对三个人交换过看法，商业系统要解决问题，要先从三个人的问题解决起。”“对解决三个人问题，你们最好找刘(殷农)谈谈”。五月份我们找到刘殷农，刘说：“在地书会时，我同徐学惠交换过意见，抓三个人的目的是为镇压造反派服务的，现在要通过你们来提出放三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三个人是你们商业系统的。”“在地书会时我叫羊××、陈××

来做你们工作，如果那时你们起来搞放三个人的问题，就好了，但现在起来还不晚。”“你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要明确提出解决三个人问题，你们自己在外边提，我在常委会上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刘还讲：“准备开市党干会解决昆明问题，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在干部会上提出解决这三个人的问题。”

释放三个人主要是由徐学惠指挥，我们大部分在徐家活动。在党干会时，徐对我们讲：“会内会外配合”，徐在会上斗，叫我们去找市委谈，找王士超，在外面造舆论，要逐级表态，所以在党干会上揪斗过领导七次。揪斗领导干部问题除了找徐学惠外，还找过刘殷农。刘说：“准备重新复查三个人问题，成立复查组，由王士超挂帅，这个疙瘩是王士超结的，要王去解，看他们怎么办，材料不管他，反正要在常委会上讨论，我到时会提出来，你们要发动群众，继续抓，至于常委会咋个讨论，以后我会告诉你们的。”“市党干会不会放过王士超的，刮风主要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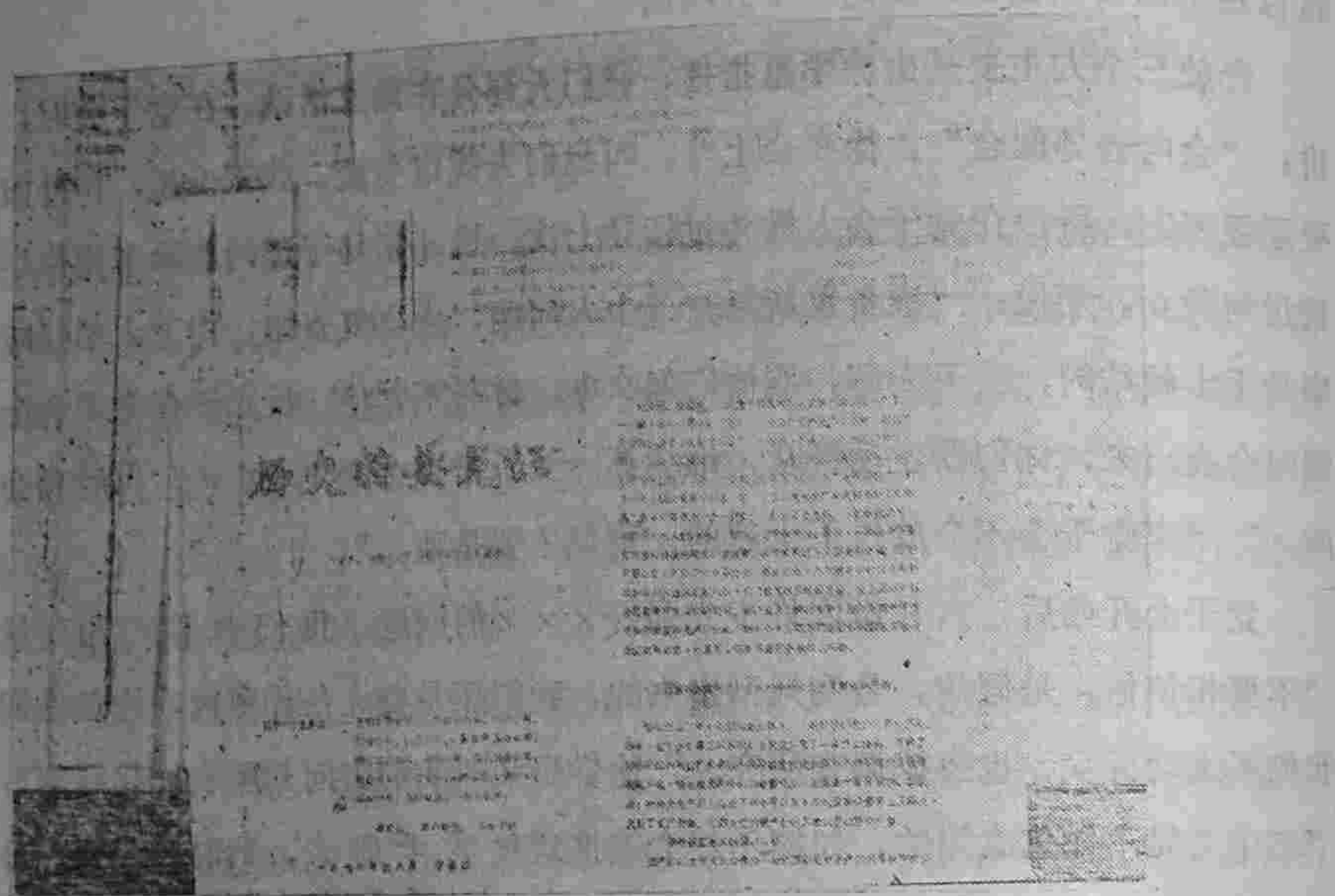
党干会开始后，六月份因许少先强奸×××的问题，我们找徐学惠商量，徐说：“不要相信他，是假的，是刮风刮出来的，我们还是提无条件释放，这是他们捏造的，我们要发动群众，也要搞调查研究。”徐学惠又叫我们去问刘殷农。找到刘后，刘说：“这个老兄不知怎么搞的，如搞不好会被推到敌我矛盾去，到时候我要一分一分看材料，要人证、物证、旁证三证齐全，我要亲自过目。至于处理，我会做工作，希望老当高抬贵手，尽量不要推到敌我矛盾中去。”“我尽量做常委工作，把许拉到内部矛盾这边来。”又说：“我们也可以搞搞调查研究，对这件事是真、是假还拿不准，造反派也要搞搞调查研究。”“这个老兄不知怎么搞的，他自己也承认有这台事情，所以现在这个事情比较麻烦，现在我尽量做工作。”“这个问题上你们也可以搞搞调查研究。”

六月二十四号，汪多闻从商业局打了公函开车又到玉溪去找蒋×调查。又隔了七、八天时间，全德珍(许少先老婆)和我们四个人说：“还是要找蒋×谈，事情才否得掉。”我和汪第二次下玉溪，未找到人。第三次又去玉溪，这次由汪多闻、××、×××去的，第二天回来，带回三分材料，准备复制后交给市委、刘殷农。到七月十五、十六号上午十点钟到刘殷农家，同去的有汪多闻、我、丁、×、××、杨宝贵、×××，把复制材料交给刘，刘讲：“好嘛，等市委常委开会时，我提出来。”

刘殷农在党干会中对我们讲过：“麻烦就麻烦在许少先自己承认强奸的问题。”汪多闻说：“不知他们(指许等人)能不能看报纸，能了解一下外面的形势就好了。”全德珍说：“许少先在里面乱说一通，乱交代而我们在外面为他忙着”，“如能写条子进去，把外面的事情告诉许”，汪讲：“写条子叫他注意看报纸，那许少先就不会乱承认自己的问题了。”杨宝贵讲：“我有个朋友在二监。”由杨宝贵去联系。

(四) 在刘殷农的煽动下, 邦派体系炮制了大量的反动文章, 《历史将要见证》是其中典型的一分

《历史将要见证》反动文章的影印件



影印件(节录)原文

历史将要见证

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三位同志问题始末

昆明市商业系统——昆明市百货商店、市药材公司、医药公司、饮食公司、服务公司、贸易公司、五金公司、针纺织品公司、百货公司、信托贸易公司、时装公司、外贸公司、土产公司、食品公司、煤建公司、春城饭店、一商局机关: 造反派、革命群众、革命干部

下面是《历史将要见证》反动文章(节录)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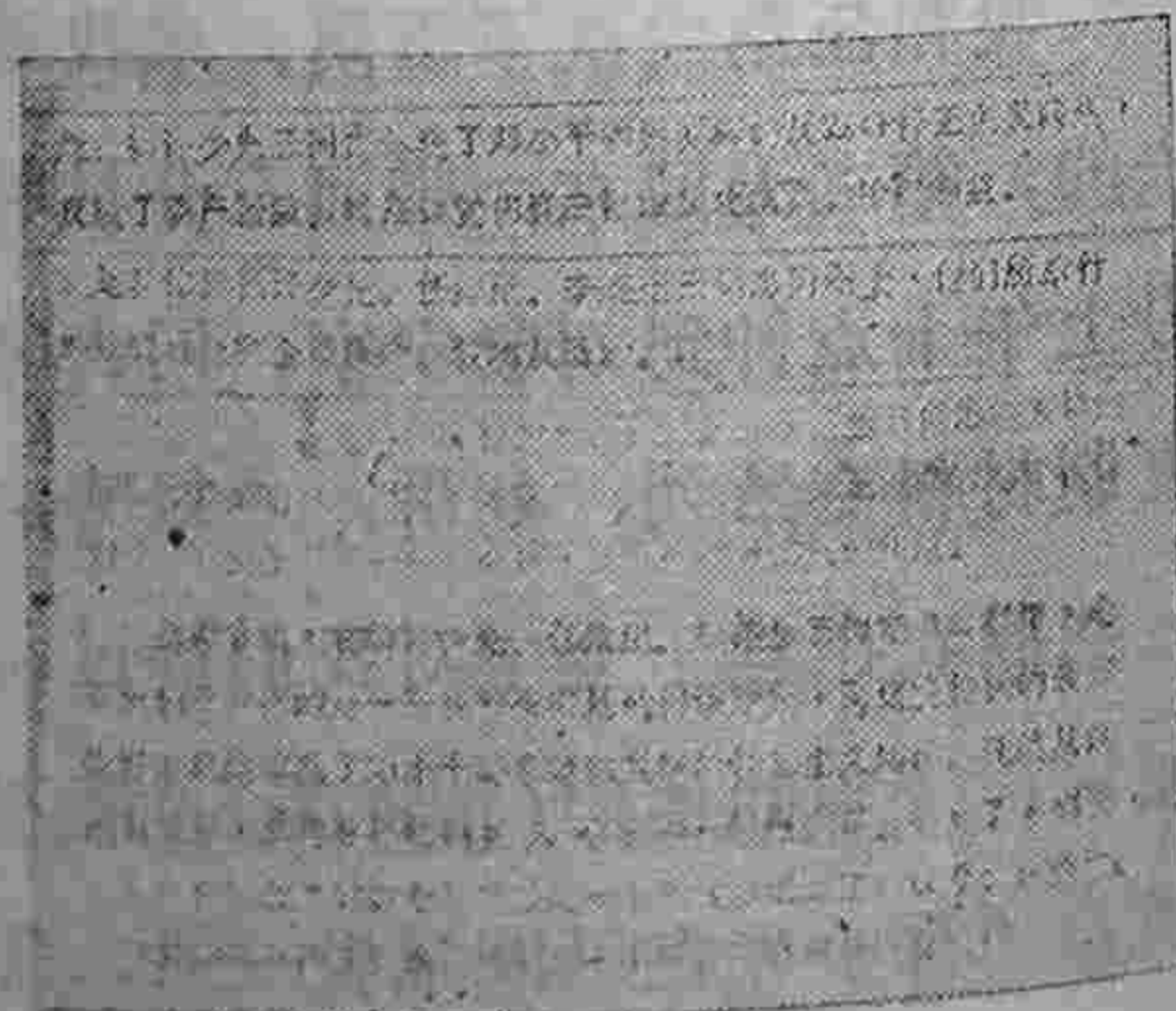
影印件原文

抓许少先三同志体现了邓小平翻案复辟的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反映了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阶级利益。

具体到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三同志问题上, 他们所奉行的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极端反动的。

如果说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三同志的直接效果是打击了党内资产阶级, 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抓他们恰好起到了长资产阶级威风, 灭无产阶级志气的作用。

总而言之, 在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三同志的过程中, 走资派们所奉行的是一整套彻头彻尾的错误政策, 而这些错误的政策恰好形象地体现了邓小平那条翻案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既然从路线到政策, 从指导思想到抓人手法都一概错完了、错定了, 那么, “无条件释放”的口号显然就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正确口号, 商业广大职工的这一严正要求当然就是一个针锋相对的政策要求!



(五) 刘殷农等人打击迫害检举、揭发者及受害群众, 甚至把蒋×(揭发人)关押了一百零八天, 直到揪出“四人邦”后才释放出狱

1、汪多闻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的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六月市委党干会期间, 一天晚上, 我和古安生、杨宝贵三人到刘殷农家。我问刘(殷农), 过去你说许(少先)是人民内部矛盾, 怎么会有强奸的事, 而且是“持枪”? 刘殷农对我们三人说: “过去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最近听说他(指许)确有这个问题, 而且据说至今他还在交代说有这种事, 他的交代与女方的揭发是一致的。”刘殷农以暗示的口气婉惜地说: “恼火就恼火在他在里面的交代与外面的揭发是一致的, 如果只有女方的揭发, 他自己没有交代还好办一些。”并保证说: “还是有希望的”。他这个暗示我们都听得出来。当晚从刘殷农家里出来, 我和古安生、杨宝贵骑车回家的路上, 古安生就说: “要是能让老许知道外面的情况就好了, 他就不会乱交代了。”杨宝贵则说他认识二监的一个人, “以后可以找他想想办法。”

去年(一九七六)七月, 一个晚上, 我和古安生一起到了刘殷农家, 谈到我准备到玉溪亲自了解一下的打算。刘殷农听后支持地说: “你们去一趟是有必要的。”

大约是去年(一九七六)七月底的一个晚上, 我和××一起去刘殷农家时, 我向刘殷农汇报了情况。刘听说我们还带了材料回来, 就很感兴趣地叫我把材料拿给他。

2、许××同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写给市公安局的控告信(节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钟, 许少先的妹妹许××和李××, 另外还有三个男的我不知道, 坐一辆北京牌小车到澄江县城叫了我父亲, 又开着小车到广龙找我。许××叫我跟他上昆明一转。我说: “现在接近期末考试, 时间紧, 我不能离开学校。”许××说: “我已经给你请好假了。”我没有来得及写假条, 就跟他们走了。

当天晚上, 吃过晚饭, 在(昆明)和平前村四十四号许××家里, 许××给我说: “许少先已经出来了, 现在在商业局, 这是保密问题, 这次找你来, 主要是要你写一份不承认许少先强奸过你的材料, 让他恢复职务和党籍。”说话期间, 许××把笔和纸都找到我面前, 但我一直没有写。这时, 全德珍(许少先的老婆)、汪多闻、张×还有两个男的一齐来到许××家, 全德珍说: “老许的问题大部已解决了, 我们是一家人, 看在一家人的面上, 拉他一把, 许少先从前不把我当人看, 现在我都是想要顾全大局。”见我还是不愿写, 全德珍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他写好的材料说: “对你没有别的要求, 你把这份材料照抄下来就行了。”我想公安部门的同志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给我撑腰做主使我有伸冤的机会, 我决不能辜负党和公安机关对我的关怀, 决不能随便否掉我申诉过的事实。他们见我不抄, 全德珍就说: “话, 我们已经说的多了, 你要走什么路由你选, 蒋×(注: 她的丈夫)已经被我抓起来了, 如果你不抄, 我们就对蒋×采取必要的措施。”当时我考虑到蒋×安全问题, 只有含泪照抄下七份来, 并用食指按上手印, 其中一份是用水笔写给省委组织部的岳部长的, 六份是用复写笔写的, 时间是六月二十三日, 但写好后, 他们认为六月份太迟了, 又叫把六字改成五字。

写好以后, 全德珍就把全部材料带走了, 那些人也跟着走了。二十四日吃过中饭, 全德珍、汪多闻、××三个来了, 送我回澄江。

回来以后, 我想应当把这一切立即向公安机关反应(映), 让他们掌握情况, 并写材料给他们, 如果许少先的家属为他翻案, 就于(以)我写给公安机关的材料为准。

3、蒋×同志的揭发控诉

我的控诉

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反革命帮派，为了释放坏人许少先，搞反调查，对我揭发许少先的罪行后，进行了残酷的打击陷害，诬我是“杀人犯”，并强行关进监狱一百〇八天。

七五年我和我爱人揭发了许少先的罪行，许被依法处理后，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帮派就对我进行陷害，七六年七月初，他们同玉溪地区的行帮幕后策划，多次威胁我，要我为许犯翻案，被我抵制后，朱、黄、刘帮派八次派人到澄江威逼我爱人，最后强行把我爱人抓到昆明软禁三天，由×××写好翻案稿后，逼我爱人照抄了七至八份给我们，我向省市公安局控告后，朱、黄、刘行帮就对我进行陷害，派人到玉溪策划，把我们，我拖上汽车拉到昆明翠湖宾馆，当着地委常委的面把我打翻在地，逼常委逮捕我，常委不同意，他们又把我拉回玉溪，我回到宿舍，就有五个打手冲进我的宿舍，把我打翻在地，肋骨打断一根，腰部挫伤，脑震荡至今还有后遗症，并抄了我的家，把我揭发许少先的罪行材料底稿搜走，并把事先策划好的黑牌“杀人犯蒋×”和我随身携带的小刀挂在我的脖子上，用枪押上汽车游街示众，回公司后要我承认陷害许少先，当晚他们捏造了所谓“罪证”，就逼地委同意对我拘留审查，直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才释放。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把我从“四人帮”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忘不了华主席的恩情，将永远铭刻在心坎上。誓死保卫华主席。

玉溪地区运输公司职工蒋×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三、为反坏分子曹荣华、靳全新、马存兴翻案

(一)中共昆明市化工局核心小组的揭发

曹荣华是“四人帮”在云南培植的以朱、黄、刘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昆明市化工系统的资产阶级帮派头目。

多年来，曹荣华野心勃勃，疯狂篡党夺权，组织武斗队，搞打砸抢，迫害、镇压群众，揪斗领导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是昆明市的“南霸天”。他严重违法乱纪，包庇重用坏人，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偷窃国家财产达三千多元。生活上也极其糜烂，是一个十足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九七五年经市委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横行时，刘殷农支持曹荣华，大搞翻案活动，在市委常委会议上，刘殷农说：“曹荣华是右倾翻案风的受害者，（一）他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二）突出的是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的问题不能看得过重”。公开为曹翻案。在一九七六年市委召开的二十九次常委会上，竟有二十二次讨论了曹荣华的问题。刘殷农以“市委无权撤销曹荣华市革委委员职务”为借口，要挟市委硬把曹塞进市委党干会。刘殷农还到处游说：“曹的问题是造反派内部的问题，要让他复职，我们不能给走资派留下半点象征性的胜利。”（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曹率领打手，亲持九节钢鞭，冲击市委常委会会议，从上午一直围斗到深夜，强迫市委作出为曹复职的决定。刘还强迫市委动用专政工具，抓捕不同意让曹复职的橡胶厂职工，刘殷农为曹翻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刘殷农支持下，坏人曹荣华气焰十分嚣张，他纠集武斗队，冲击地书会，市委党员干部会和省、市委及化工局机关，揪斗、围攻各级领导干部、专案人员和革命群众。他到处大搞打、砸、抢，多次制造武斗事件，勾结市交通队个别坏人，制造了“七·三”事件，煽动民警罢岗，在政治上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他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煽动停工停产，使橡胶厂遭到严重破坏，这个厂一九七六年生产任务只完成一半，工业总产值只达到一九六六年的水平，倒退了十年。

中共昆明市化工局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

（二）中共昆明市轻工局核心小组的揭发

靳全新依靠帮派起家，通过突击纳新，窃取了我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付主任职务以来，追随“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培植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阴谋篡党夺权，是轻工系统资产阶级帮派的主要头目之一。他一贯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方针政策，丑化党的组织生活，无击吹捧林彪及其《“571”工程纪要》，是一个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五年贯彻省委二十六号文件时，经市委决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边劳动、边检查。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及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庇护下，由刘殷农直接操纵，以市委名义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为靳全新翻了案，复了职。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根据靳全新的罪行，经市委批准，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拘留审查，十月十八日逮捕法办。

靳全新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在撤职以后又翻案、复职，完全是刘殷农包庇、支持的结果。去年（一九七六），靳全新的整个犯罪活动，都是在刘殷农的授意下，按照刘殷农说的“要学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与走资派斗争”的反革命策略进行的。靳全新上靠刘殷农在市委常委内“斗”，在下边指挥帮派骨干闹，多次冲击会议，绑架、围斗领导干部，大打出手。一九七六年六月，市委党干会前，靳亲自找刘殷农，并通过邦兄弟王云仙、马首良等人，向刘殷农告黑状、送黑报告，为其翻案游说。刘殷农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靳全新不管有多少问题，是刮风中受迫害的新干部，他的问题（指一九七五年对靳的处理）一定要解决。”刘殷农并伙同史可鉴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七日在我局供销经理处，对轻工系统资产阶级帮派的一些人说：“今晚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你们的问题，保证你们满意，小靳的问题，明天六天前给一个好的答复。”刘在市委常委会上施加压力，逼迫常委同意给靳复职，并参加市委党干会。由于轻工系统广大干部、革命群众的坚决抵制和积极反对，因此，靳才未能复职和参加市委党干会议。但刘殷农并不甘心，变本加厉的加紧阴谋活动。八月五日在市委常委会会议上，批评局核心小组对靳的问题的报告是“包藏祸心”，八月九日在局举办的所谓关上学班班上，批评李光祖同志在靳的问题上“耍了几面派”，迫令局核心小组对靳的问题写出一个“态度明朗，不留尾巴”的翻案复职报告。就是这样，在刘殷农的直接操纵下，市、局资产阶级帮派互相勾结。靳全新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恢复了职务。

在刘殷农的指挥下，现行反革命分子靳全新的破坏活动更为嚣张。一九七六年，他们在我系统大刮翻案夺权，层层揪“走资派”，停工停产，打、砸、抢等几股妖风，致使我系统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我关系被根本颠倒，阶级阵线被搅乱，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生产受到严重损失。一九七六年工业总产值只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三，倒退了七年，出现了历史上未有的全局性亏损的严重状况。这就是刘殷农在我轻工系统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和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中共昆明市轻工局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三）中共昆明市重工局核心小组的揭发

马存兴是我省以朱、黄、刘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是个屡教不改，五毒俱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打砸抢的坏分子。从小在家乡沾益就行窃、摸包包，一九五五年因偷窃被开除团籍。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自动离职，在社会上搞投机倒把，奸污妇女。一九六五年经五华区批准免于刑事处分，追缴全部赃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抢，多次作案，为非作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并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策划黄土坡伏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二十七人伤残。群众称之为昆明市的“西霸天”、“马倒把”。

但是，在一九六八年却窃据了昆明市革委委员及无线电元件一厂革委会付主任的职务，并于一九七一年“突击纳新”混入党内。一九七五年贯彻省委二十六号文件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的运动中，经我局核心小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会议决定开除党籍。并经市委常委批准，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刘殷农明知马存兴有上述罪行，但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蓄意进行包庇，公开为其翻案。一九七六年我局核心小组向市委常委汇报情况时，刘殷农跳出来对我局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施加压力说：“你承认不承认去年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承认了就应该彻底纠正，恢复职务。至于他（指马存兴）的问题，今后由主管部门作为正常业务处理”。接着，刘殷农又伙同前市委主要负责人炮制了一个市委文件，将马存兴解除隔离，并恢复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有了刘殷农做靠山，马存兴更加死心踏地投靠“四人帮”及以朱、黄、刘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猖狂地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大搞篡党夺权活动，重新拚凑了以马存兴为首的元件一厂的总支班子。忠实地执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层层揪“走资派”，围斗、殴打革命领导干部，煽动停工停产，大肆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反革命言论。挥午“唯生产力论”的大棒，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造成元件一厂瘫痪八个月之久，亏损十九万余元。

中共昆明市重工局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六部分

疯狂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刘殷农紧跟“四人邦”，把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始终把罪恶的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四人邦”不批林，假批孔，搞“三箭齐发”，接连抛出“批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等反革命黑货。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等几个人，无耻吹捧“四人邦”，鼓吹要为“四人邦”“上台”“扫清障碍”，明目张胆地诽谤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代表儒家思想”，“主张保守、复辟、复旧”，“是运动的阻力”。当敬爱的周总理病重住院以后，刘殷农一伙狂叫“总理体面下台”。一九七六年，我们失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全国人民万分悲痛之际，刘殷农等人丧心病狂地攻击周总理“犯错误”、“有问题”、“盖棺不能定论”，“死了也要批”。他们把广大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打成“反革命”，并以此向“四人邦”请功。刘殷农及其同伙，还专门派了帮派骨干四人到北京，找“四人邦”的黑据点乞讨黑旨意。

此后，刘殷农及其同伙又根据“四人邦”的旨意，策划、怂恿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昆为首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凌晨，公开贴出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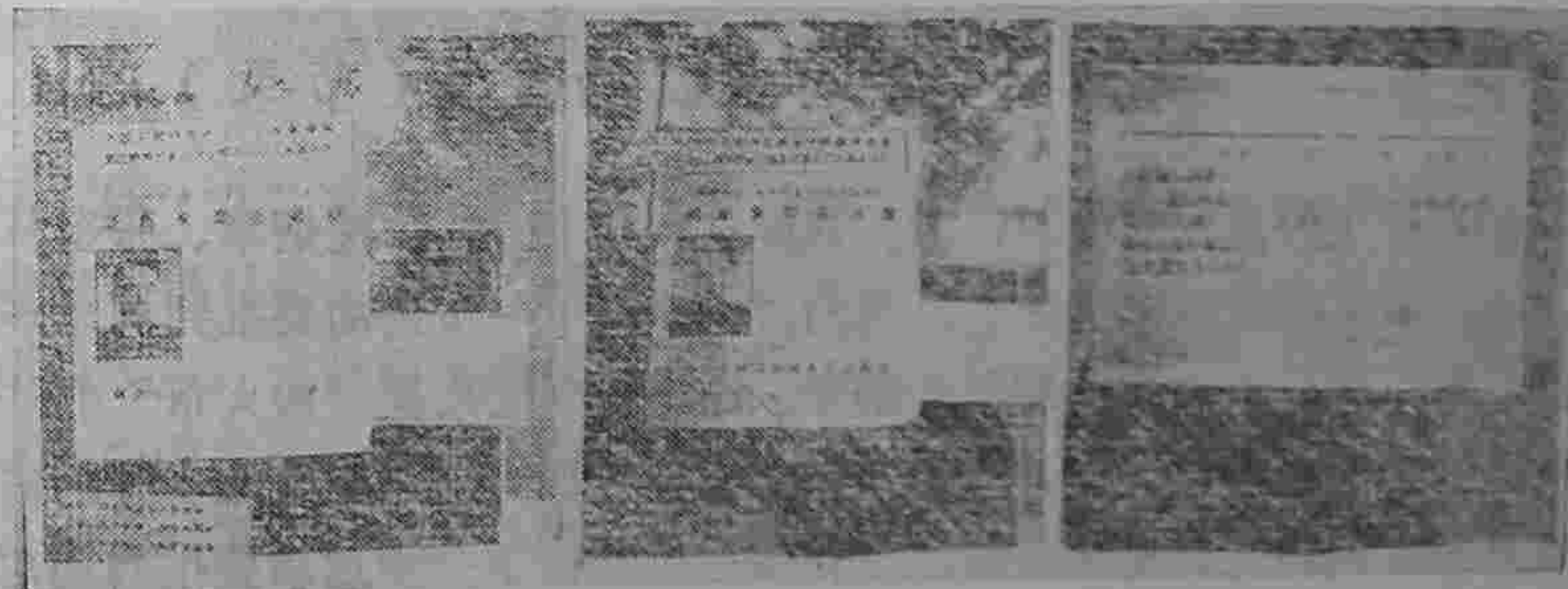
“5·18”反革命案件发生后，刘殷农等人为了掩盖自己，包庇同伙，陷害省委及昆明军区负责同志，篡夺“5·18”专案领导权，破坏专案侦破工作。

一、把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事件”

(一) 以朱、黄、刘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偷拍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的照片

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初，革命群众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在博物馆橱窗内贴出了诗词、挽联、文章以及剪贴的周总理遗像。以朱、黄、刘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把这一切都打成“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和胡恒铿为头目的《云革群》中的一小撮坏人，在橱窗上涂写“谁敢打着悼念周总理的旗号，把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坚决打倒谁！”“谁要是借助死人灵魂搞反革命暴乱，我们就和他斗到底！”“省委必须彻底追查云南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甚至在周总理的遗像上涂写“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反动标语。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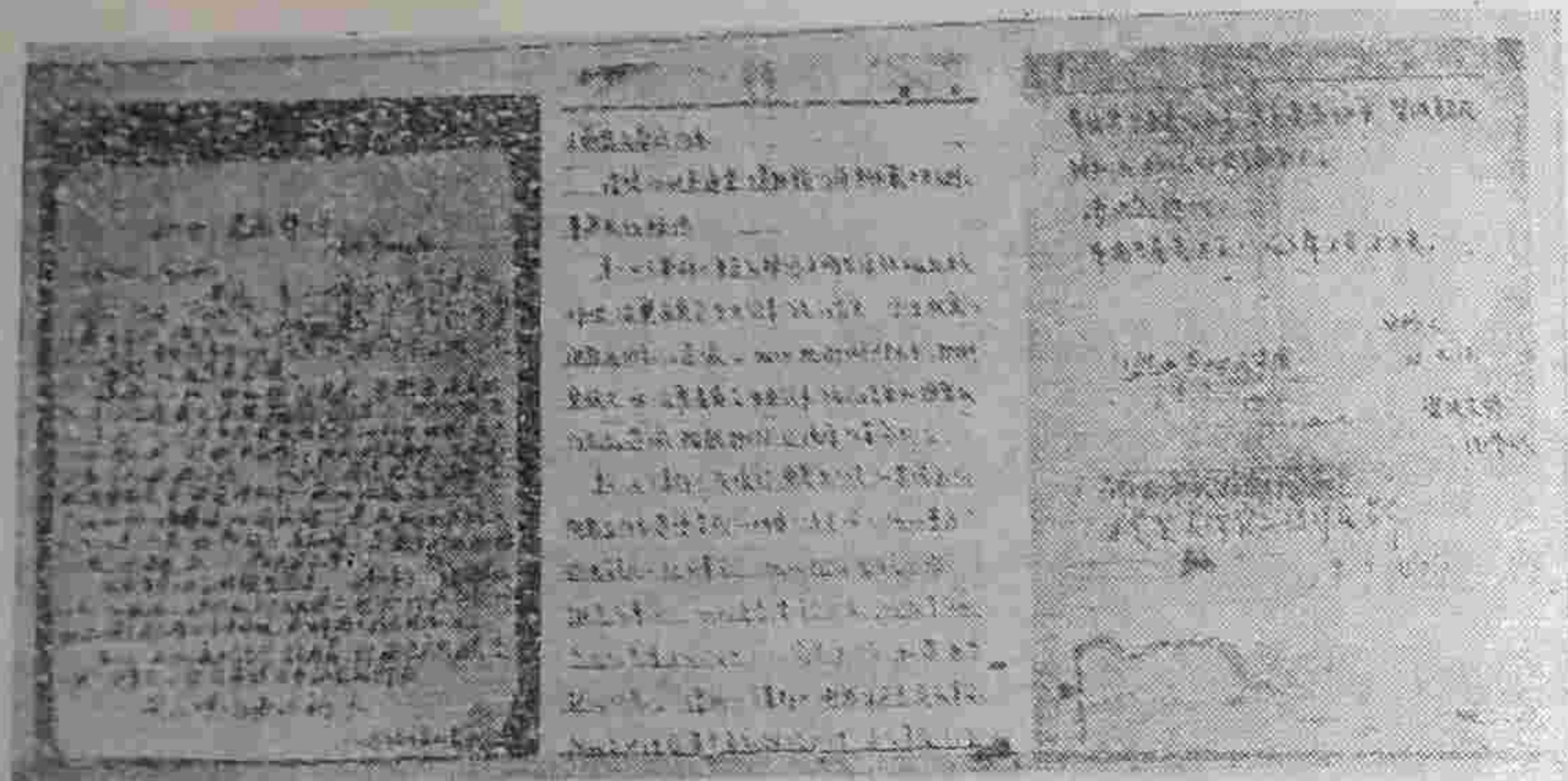
下面是帮派偷拍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照片的影印件



(二) 以朱、黄、刘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又一次拍下的所谓“反革命罪证”的照片

一九七六年四月中旬，革命群众针对《云革群》中的一小撮坏人的反革命活动，又贴出了《紧急呼吁》等大字报，愤怒揭发王永昆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以朱、黄、刘为头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又一次把群众的革命行动打成反革命，并拍下了所谓“反革命罪证”的照片。

下面是这张照片的影印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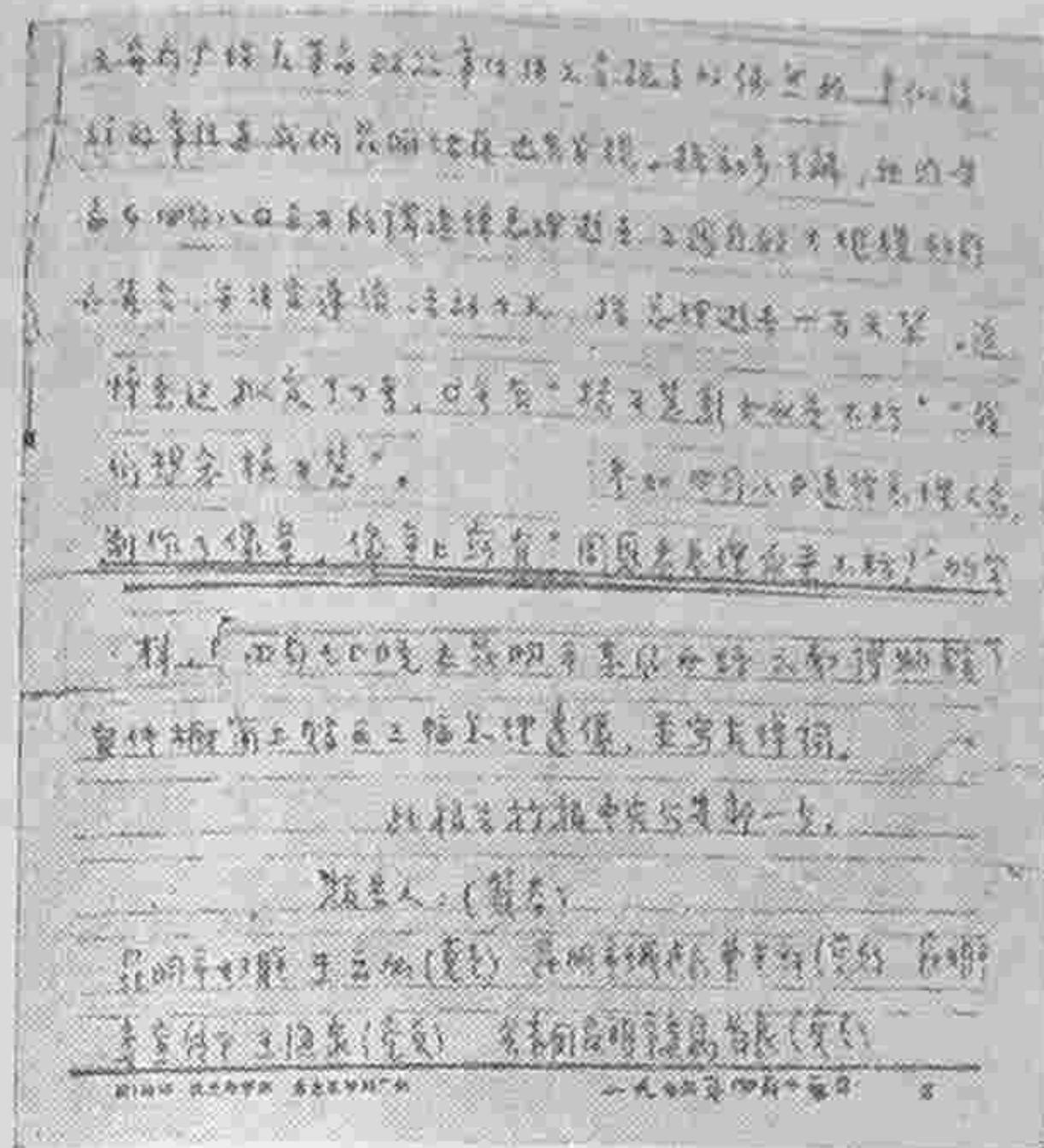
(三) 刘殷农及其同伙炮制所谓《云南“四·八”未遂反革命事件》的黑报告，向“四人帮”告黑状

1、黄兆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四月八日晚上，我、刘殷农和帮派核心沈炳章、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胡恒铿在杨慰农家里开会，我们讨论认为下一步运动要批判周总理。但还要看一看“四人帮”有什么部署，即派沈炳章、涂晓雷到北京摸“四人帮”的底。会上还分析了王永昆的动向，徐宝兴说：“王永昆他们分析认为周总理是邓小平的后台，四个现代化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来的，现在都在批判。下一步运动要批判周总理，他们根本不会组织悼念活动。”

我们把四月八日一些群众准备在检阅台广场召开悼念周总理的大会打成未遂反革命事件，到处收集材料，由沈炳章、涂晓雷带到北京向“四人帮”的黑据点告黑状。我们还逼迫省、市委把群众扎花圈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四·八”会议都当作反革命来追查，压制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怀念，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2、刘殷农指使曹光祥等人炮制的所谓《云南“四·八”未遂反革命事件》黑报告（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类似这样的事件在我们昆明地区也有发现。据初步了解，他们准备在四月八日召开所谓追悼总理逝世三周年的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并决定连续活动十天，搞总理逝世一百天祭。

追悼会还拟定了口号，口号有“杨开慧烈士永垂不朽”，“我们想念杨开慧”。

参加四月八日追悼总理大会，制作了像章，像章上写有“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字样。

四月七日晚在昆明市东风西路云南博物馆宣传橱窗上贴出三幅总理遗像，并写有悼词。

报告人：（签名）

昆明市妇联 王云仙（党员）昆明市城建局 曹光祥（党员）

昆明市委宣传部 王海泉（全）（党员）共青团昆明市委 马首良（党员）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

3、王海全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的交代揭发（节录）

云南以朱黄刘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追随“四人帮”，反对周总理，铁证如山，罪责难逃，所谓昆明未遂的“四·八”反革命事件的谎言及其书面报告，就是证据。

所谓“四·八”反革命事件的谎言和书面报告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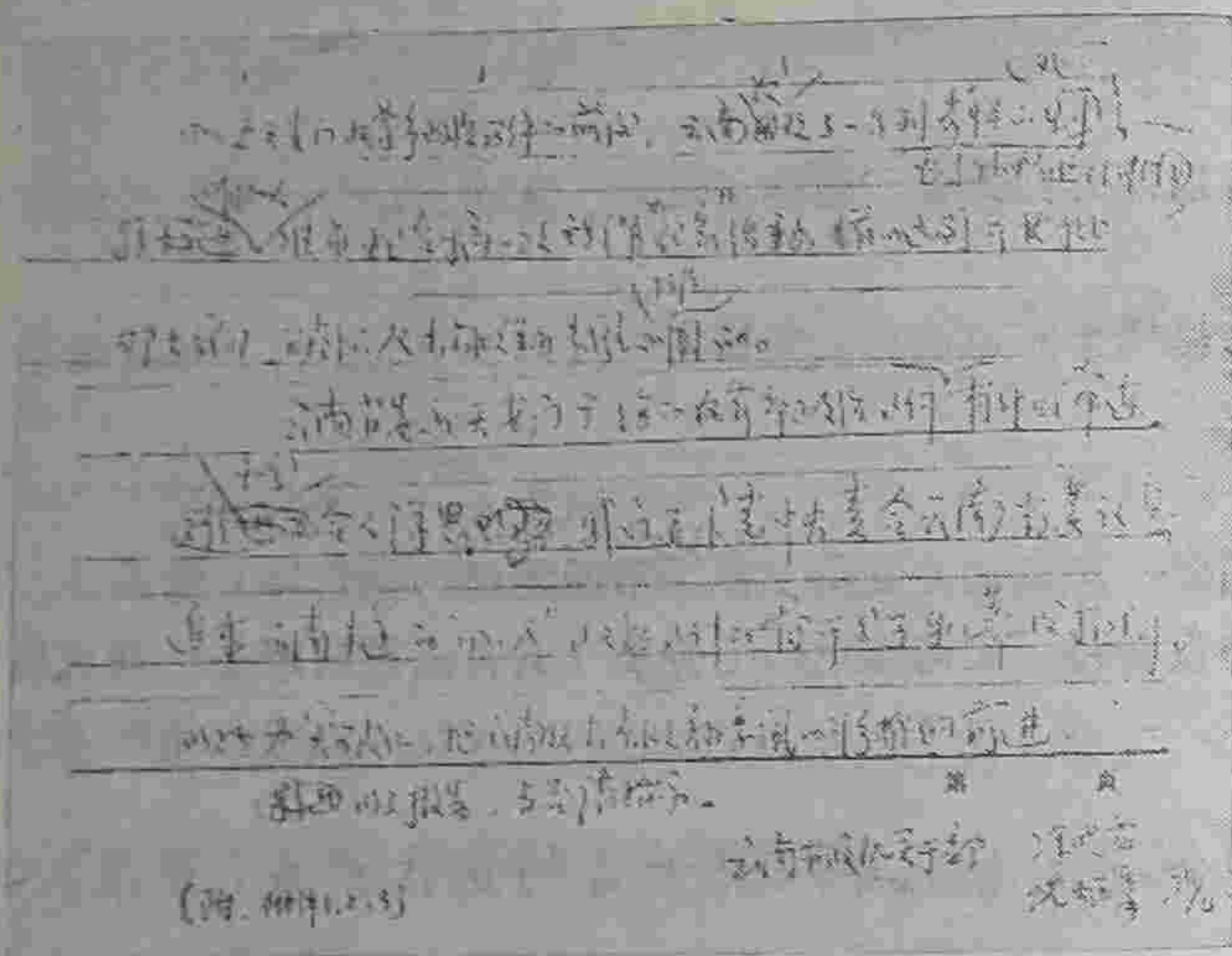
刘殷农召集马首良、曹光祥、王云仙和我，在曹光祥家里就四月（月）七（日）广播进行议论。刘殷农说：“我们昆明这个未遂的‘四·八’事件，是值得注意的事，你们再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给省市报。”

四月十一日下午，刘殷农说：“我们昆明地区也有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类似的未遂的‘四·八’反革命事件。这些人是要以悼念总理为幌子，搞反革命活动，我们要把文章做透，舆论造够。小马（首良）把这些情况汇集起来，写一个报告，搞出附件，报到中央去”。刘殷农又说：“省里朱克家在亲自抓这件事，你们可以找他反映。通过他可以摸到一些上情，也可以把我们昆明情况反映上去”。于是，我就同曹光祥、马首良一起到军事博物馆去，把橱窗上贴着的怀念总理的诗词和感想（抄）回来。马首良

良在外边放哨，我和曹光祥挤在人群里抄，曹念一句，我抄一句。回来以后，我们三人又在我家里重新誊写了一遍，誊完后，我们三人又在曹光祥家商量写报告。马首良写好报告，在曹光祥家复写。由马首良、曹光祥、王云仙和我四个人把报告递给了朱克家。

这个报告是朱、黄、刘直接授意我们搞的一个黑报告，要害就是要把昆明地区准备在四月八日悼念周总理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向“四人帮”告黑状”。我同曹光祥、马首良去抄的军事博物馆橱窗上贴的悼念总理的诗词和感想，就内容而言，完全是出于革命群众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深切怀念，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完全是正当的，革命的行动。而我们当时确（却）把这视为反革命的行动。

4、涂晓雷、沈炳章根据刘殷农提供的材料在北京写成的 向“四人帮”告黑状的报告底稿(节录)的影印件



注：，这是涂晓雷转移到杨慰农住地的材料

影印件原文

四·五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前后，云南发现了一系列奇怪的蛛丝马迹（附件四），有的人准备配合搞一次所谓“纪念”活动，借以达到干扰批邓大方向，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目的。

云南省委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什么牵连，十分令人深思。我们要求党中央责令云南省委认真追查云南未遂的“四·八”政治事件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指挥。以此为突破口，把云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前进。

云南省级机关干部 涂晓雷

沈炳章

20/4

5、涂晓雷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四月八号晚我们在杨慰农家召开串联会。参加的人有：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沈炳章、徐宝兴和我。

这次会议决定由刘殷农负责组织昆明市邦派力量调查“四·八”事件，向邦中央反映。二是决定我们四月中旬上京，除反映云南情况外，还要了解天安门事件的背景和摸中央路线斗争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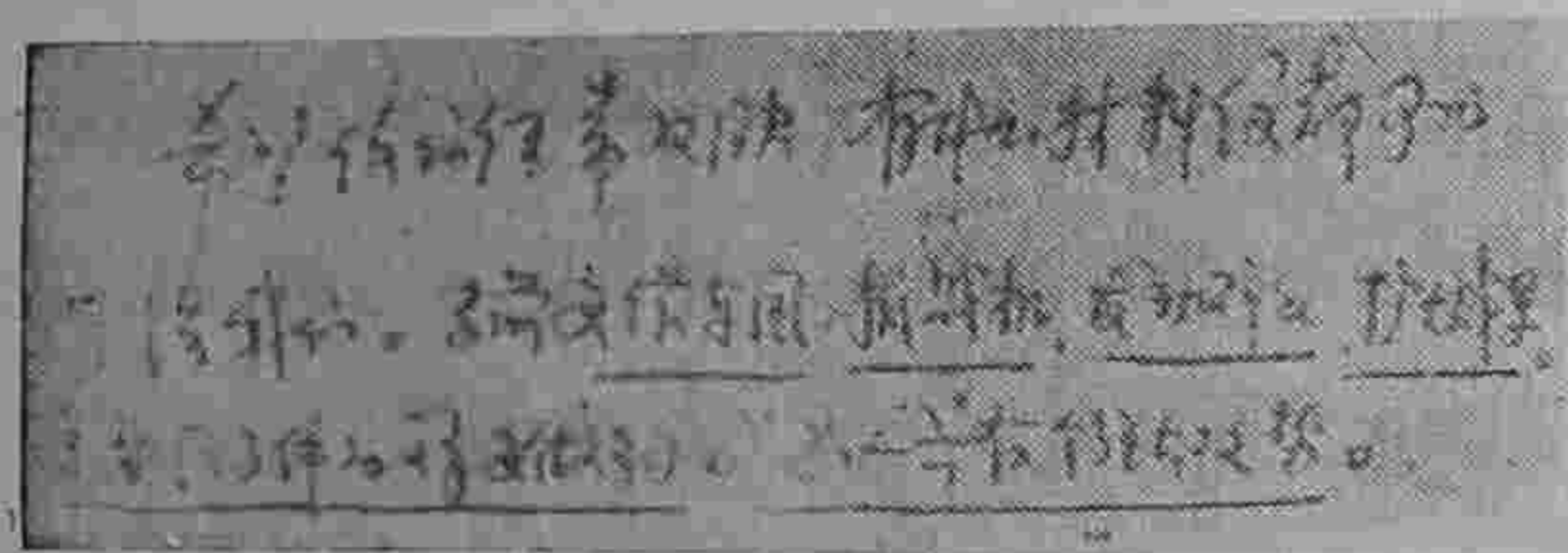
调查所谓“四·八”事件是在四月中旬由刘殷农组织昆明市曹光祥、马首良、王云仙、王海全等人进行的。刘（殷农）从公安简报上提供的一些材料，最后拼凑成所谓《云南昆明未遂“四·八”事件的情况报告》，署名是昆明市的曹（光祥）马（首良）王（海全）王（云仙）四人。在我们上北京之前（四月十七日），由刘殷农亲自交给我，说邦他们转送中央（四人帮）。

钱厚源、沈炳章和我三人认为昆明市四人关于“四·八”事件的报告不行，没抓住要害问题，于四月二十号我们三人又改写了《云南未遂四·八事件的情况报告》，突出了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保邓事件，点出了重机厂的所谓反标事件，企图一举引起“四人帮”的注意，为“四人帮”插手云南问题，镇压悼念总理的革命群众提供炮弹。改写的报告由沈和我签名，由张健农通过文化部转送一份，我们自己送《人民日报》一份。

二、按照“四人帮”黑旨意，怂恿王永昆等人公开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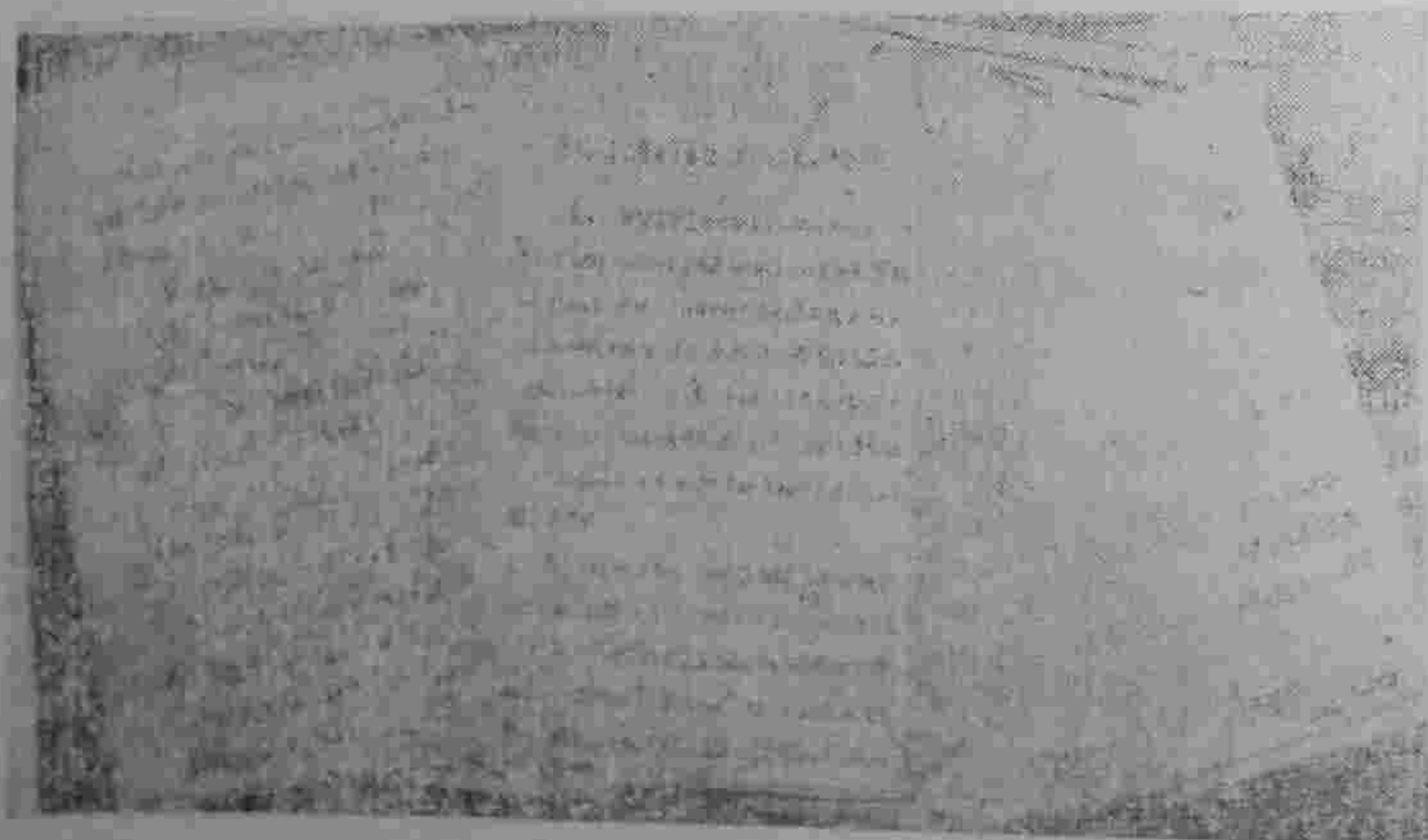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再也按捺不住他们反革命的狼子野心，一方面指派心腹干将涂晓雷、沈炳章、钱厚源、包亚芳等人去北京，通过“四人帮”的黑据点，领取黑旨意。另一方面控制并怂恿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昆、胡恒铿为头目的《云革群》中的一小撮坏人，公开贴出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

（一）涂晓雷从“四人帮”处领回的黑旨意记录 （节录）的影印件



注：这是涂晓雷转移到杨慰农住地的材料

（二）徐宝兴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希望你们经常反映，有什么材料信都可以写给我们。当前要借东风，抓战机，发动群众，扩大战果。天安门事件的文章要做够。“五·一六”有个强大攻势。

影印件原文（节录）

关于涂晓雷（从北京）回昆后的一次串连会
时间：（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天左右
地点：杨慰农家

会议实际上分成两段，前一段主要议王永昆动向，时间占用不多，后一段主要介绍涂晓雷去北京的情况，这是主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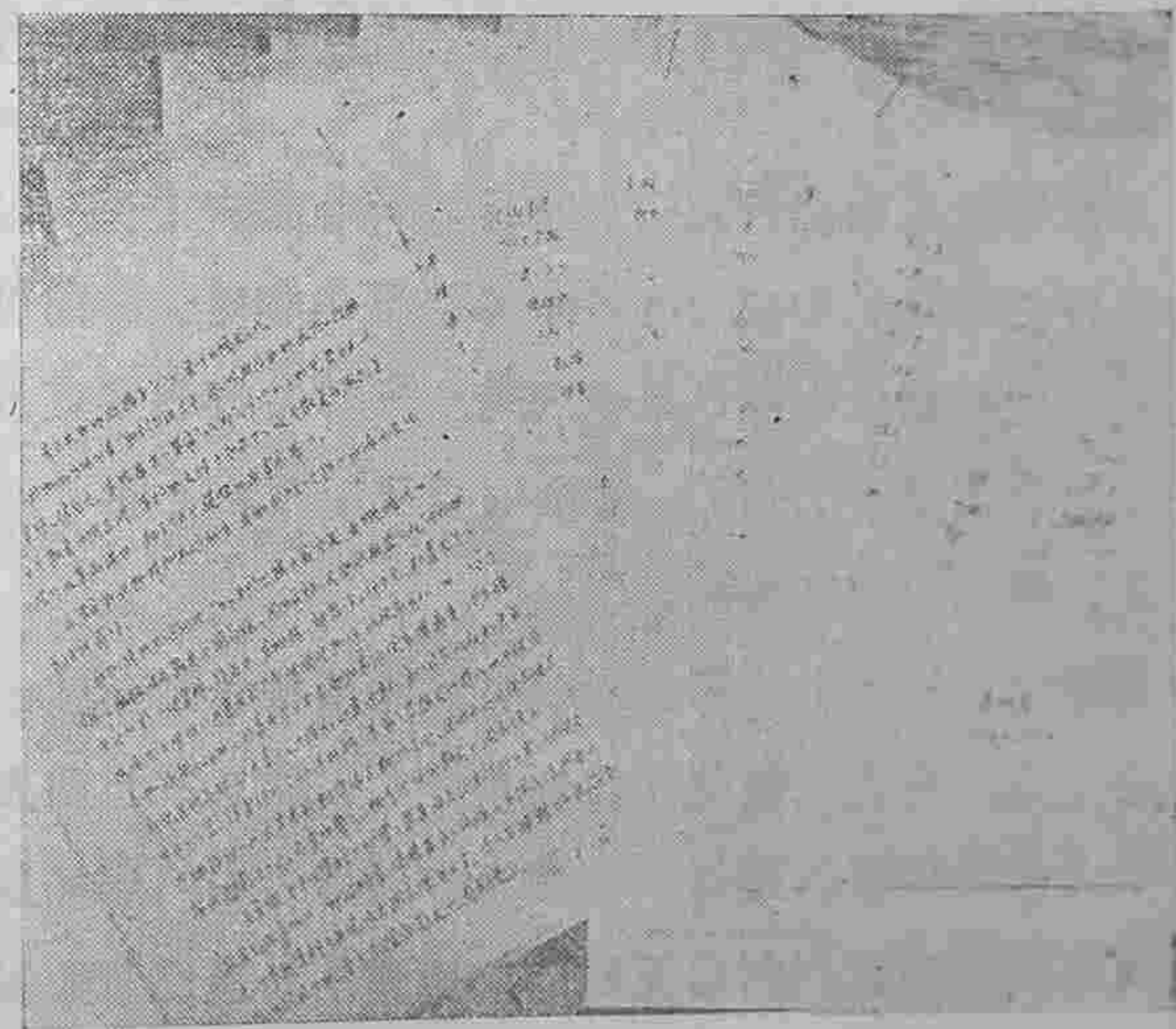
会议开始，谈了王永昆的动向，以及王永昆认为运动发展要公开“批周”约交换意见，如果观点一致，就联合行动。

涂晓雷讲，关于这个问题议论是多的，有公开提出“打周”、“批周”的，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舆论不够。这次在北京，就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意见是要文章做透，文章做透了，问题也就清楚了。“五·一六”中央（“四人帮”）还有文章，我们也要配合这个日子造舆论。

刘殷农讲，关于运动会发展到批周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但目前看来要公开搞，确实人们不会接受，搞不下去，因此还是涂晓雷讲的按上面（“四人帮”）说的集中精力批邓。当然他们真搞也可看看动态，有什么反响，如果没有什么再搞也不迟。

黄兆其讲，关于王永昆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态度是：他搞我们不反对，但我们不参加，也不必抢这一头功；另外他们搞也可以从他们搞的过程中看看动态和反响。

（三）黄兆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节录）

从批林批孔运动以来，特别是在去年（一九七六），我、刘殷农和帮派核心沈炳章、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等人紧跟“四人帮”，多次以分析形势为名，议论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策划和支持王永昆等人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四年初，我和刘殷农以及“齐向阳”山头的核心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等人认为周总理是站在老家伙一边，是守旧势力，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去年（一九七六）三月地书会召开前的一天下午，我、刘殷农、沈炳章、涂晓雷、徐宝兴在我家里开会，分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挂帅人物决不是邓小平一个人，上有后台，下有社会基础，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影射攻击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

我们派徐宝兴、胡恒铿与王永昆等人搞联合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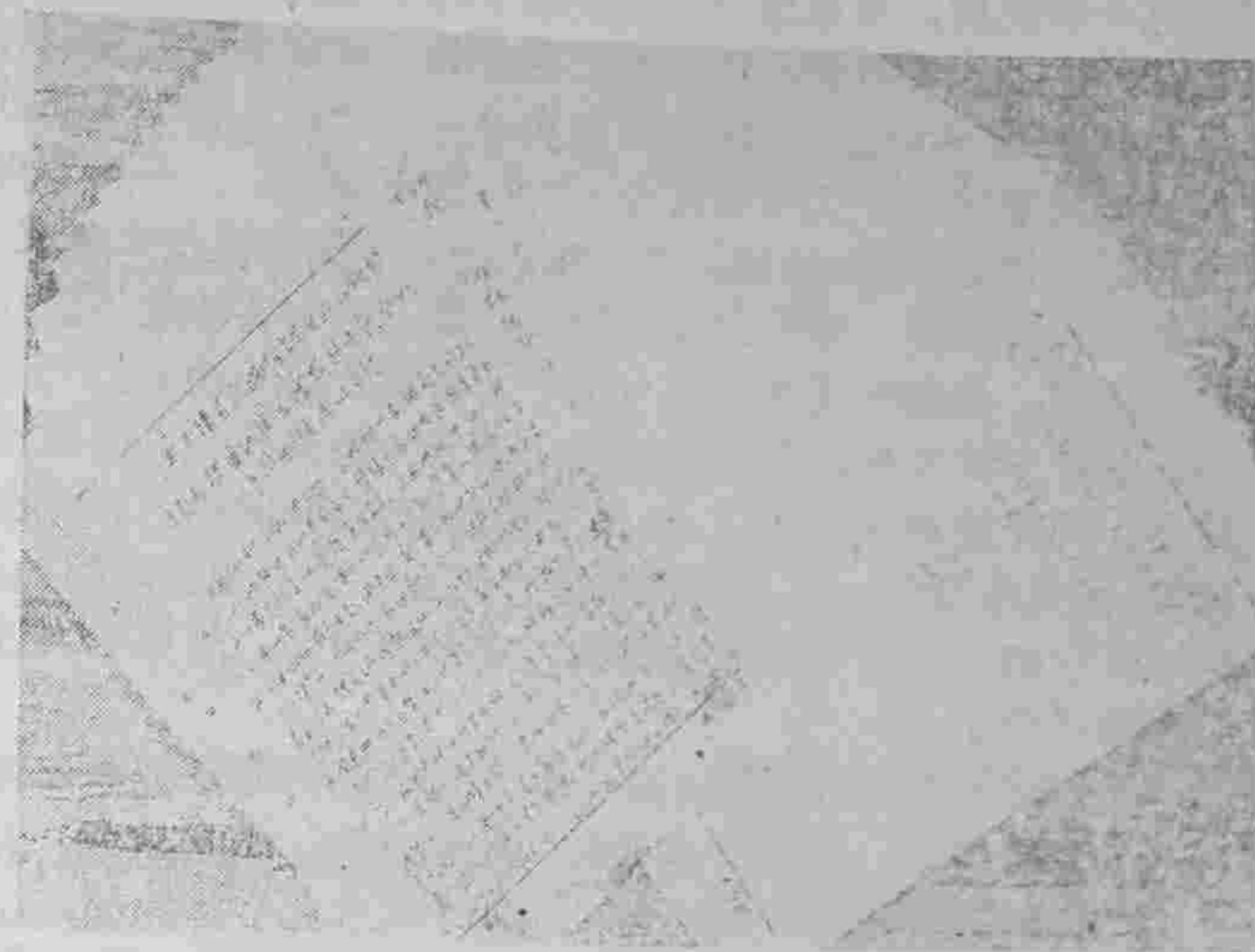
去年（一九七六）二月底我从农村回来后，徐宝兴和涂晓雷告诉我关于与王永昆搞联合行动的情况。三月地书会议后，我、刘殷农和邦派核心沈炳章、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胡恒铿在杨慰农家里开会，分析到王永昆这股力量搞得不好有破坏性，增加我们的对立面；搞得好可以利用这股力量，要继续把这股力量拉到我们这边来，控制在我们手里。确定由徐宝兴、胡恒铿继续做王永昆等人的联合工作，方针仍然是在组织上不联合，可以搞一些联合行动。

实际上，胡恒铿和王永昆之间不仅有联合行动，而且有统一的组织。他们把批林批孔运动中“齐向阳”、“大批判”、“反潮流”三个山头的一部分骨干和群众组织在一起，统称《云革群》，王永昆任司令，胡恒铿任政委，常以《云革群》名义出大字报，也以胡恒铿、王永昆联名出大字报，这种联合行动一直延续到“五·一八”案件发生后。胡恒铿、王永昆等人组织的《云革群》成为资产阶级邦派体系所控制的一支别动队。

去年（一九七六）四月中旬，涂晓雷临去北京前，我对涂晓雷说：“你去北京后要了解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内幕和中央内部斗争的情况，有什么情况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徐宝兴也到我家找我，又谈到王永昆等人策划要打倒周总理的问题，我说：“涂晓雷和沈炳章就要去北京了，他们去要了解中央（指“四人帮”）对下一步运动有什么新的部署，等他们回来再说。”

去年（一九七六）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刘殷农和邦派核心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在杨慰农家里开会，会上由涂晓雷汇报他和沈炳章等人去北京找“四人帮”的黑据点挂勾的情况，传达了清华大学吴炜煜的黑话：“要充分利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把文章做透。”吴炜煜的这句黑话煽动我们利用天安门广场事件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党中央。在会上徐宝兴提出：“王永昆他们要找我们分析一次形势，其他问题都好说，王永昆提出来要和我们联合起来批判周总理，这个问题怎么答复？”我们讨论认为周总理是有问题的，现在要公开提出批判时机还不成熟。方针是王永昆等人要批判周总理，我们不反对也不参加。王永昆打对了，我们再跟上，王永昆打错了，反革命让他去当。利用王永昆等人说出我们不敢说的话，干我们不敢公开干的反革命活动。实质上我、刘殷农和邦派几个核心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

（四）罪犯王永昆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五日交代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节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初的一天中午，胡恒铿带着省林业局的艾文彬到我家里，胡恒铿对我说：“现在社会上有传说，说你要组织人搞掉周活动，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这纯属造谣嘛，我怎么会搞掉周活动呢？这一情况你是了解的嘛。”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下午二点，徐宝兴说：“四·五事件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搞起来的，他们借悼周为名，矛头是直指洪文、春桥、江青、文元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是借助着周这个死人的灵魂，来压活人的。”

五月二号晚上，我到唐贵春家后，经胡恒铿介绍，我同张奎林认识，张奎林说：“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两位司令（指我和胡）领导很有方，搞团结、联合，干劲很大，成绩很大，大方向完全正确，我表示敬佩，我走访了很多地方，你们很得人心，群众是积极支持你们的，只要你们坚持这样搞下去，再接再厉，前途是光明的，我个人是衷心支持两位司令的。”胡恒铿说：“我们决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希望。上阶段，由于我们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团结联合，成绩的确是很大的，我们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人的支持，下阶段，我们仍然要继续这样搞下去，要不断地扩大战果，夺取新的胜利，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纪念日即将来临，我们要用集体和个人的名义写文章纪念这个节日”。听了他俩的讲话，特别是张奎林那番吹我的话，及时而有效地解除了我心头长期埋存着的怕打总理后，而陷入孤家寡人的心头之患，特别是胡恒铿着重强调要“不断地扩大战果，夺取新胜利”的打总理的隐语，更使我感到他们也要下手了，我们也该作准备了。所以，他们这番演说，促使我们加快了“5·18”行动的准备活动。

五月三日，胡（恒铿）说：“据我分析，以及从我掌握的材料情况来看，只要时机一到，黄、刘他们会出来打周的。”

我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可靠不可靠？”

胡恒铿说：“可靠的。”

胡恒铿讲完这一情况后，我思想上立即产生了两个想法，第一，我认为，黄刘同朱克家的关系是很好的，刘殷农和黄兆其要跳出来打周，肯定是同朱克家有策划的。而朱克家直通王张江姚这条线，可能王张江姚已经把中央（“四人帮”）要打周的意图告诉给朱克家了，所以朱克家才讲：“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然朱克家是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攻击和射影周总理的，经常要资产阶级政客手腕靠搞权术起家的黄、刘也是不敢贸然行动的。第二，既然黄、刘已经要行动了，那么这个头功就不能让他们抢掉，如果这个头功让他们抢掉，他们就更会权多气粗了，所以，这头功我们一定要抢到手。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三日上午，胡恒铿带着唐贵春几次来找我，但都没有找到，胡就留了一个条子给我。我吃完中饭午休后，就到了胡恒铿家，我问胡：“有什么急事？”胡说：“我听到一些风声，想找你商讨一下下阶段的形势问题。你对这段时间的形势怎么看？”

我说：“我计算中央十六日会发表社论的，我们部署了，如果十六日的社论中有打周的暗示，我们就动手干了。”

胡恒铿说：“我们这边也有人从北京回来了，北京和外地已经全面铺开了揭批邓小平，声势大得很，火力强得很，是前所未有的，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有些问题已经涉及到周头上了，如批林批孔中批大儒问题，‘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还有‘条例’、‘论总纲’和‘汇报提纲’，我估计这些都是周授意邓搞的，所以，现在打周没有过去的阻力大了，现在干比过去干的条件强多了，成熟多了。”

五月十七日中午一点半钟左右，夏良途到我家，我对他说：“报告我改好了，你把报告带到唐贵春家修改一下，复写成四份，今晚拿到张木寿家中研究。”

下午我到了胡恒铿家，晚上七点半钟左右，徐宝兴匆匆忙忙赶到胡恒铿家，我们三人就朝张木寿家去，到了张木寿家，夏良途、唐贵春、陶兴国、王庆中、王乐民就陆续到齐了。

夏良途说：“你写的那个报告，还是整不成，我又重新改写了一个，你看看。”我就说：“我不看了，你读吧。”我对徐、胡二人讲：“我们写了一个打周的报告，今晚主要是研究这个报告；请你们两位来，一起研究一下。”他两点头表示同意。夏良途读完报告之后，我就说：“只消作个别地方的词句修改就可以。怎么样？你们两位认为这个报告写得可不可以？”

徐宝兴说：“要得的，这个报告写得蛮好的。”

胡恒铿说：“要得，报告是写得好的。”

我就问徐、胡说：“我们现在打周，到底方向路线对不对？我们到底能不能打周？”徐宝兴说：“从路线上看，周肯定是有问题的，打周的大方向肯定是对头的，你们现在提出打周，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这个问题过去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早就提出来了，本来批林批孔就是要解决周的问题，但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由于周活着，他又有一帮人，阻力很大，批着批着就流产了，现在他死了，邓小平也揪出来了，阻力相对的减少了，尽管当时流产了，但批周一直没有停止过。周在四届人大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春桥同志针对这一问题写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文章，提出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科学论断，这就是和周对着干的”。我说：“签名一起干吧”。徐宝兴说：“名不签了，你们干和我们一起干都一样”。徐宝兴和胡恒铿就一直跟我们到了唐贵春家。王庆中复写报告，徐宝兴、胡恒铿就坐在王庆中旁边，看他复写，夏良途抄写大字报，等到报告快要复写好，大字报即将抄完，徐宝兴、胡恒铿见我们打周已既成事实时，他俩站起来就要走，徐宝兴说：“我们要走了，祝你们成功！”说完，就同我们握手告别走了。

三、“五·一八”反革命案件发生后，篡夺专案领导权，掩盖自己，嫁祸于人

（一）黄兆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交代（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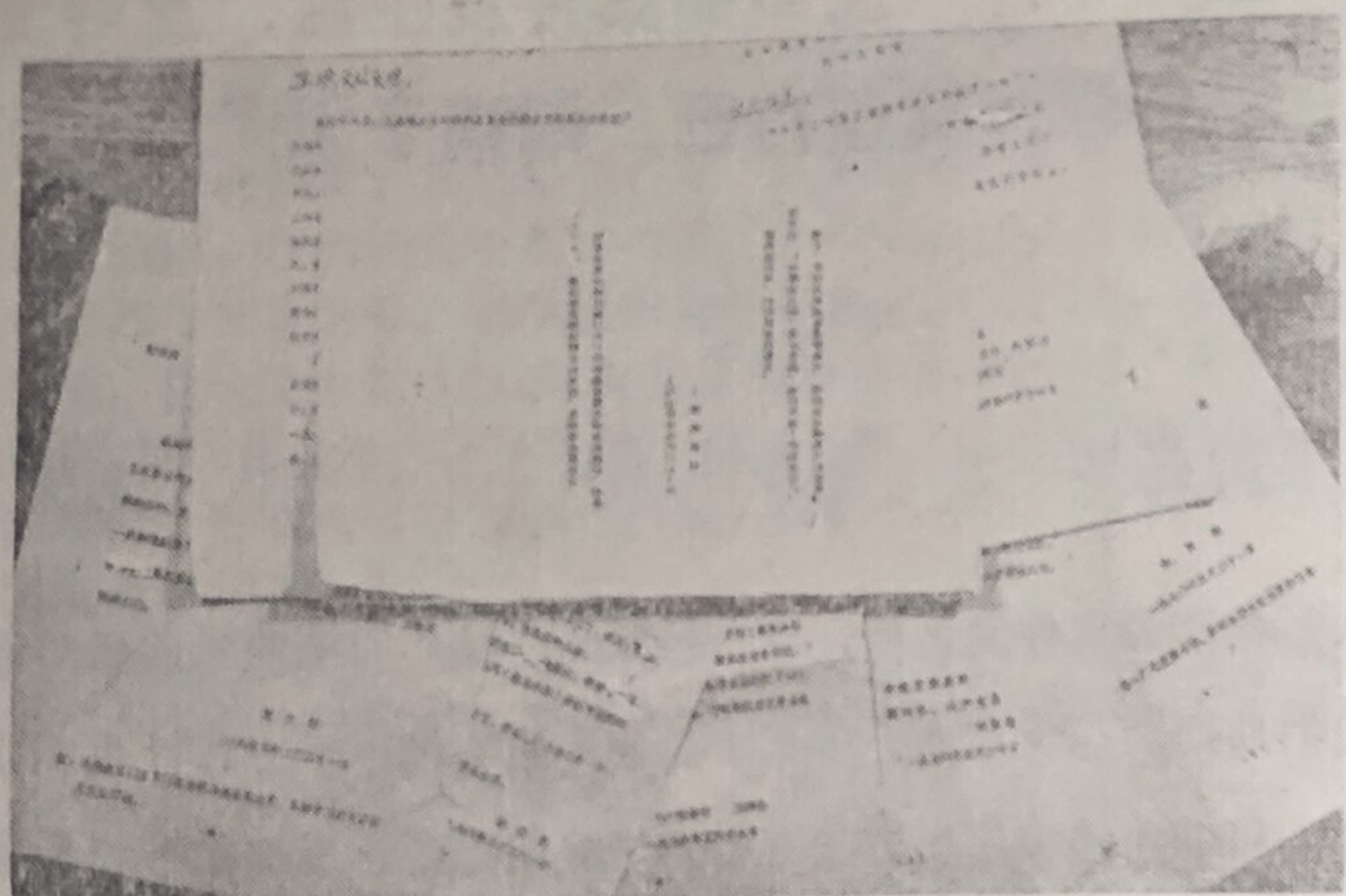
“五·一八”反革命案件发生后，我和邦派几个核心为掩盖我们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罪行，掩盖我们伙同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等人的勾结，千方百计包庇徐宝兴、胡恒铿，极力转移斗争目标，陷害军区首长和省委领导同志，达到掩护自己的罪恶目的。

去年（一九七六）五月十九日上午，我、刘殷农和邦派核心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胡恒铿在杨慰农家里开会，订立了攻守同盟，研究抓住徐宝兴、胡恒铿没有在反革命大字报上签名这个表面现象来掩盖参加王永昆等人策划攻击周总理的反革命实质。我们极力转移目标，拚凑黑材料，陷害王必成同志和新华分社领导同志，由我把这些材料向省委领导反映。会上还策划以“五·一八”案件发生在昆明市为理由，利用刘殷农在市公安局的老关系，由刘殷农直接插手“五·一八”案件的破案工作。

十九日会议以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活动。五月十九日下午，我和徐宝兴、胡恒铿进一步研究，采取以攻为守的反动策略。

刘殷农收集了徐宝兴、胡恒铿、黄梅先等人写的材料，向“四人帮”写黑报告。他积极插手公安部门，篡夺“五·一八”专案的领导权。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炮制所谓《斩断伸向云南的黑手，揭发“四人帮”罪行（提纲）》。去年（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下旬，我、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吴福全等人在省建何良泽家里开黑会，策划继续利用“五·一八”案件，炮制《春城魔影》等反动大字报，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进一步陷害王必成同志，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犯下了严重罪行。

(二) 刘殷农破坏“五·一八”专案的侦破，陷害领导，包庇同伙，向“四人帮”写的黑报告的影印件



黑报告(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

五月十八日，王永琨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在昆明街头贴出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反动大字报、大标语，被依法拘留以后，我认为对于彻底破获这一反革命政治案件，进一步挖出这一案件的幕后操纵者，搞清楚我省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一系列的反革命政治案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但鉴于省委目前的状况，故特紧急向中央报告如下：

王永琨的一些活动也是得到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一些人支持的。

因为新华分社社长于明和地方上的一些走资派关系十分密切。

关于侦破这件案子，省委是重视的，也是抓得紧的。但由于云南去年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凶，组织上是搞了“大换班、大撤职、大调动”的。昆明市公安局党委，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报告，去年被点名为派性严重的重点单

注：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查获的刘殷农给「四人帮」的黑报告

位，局长被调离，搞了专案，一个副局长被诬蔑为包庇特务案件，成立了专案，曾准备逮捕，后下放农村，三个副局长作了派性检查，一个下农村。整个领导班子作了大改组，现在掌权的局长、副局长是十年不工作的两个隐士。我原是公安局的干部，知道其中的内情，现在破案的人中，就有一些人是王永琨的朋友，我很担心在破案中内外勾结，里外串通，使这个案子成为无头案。特别是要靠这些人来追后台，我认为叫人难以置信的。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批评。

云南省革委常委
昆明市革委付主任 刘殷农
中共昆明市委常委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六

于明身为新华社社长听了谣言后，究竟向中央报了没有？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望领导根据此线索追查。

市委宣传部 王海金(全)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九日

(三) 原昆明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存旺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的揭发交代(节录)

“5·18”反革命案件是在“四人帮”的指挥唆使和煽动下发生的，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败露之后，“四人帮”又通过各种渠道破坏和影响这个案件的侦察和审讯，他们的罪恶目的是为了陷害革命领导干部，包庇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掩盖他们的罪行，保住他们的黑主子。我接受和执行了刘殷农陷害革命领导干部，包庇他们的同伙，破坏“5·18”案件工作的反革命阴谋计划。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刘殷农向我面谈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这个计划要点如下：

刘殷农说：“老马，王永琨这个大案件，市委叫你出来搞。省委对这个案件很重视，是旺丹同志亲自抓。案件重大，你给穆俊昌(市公安局局长)和其他人会报时要掌握分寸，案件上的重要情况，很保密的问题，不便给其他人讲的，可直接向旺丹同志报告。”

马恩齐说：“省公安局张泽民(付局长)还有一个处长在搞，老马去了怎么搞法？”刘殷农说：“案件已经定了，由市里统一搞。”“案子就是要搞清后台”。

马恩齐说：“徐宝兴如果有牵连就麻烦了”。刘殷农说：“这个情况知道，这是王永琨他们搞的，徐宝兴、胡恒铨他们是不赞成搞的。”

刘殷农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他一不是公安局的负责人，二不是分管政法的书记或常委，三不是市委委托。直接找我谈案子，定调子，议班子，其险恶用心就是通过我的手，通过公安机关的合法形式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由于我受“四人帮”反动思想的严重影响，在“5·18”案件上有一部分问题在思想上与刘殷农有共鸣，因此，我背着穆俊昌同志，背着公安局党委同志，背着“5·18”专案组的同志，利用我是专案组的领导人的“合法”身份，忠实的执行了刘殷农等人的黑旨意。

一、议论专案班子，充实专案人员。刘殷农勾通郭少川、张琅基通过我篡夺了专案组的领导权之后，又议论了专案班子的问题。

二、充当“四人帮”的打手，陷害革命干部，这是我在“5·18”案件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忍的。“四人帮”余党刘殷农为了扫清他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我和刘殷农有共同的行邦思想基础，因此我就和他们的阴谋结合起来了，所以在“5·18”案件上，我先后用了以下手段。

第一、通过报告的形式，变非法为“合法”。

第二、利用合法机会，套取领导指示，再用这些指示去布置工作。我向所谓的人民日报“记者”两次汇报都是作为重点问题讲的。向省委部分领导同志汇报也是重点问题之一。

第三、整黑材料，逼领导对问题表态。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七日，我先后两次整理了三份黑材料。这些材料，一是在上报时我按刘殷农说的给穆俊昌同志汇报时要掌握分寸、保密等，避开了穆局长，直接送郭少川同志，并请他转呈贾启允同志审阅；二是以材料不好处理为名，以时间对“材料”略加集中的形式，另用便条画龙点睛的办法，说明“问题”所在，逼着领导对这些问题表态。

第四、站在行邦的立场上，先入为主，对犯人的口供材料和一些现象问题，罗列起来，脱离当时的整个形势，进行所谓的分析、判断，并以强调注意工作方法，先打外围战、迂回战，逐渐深入的办法来掩盖问题的实质。

第五、名为交待政策，实为逼供信。

三、包庇反革命分子徐宝兴、胡恒铿，使他们长期逍遥法外。我按照刘殷农讲的“5·18”案件是王永昆他们搞的，徐宝兴、胡恒铿他们是不赞（成）搞的黑旨意我用以下的办法进行包庇。第一，在案件的审讯过程中，我既没有象审讯其他人问题一样给审讯人员提出要深追徐、胡二罪犯的罪行，又没有当重点问题向领导汇报；第二，知道徐宝兴、胡恒铿二犯没有直接参加五月十八日王永昆一伙在反革命大字报上签名，我就在向省委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了以签名和没有签名来确定案件成员的标准，以这一条把徐、胡二犯在“5·18”反革命案件上划出去了；第三，一九七六年九月份，以综合的形式上报了徐宝兴、胡恒铿的材料，但是同其他人的上报材料不一样既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又未指出问题的性质和意见。从形式上看我是报告了，实际上我是包庇了；第四，领导不问，我就不追。上报了材料，如领导上确定要搞这两个人的问题，我就争取由省公安局统一指挥，各家开展工作，这样就是今后刘殷农提出徐、胡的问题，我也好说，反正不是我搞的。

“四人帮”被粉碎，刘殷农预感到他的末日临头了，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他还叫张进昌与我订攻守同盟，捂盖子，逃避他的罪行，负隅顽抗。

第七部分

密谋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以后，“四人帮”在云南的余党黄兆其、刘殷农等人，惊恐万状，但又不甘心死亡，妄图垂死挣扎。他们四出打听，八方串连，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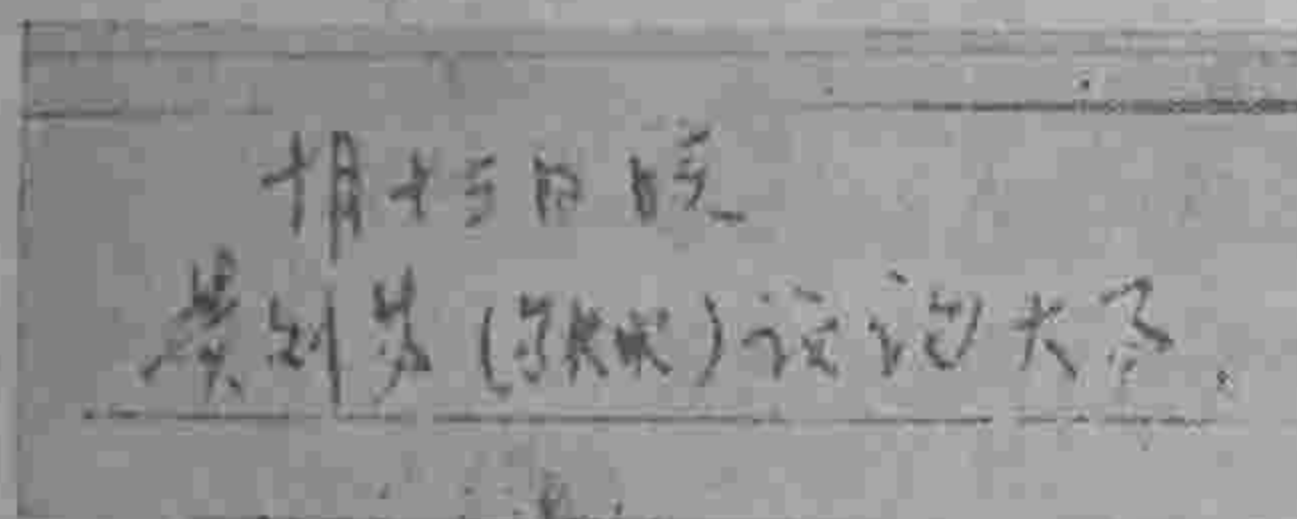
他们恶毒攻击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上台”。密谋策划组织所谓“蔡锷起义”，幻想出现一个“云南发难，全国响应”，“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提出了“军民联合”、“云贵协同”，首先占领昆明，控制民兵、报社，占领电台，播送反革命的《告全国人民书》；如叛乱失败后，准备“以楚雄为基地”，“大理、丽江连成一片”，“上山打游击”等一系列罪恶计划。并向邦派骨干作了具体部署。

由于“四人帮”人心丧尽，极端孤立，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反革命计划彻底破产。他们感到大势已去，又密谋策划转移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大方向，破坏运动，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妄图伺机再起。

一、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 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人帮”被粉碎后，“四人帮”在云南的余党黄兆其、刘殷农等纠集同伙，多次密谋策划，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叫嚣“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密谋“出一个社会主义的蔡锷”，策反军队和民兵，“上山打游击”，建立资产阶级邦天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一）徐宝兴《备忘摘记》（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十月十三日晚
黄刘等（缺沈）议论大事。

（二）涂晓雷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注：应为十三日）晚，在刘殷农家，参加的人有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和我。会上先由张奎林、徐宝兴和我介绍情况，然后是黄、刘表态部署。

刘殷农讲：1.云南出一个社会主义的蔡锷有什么不好！可以发动在昆的中央委员通电全国，学蔡锷起义，云南发难，全国响应。当然，上海带了头更好，我们积极响应，那时就会形成讨伐右派的声势，也可能形成内战分裂，各省独立的局面。2.全国一旦打起来，云南支持×××出来的方案是可行的。云南军内外造反派力量强，地型（形）条件好，群众觉悟高。现在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和准备，背水一战，不干和干败的结果都是一样。3.要干，关键是枪杆子问题。除了正规军外，重要的要做好民兵工作。现在只有基层一些单位活动好一点，要做好这些单位的工作，尤其是海口很重要。要向海口、机床、煤机等大厂矿的头头打招呼，有所准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注：应为十六日）上午，在刘殷农家，只有黄兆其、刘殷农和我三人。由我先向黄、刘把许梅康、叶秀锦等人的意见、方案，同我交换的情况作了汇报，然后黄、刘表态定夺。

刘殷农讲：干！我坚决同意和主张干。为历史作出贡献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走资派把十年文革的成果吞食掉。要干，就要有所准备。除军队、民兵外，还要准备控制好报

纸、电台，这些要害部门。同时做好专州工作，楚雄已来人了，正准备同他们谈。楚雄力量强，可做基础，曲靖、昆明、楚雄与滇西连通一线，可以转移。向厂矿打招呼已进行。吴福全去上海摸情况，昨天走了。另外，要干的话，舆论方面还得有所考虑，如文告，告人民书之类，到时可以广播，你（注：指涂晓雷）可以想想。

（三）黄兆其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晚饭后，在刘殷农家里，我、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涂晓雷五个人一起开了会。

刘殷农说：“如果发生右派政变，我们学习蔡锷起来造反。如其象小鸡一样被人抓起来，还不如拉起队伍来大干一场。云南造反派力量强，自然条件好，是有基础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上午，我、刘殷农、涂晓雷在刘殷农家里开会，继续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刘殷农说：“看来上海撑不起头来，上海毕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场面，平时看力量强，到关键时刻就撑不起来。”我们分析，王洪文等人被抓，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全国各地知道以后，肯定会乱起来，形成混乱局面。全国形势短时期稳定不了，中央、省委控制不住局势的发展，谁掌握枪杆子，谁就能站住脚。云南自然条件好，又地处边疆，全国乱起来了，中央先要稳定内地，一时顾不上边疆地区，所以稳住云南，发起蔡锷式的云南起义，对全国都有影响。刘殷农说：“上海不干，我们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涂晓雷说：“总要有人打第一枪，打了第一枪就可以动起来。”妄图打响第一枪，发动云南起义。

二、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刘殷农等人惊恐万状，垂死挣扎。派人到上海“了解情况”，决定对策，同时分别给昆明、楚雄、文山等地区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面授机宜，抓民兵、抓武器、抓舆论、抓后勤，“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昆明以至全省推向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一）涂晓雷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交代（节录）

黄、刘、张、徐分头向专州和各大厂矿来的帮派骨干“打招呼”，进行“应变交底”。布置“三准备”（即从思想、组织、物质上作准备）。我所了解来找过他们的就有楚雄、文山以及昆明地区的××、李积德、姜月生、李树林、吴福全、章士（世）祖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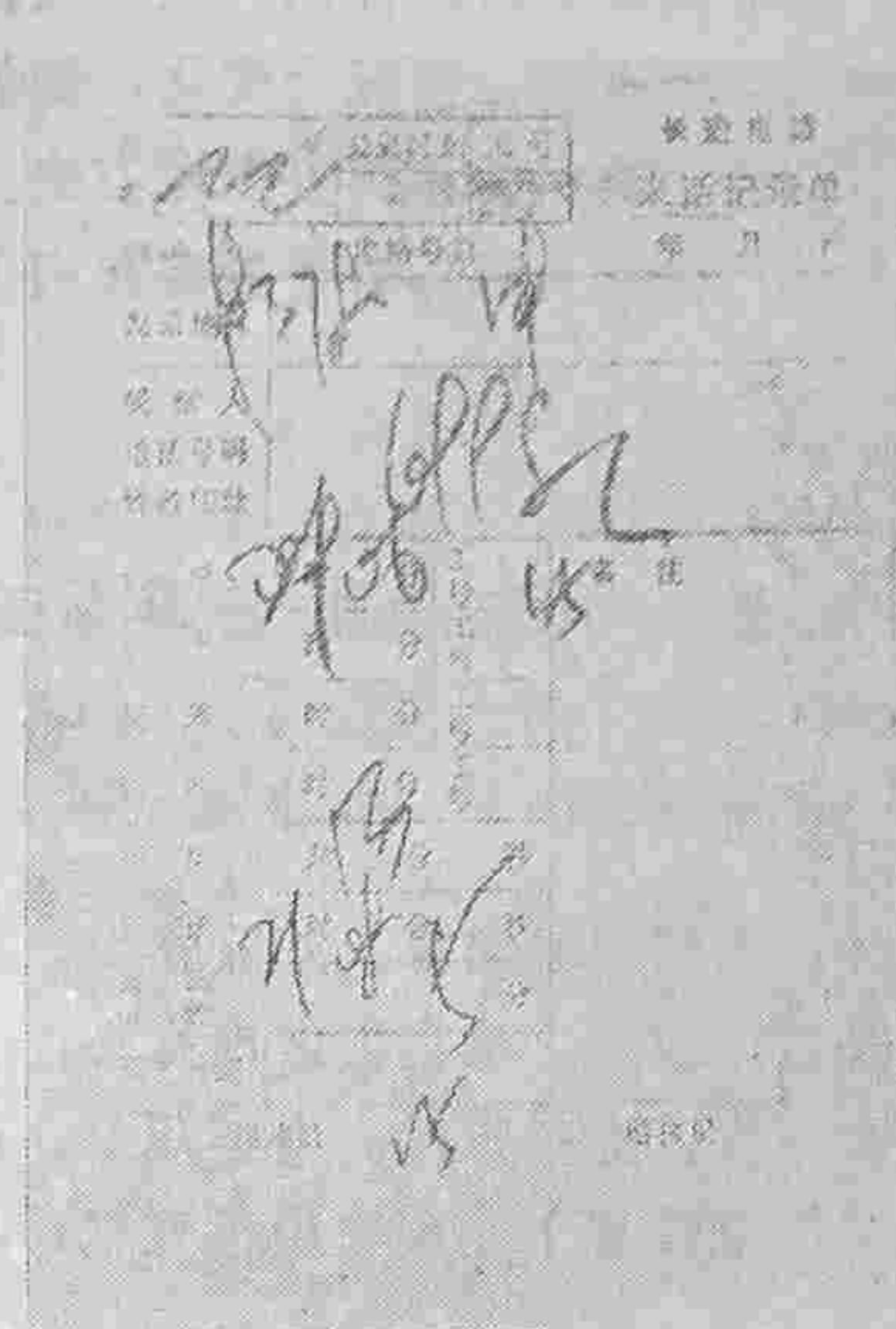
（二）派吴福全到上海探听情况，伺机发动叛乱

1、吴福全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下午，我去刘殷农那里。我进门就问刘：“中央出事了，你知道吗？”刘讲：“我知道了，听说上海打起来了，进行武装起义了，但不知造反派控制局面没有，情况不明，要想办法赶快落实。”我讲：“我准备到部里开会，要到二十多号才走。”刘讲：“太晚了，你明天就走，去晚了，火车飞机交通中断，就进不了上海，情况就无法知道了。”我讲：“我明天就去买飞机票”。刘讲：“你先去上海，根据上海形势决定我们怎么办”。当时我跟刘殷农讲了关于章健、刘××中午我送他们走的情况，刘（殷农）讲：“我知道，你路上小心，到上海后，找章健一起，根据上海形势商量一下情况，把你们商量的意见，打电话告诉我，打电话时要注意，小心被别人卖掉，要是上海情况像我们估计的一样就讲情况与家里分析一样，要不是就正面讲。”我讲：“我到了以后，就找章健商量，马上给你回音”。

2、吴福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从上海给刘殷农家中（电话号码6998）的长途电话的通话记录单的影印件

影印件（节录）原文



流水9378		长途电话 来话记录单 年 月 日
发话地名	申	
受话人 电话号码 姓名地址	6998	
话 毕	时13分 秒	备注
始 话	21时08分 秒	
通话分数	5分	

（三）向昆明地区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具体部署，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1、李积德（原昆明机床厂党委付书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我和杨宏发、张砚平到刘殷农家里。刘（殷农）说，这四个人是被抓了。这基本上是右派军事政变性质。我相信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工人阶级不会答应的。孙中山逝世后，袁世凯篡权，称皇帝。云南还出了个蔡锷，通电全国声讨，很快得到全国响应，起来把袁世凯赶下台。实在没有路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2、王云仙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我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以后，就急忙去找刘殷农，要他出来领着我们干，而且对他表忠心说：“只要你出来领着干，我们愿意跟你，那怕是抛头颅、洒热血，我也不怕，需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刘殷农不但同意我的意见，他自己也早有打算，叫我马上把曹光祥叫回来。十四号晚上，刘殷农给我和曹光祥讲：“问题是严重的，思想上要作好最坏的打算，要马上把这些情况给造反派通个气，向他们打招呼”。

3、吴福全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下午,我到刘殷农家,刘(殷农)讲,你们厂里武装控制在谁手里。我讲,武装控制在我们手中。刘讲,根据形势的发展,情况会变化,他们可能下步要收枪。我讲,要是他们来收枪,我们坚决不交枪,给它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刘讲,要考虑这个问题,作好充分思想准备,你先去上海,根据上海形势再决定我们怎么办。

4、姜月生(原省机械局付主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十月十五日晚上,大约七点多钟,我到刘殷农家。刘殷农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人被抓起来,看来是右派政变。从我们云南来说,造反派还有点力量,要把骨干组织起来,把消息给他们吹一吹,准备行动。今年还好,通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多数单位造反派头头的工作都恢复了,现在要注意把民兵控制住。

5、昆明铁路局段启明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揭发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晚上我和郭弟元到刘殷农家,刘问我们:黄兆其跟我们讲了没有。我说谈过了。刘说黄所说的是我们研究过的,照着去做就行了。

6、云南冶炼厂吴志良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晚去刘殷农家,刘殷农讲:“这是一次反复嘛,革命受到一点挫折,不要灰心丧气。大家都是造反派,要相信毛主席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次潮流来得很快,你们赶快回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7、云南冶炼厂俞承俊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揭发交代(节录)

在吕凤美家开会,吕凤美说:“我们从思想上要做好准备,要作最坏的打算,如果形势很紧急,要动用民兵或者上山打游击,要听老黄(指黄兆其)和老刘(指刘殷农)的指挥。”

三、(四)直接向楚雄州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作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

1、柯平(原楚雄州党委常委)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日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十月十四日晚上刘光兴决定派我到昆明找刘殷农领取指示。我们于十六日早上到刘殷农家后,刘殷农说:“这件事没有什么怀疑的了,也不能有什么幻想了。从王必成的电话中说到要打扫卫生,可能形势会恶化,下步可能对我们造反派进行镇压,你们思想上要有准备。你们楚雄的基础好,是有条件的,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准备斗争,我们要立足于斗争。柯平,怎么啦?为什么不吭气,不要悲观嘛。”“我相信他们不会长久的,右派政变都是短命的。”

刘殷农又说:“你们要有准备,特别武装斗争这个问题很值得考虑,你楚雄条件很好,我们对你们希望很大,你们回去跟刘光兴他们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一定要有准备,到时,如果我们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我们将准备到你们楚雄来,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并要有转入山区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你们回去后注意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2、安且康(原楚雄州文教局党委付书记)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我们到刘殷农家以后,刘殷农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抓起来了,还抓了迟群、谢静宜、毛远新,这完全是一次右派政变。”

刘殷农又说:“对民兵要珍惜,这是宝贵财富,不能丢掉,要有准备。你们那里的民兵指挥部不是恢复了吗?”

柯平说:“早恢复了,各县都恢复了,还有机动营,都发了枪。”

刘殷农说:“现在发了多少枪?”

杜勇回答:“枪发了两三千支呢。”

刘殷农说:“你们基础好,民兵强,山区大,很有希望,我们准备在全省开展一场救国斗争,要学习当年云南历史上蔡锷救国的精神,反对袁世凯,在云南首先树起旗帜,然后全国响应。我们研究以楚雄做地盘,点这把火,上山打游击,影响全国,柯司令怎么样?”

柯平说:“那就要上紫金山了,提着脑袋干了。”

刘殷农说:“你们要组织一下力量。”“到时候我们会来人。”“要争取部队支持。”“把军队和民兵捏在一起,要建立武装领导班子。到时候你们和大理取得联系,民兵要相对集中,粮草要先行,以便好统一行动,全省配合。”

3、李国梁（原楚雄州党委办公室付主任）一九七七年七月三日交代（节录）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时间是晚上，柯平从昆明回来后召集的一次会议，大约是从七、八点钟开始的。参加的人有：刘光兴、柯平、吴向忠、邱立峰、赵文顶（鼎）、安其（且）康、我、李宗凯，还有二、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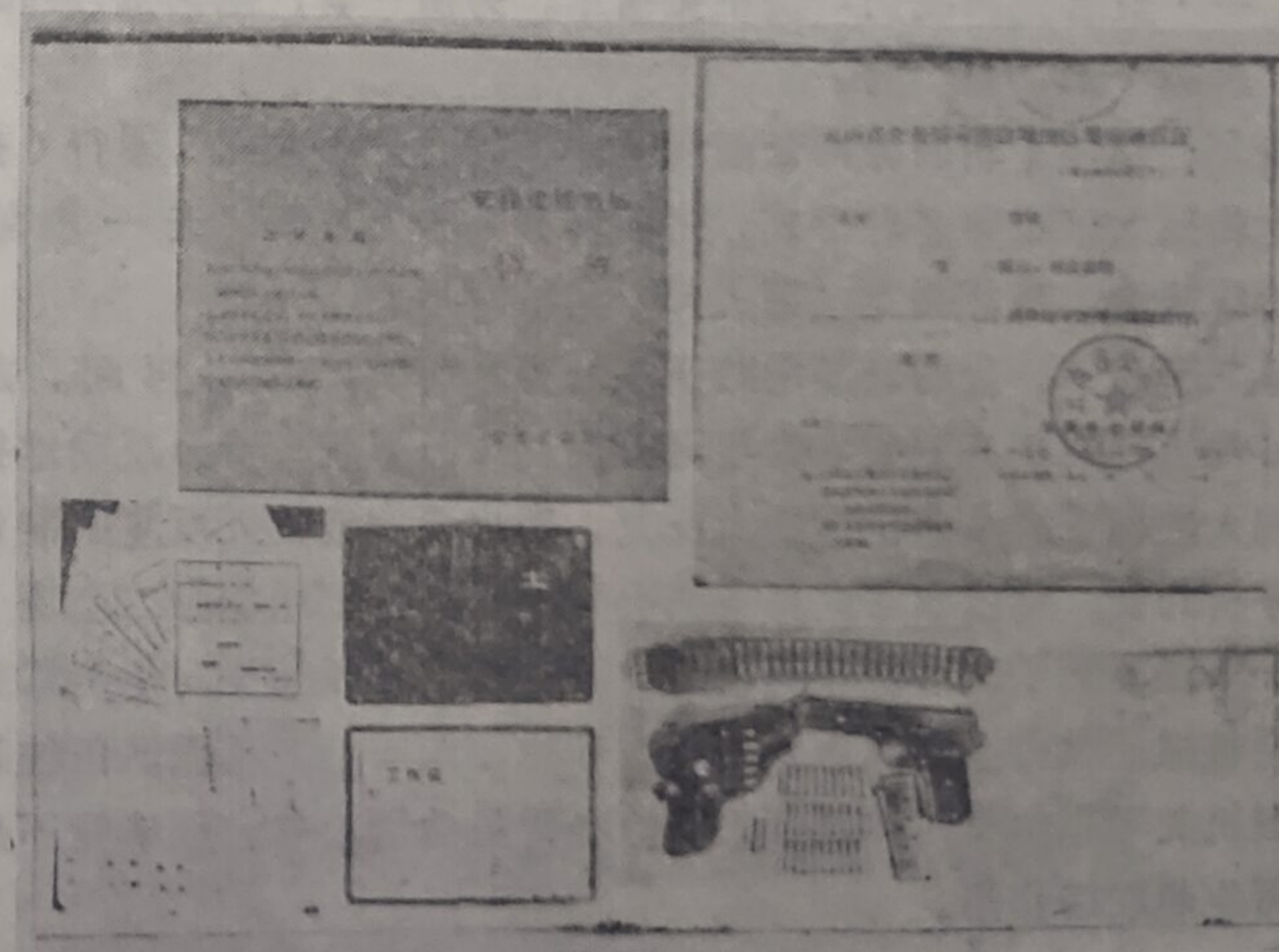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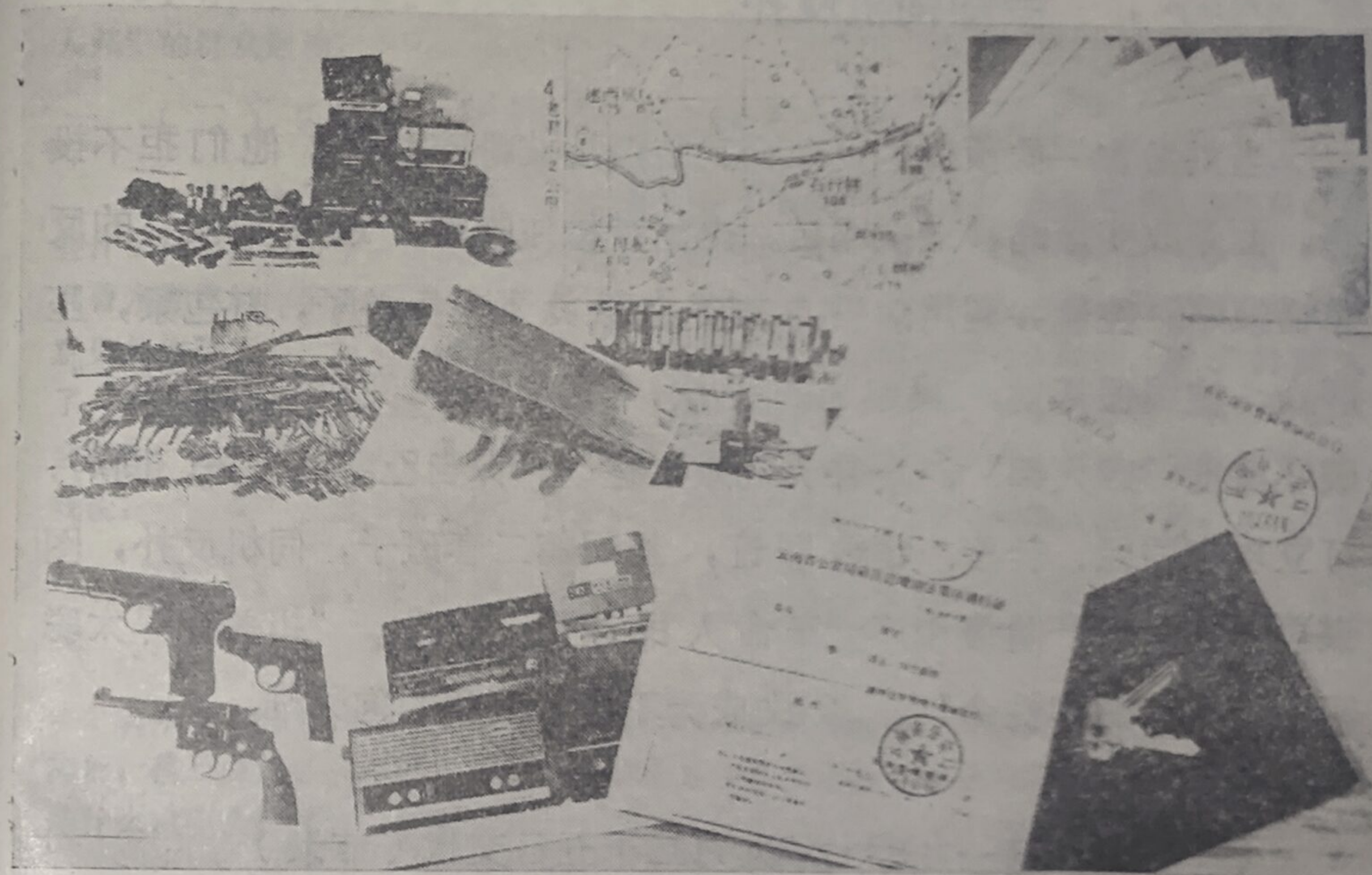
开始，是柯平讲：到了刘殷农处，刘殷农说：“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四人被抓了，这实际上是一场右派政变，你们要有准备，可能要上山……”刘光兴讲：我们楚雄不怕，我们是多数，他们是少数，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困难的，但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楚雄的条件是好的，州上有一千多人，还有各个县，牟定、元谋、南华，还可配合。吴向忠讲：“事到如今，不干也不行，不成功，便成仁。”

（五）直接向文山州的资产阶级邦派体系作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

何立宽（原文山州党委常委、州革委付主任）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交代（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早上四点多钟，任怀灿、马昭由昆明回文山，就到我家给我汇报。刘殷农说：“王、张、江、姚这几个人被抓是政变了。这几个人垮了以后，形势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但是，上海方面的看法是那样也不知道”任说：“你们现在不会组织起来干吗？”刘说：“如果打起来的话是在不住昆明的，这个问题我们考虑过了，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就上山打游击，而且到时候还很可能要往你们文山方向走的。”任说：“好，我们欢迎你们退到文山来。我们文山有个老君山，那个地方是我们文山州和红河州的交界处，那个地方山高林密，很适合打游击。”刘说：“你们要马不停蹄地赶回去告诉小何（立宽）。”

（六）昆明、楚雄、文山查获的有关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部份罪证的影印件



三、破坏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 妄图伺机反扑

当刘殷农一伙预谋的反革命武装叛乱被粉碎以后，他们拒不投降，而是改变策略，继续顽抗。提出“稳住阵脚，迎接反复”的反革命策略。控制并利用前省、市委主要负责人捂盖子，打包票，压群众。施展假揭发，真包庇的手法，“把水搅浑，变被动为主动。”破坏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保自己蒙混过关。同时，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伺机反扑，图谋再一次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较量。但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以致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一）黄兆其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交代（节录）

我们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被粉碎后，我和刘殷农等人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破坏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紧紧拉住贾启允，利用贾启允为我们打包票、捂盖子、压群众，让贾启允充当我们的保护伞。……贾启允和我们对抗中央指示，另搞一套，把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作为一股“歪风”来“刹”的。

2、多次策划，炮制《斩断伸向云南的黑手，揭发“四人帮”罪行（提纲）》，召开黑会，利用上街贴大字报等多种形式，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进一步陷害王必成同志，挑起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3、组织第二套班子，妄图长期隐藏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去年（一九七六）十月十三日晚上，我们在刘殷农家里开会时，惊恐万状，十分反动地把我们党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看成是全国性的大反复，提出要有迎接大反复的准备，要准备抄家、坐牢。还分析到我、刘殷农这些头头都会被抓起来，要组织第二套班子，准备第一套班子被抓了，第二套班子顶上。我提出来，张奎林、李积德平时出头露面少，活动也不多，估计不会被抓。社会上可以由张奎林、李积德两人把造反派队伍统起来。办公厅有胡延观，省级机关可以由李树林统起来。涂晓雷虽然活动多，但毕竟不是头头，也可能不会被抓，可以起联络作用。

4、去年（一九七六）十月十三日晚上，我们在刘殷农家里开会时，讨论要有迎接

大反复的准备，要准备抄家、坐牢，特别是材料要赶紧处理，对整理的省委、各级党委的材料，该烧的要烧掉，该处理的要处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即使抓起来了，也找不到证据。

5、订立攻守同盟，千方百计了解运动的动向，给一些人撑腰打气，对抗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二）王云仙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交代（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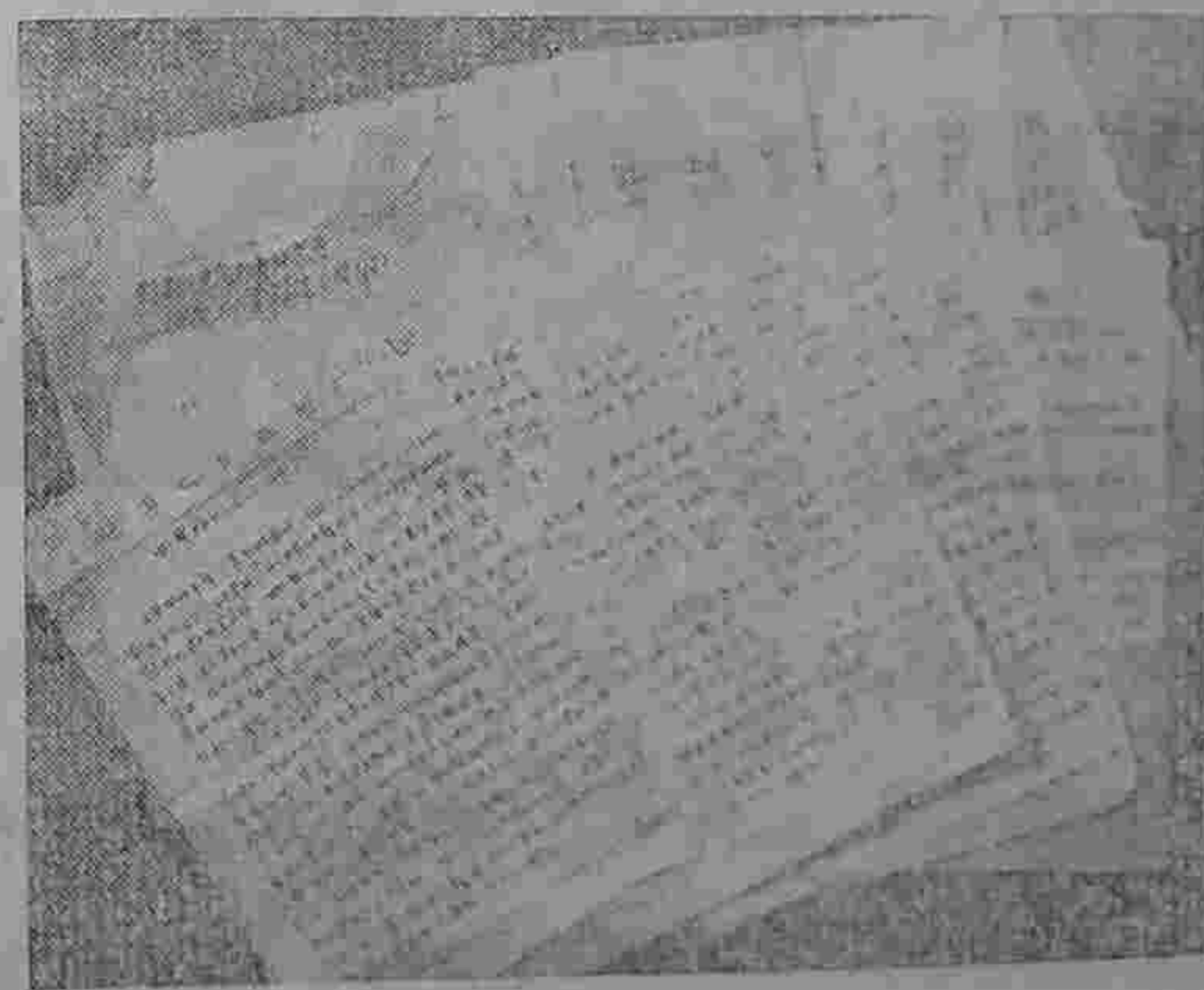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下午，曹光祥告诉我：“刘殷农讲，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有些什么材料清理一下，有用的把它留下，没有用的就销毁了，以免以后作为罪证。”而且曹光祥已经作了清理。十六号上午八时，曹光祥又告诉我说：“我们研究了，我们的意见是你留下来，因为你有两个孩子，你也走不了，我是没有什么牵挂，孩子们都大了，我是要走的，我们走以后，你一定要想办法隐蔽下来。”“我们分析，他们可能不会整你，你是四（届人）大代表，今后人家说‘四人帮’坏，你也跟着说坏就行了。”我说：“好嘛”。这个事说明了刘殷农已作了留那些人，发动那些人的打算。

（三）马首良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交代揭 发（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十二月上旬，曹光祥到我家对我说：“刘殷农已被隔离，未被隔离前，他已感到情况不妙，告诉我们不要承认有串连和有组织的活动，叫我们放心，他是什么也不会讲的。”

（四）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揭批“四人帮” 运动

1、刘殷农等人炮制的所谓《斩断“四人帮”伸向云南的黑手》
反动提纲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沙朗巷赵珊家查获的刘殷农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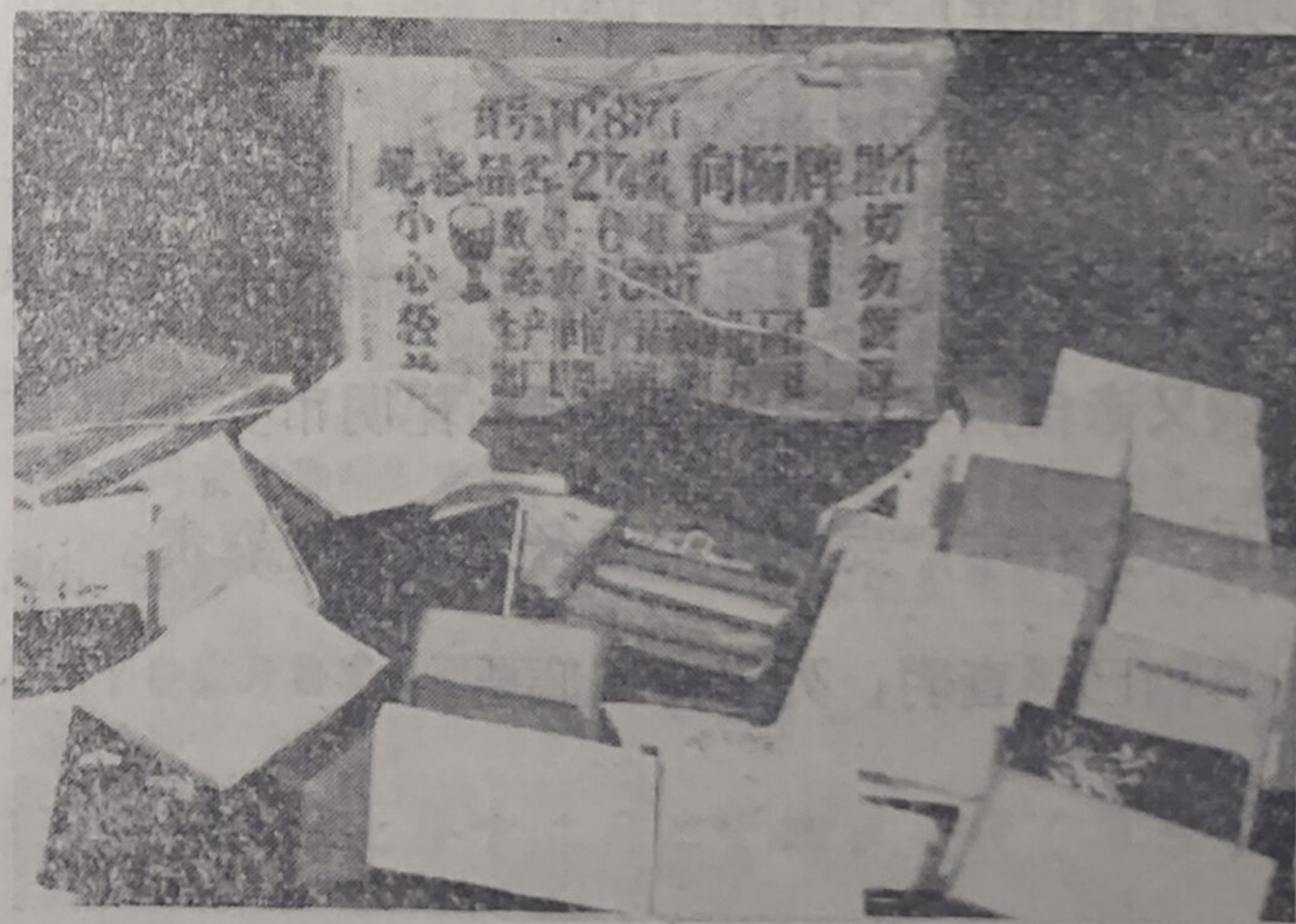
2、省公安局朱浩林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揭发交代（节录）

去年（一九七六）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去刘殷农家，刘殷农说：“我正要找 你，你来的正好，最近一段昆明贴的大字报、大标语说我是‘四人邦’在昆明的代理人，是春城大恶霸，是翁松（森）鹤式的野心家。还有一张‘四人邦’与云南的联络图，点了不少人的名，还有黄兆其、朱克家、彭贵和等。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我们，我和老黄议了一下，都感到压力大，现在要给大家鼓鼓气，不要灰溜溜的，舆论可以杀人呀，老黄要我找几个人搞一个材料，研究一个办法，设法控制社会上的舆论。现在是时候了，要把内部混乱的思想统一起来，我准备了十来条，我们今天凑上十五条，这是一颗重型炸弹，一定要打响”。“‘四人邦’确实插手了云南，不仅我们这一边插了手，另一派插得更深，材料很多，我们是有凭有据的，王必成是‘四人邦’派来云南的。”他要我补充，我也讲了三条，李树林补充了两条，共凑了所谓“四人邦”插手云南十五例。材料拼凑之后，他要我迅速起草，然后交给李树林修改、补充。

我按照他的黑旨意，加班加点的进行突击，第三天就搞出来了一份初稿共十五、六页，送给反党分子刘殷农了。接着十二月三日昆明街头出现了十二条标语和两份大字报，一份是署名《陆涛》的《周兴是怎样死的》，另一份署名《高庆云》的《斩断黑手》。

（五）转移罪证材料

1、刘殷农转移的部分罪证材料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刘殷农家、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和沙朗巷赵珊家中查到的罪证材料

2、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同志一九七七年五月七日揭发（节录）

在黄兆其游街之后的几天，一个晚上，刘金龙约我到刘殷农家去玩。刘殷农对我说，他有些材料，要求放在我家里。我同意了。我便和刘金龙拿到我家。

第八部分

非法抓捕、打死无辜革命群众袁宝华同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刘殷农亲笔写条子并派陈天寿等人，持枪到拓东路四百四十八号，非法抓捕革命群众袁宝华同志，关押于原昆明工人文化宫。刘殷农亲自策划、指挥，私设公堂，轮番刑讯逼供，酷刑拷打，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夜间将袁宝华活活打死。

一九六八年元旦夜间弃尸于西坝河边。

十年来，刘殷农利用资产阶级帮派势力，多次订立攻守同盟，掩盖事实真相，致使袁宝华同志沉冤十年。一九七六年“四害”横行时，刘殷农又亲自拟写结论，并串通前昆明市委主要负责人，硬塞进市委的正式文件中，妄图借市委名义，开脱罪责。

现在，真相已经查明，死者得以昭雪。

一、违抗中央“六·六”通令，非法绑架袁宝华同志

1、死者家属张玉芝同志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向省军管会控诉的记录（节录）

袁宝华，男，33岁，外贸局临时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从陆良回来，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五点半在家，有三人叫他，说你是不是叫袁宝华，袁说是的。就拉到拓东路派出所门口，叫他的人就叫另二人看着，他去叫了一张小吉普车，开往太和街，以后到处找，就找不到了。

2、兰家训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卅日下午，刘殷农听了拓东地区×××反映，从新华山下来一个×派常委，住在拓东地区时，当场表示：“把他抓来弄清情况”。刘又问了袁宝华的姓名、住址，从他手里拿的报纸边上撕下来一条，写下了姓名和地址。刘就喊我，老兰，你把这个条子交给陈天寿。我把条子递给陈天寿说：“老刘（殷农）说把这个人抓来问问”。陈天寿接了条子，约我同他一起去找刘殷农。陈回来后，就叫了几个人跟他去执行任务，去的人有我、李世立开车，×、×。陈（天寿）带队。我们四人进到袁宝华家里，陈问：“你可叫袁宝华？”袁答：是的。陈说：“请你跟我们去一趟。”这时，陈天寿从腰里掏出“五四”手枪来，×上去一把抓着袁的护领把袁拉出来，我就在后边把袁推着出来，叫李世立开着车，回到了文化宫。

3、陈天寿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卅日下午，在工人文化宫后门的院坝里，兰家训拿着刘殷农亲手写的一个字条对我说，刘殷农叫把这个人抓来。字条上写着“袁宝华，拓东路4××号”（四百几十号，记不清了），我和兰家训拿着这个字条又去找刘殷农。刘殷农说，这个人是新华山下来的，你们把他抓来。根据刘殷农的指示，我和兰家训又找了三个人，按照字条上写的门牌号数到袁宝华家，将袁宝华非法绑架到工人文化宫。

二、亲自策划、指挥对袁宝华同志刑讯逼供，毒打致死

1、亲自策划、指挥，刑讯逼供

(1) 陈天寿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代(节录)

袁宝华抓来后，我又向刘殷农报告，刘殷农说：“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11·30》被打下来，就从新华山下来，家里(离)我们这里很近，是带有任务的，要好好审一下。”

吃过晚饭后，根据刘殷农指示，我和×××、×××对袁宝华同志进行非法审讯，一样情况也没有审出来。刘殷农听后很不高兴的说：“他不说话，就没有办法啦?! 这个人来得不易的，他是知道不少情况的，要把情况搞清楚。”

(2) 兰家训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卅日晚审讯袁宝华，审不出情况时，刘殷农指示：“这个人很重要，我们所处的形势不太好，现在急需了解×派的动向和下一步行动计划。”刘殷农还说：“大家辛苦下，再继续审讯，给他点厉害。”接着我们召开了直属连班排长会议，传达刘殷农的指示，并作了研究。继续审讯。先由陈天寿问，袁宝华说他不是×派常委。陈就上去打了袁宝华同志，袁宝华往后侧倒在地上，接着×××上去给袁宝华一枪托(铁把子冲锋枪)，××也上去(向)袁的腰部踢了一脚。

(3) 李付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六点多钟，陈天寿告诉我，下午抓了一个重要人物，从初步审讯的情况看很顽固，刘殷农很重视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尽快从这个人口中弄清情况，尤其是下一步×派的行动计划。现在决定继续审讯，你也来参加。我就跟着陈天寿对袁宝华同志进行审讯，在审讯过程中采取了推、按、跪，时而松绑，时而紧绑等粗暴行为。到九点钟左右，由于审讯无收获，刘殷农又给我们说：“听说你们审讯搞不下去，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派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袁宝华是×派要人，你们要想办法继续审讯，搞清情况。可以多发动一些人，连夜审讯。直属连中有些人可以参加审讯。现在由××跟你们一起下去找有关人员研究一下。”这样，××、陈天寿、×××、我就到了直属连连部，并通知直属连的班、排长到连部研究。在会上，××说，现在刘殷农要求继续审讯，你们配合调研组进行这项工作。并组织了参加审讯的人员。为了达到目的，在必要时适当采用武力。在审讯中袁宝华同志仍坚持申冤，(他不是×派常委)。我们认为他要赖，就拳打脚踢，打得很凶。卅一日我去看袁宝华同志已瘫痪，躺在墙角的席子上，喊了也答不出话来。夜间，袁宝华同志死亡了。

2、十二月三十一日夜间，袁宝华同志被活活打死

(1) 韩生荣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卅一日晚，我和×××站岗，九点多钟，听到关袁宝华的房子有响动，我叫×××去找马光甫，十点钟左右马光甫带着牛星贵、曲成连、×××来了。马光甫进去就抓住袁宝华，用右手打了(袁宝华)左脖子上一拳。而后就开始拳打脚踢。曲成连用半自动步枪冲袁宝华的右肋，枪就走火了。马光甫、×××是在袁宝

华左手边打，牛星贵、曲成连是在死者的右手边打。马光甫、牛星贵是用铁凳子，一边一个，你打过去，他打过来，他们都是打死者左右腰部和肋条上。打完后，马光甫说，牛星贵你来和我把他重新捆起来，捆紧一点。一边一个用脚蹬着死者的手，把死者捆得很紧，提到进门的左边，靠墙坐着。根本就站不起来了。

一九六八年元月一日早上八点钟后，杜建明下岗回宿舍说，昨天晚上那个人死了。我进票房去一看，头天晚上的现场没有动着，死者靠的位置没有动着，我用右手摸了一下死者的咀，已经是冰凉了。

(2) 牛星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卅一晚，我已经在床上躺下了，×××来找马光甫，说关着的那个人(袁宝华)在小房子内有响动，要找马去处理一下。马光甫就把我和曲成连从床上叫起来跟着他去，并说：“那个××想逃跑，我们收拾他一顿。”我们到了前大门票房，×××也跟着进去，马进去后就开始审问，但袁没有答话。马光甫就在前胸踢了几脚，说：“狗日的我看你不说话，你们几个给我打!”我们就动手打了。我是用铁凳子打他的腰腿部分，曲成连用枪托砸，砸了两三下，枪就走火了。第二天早上就有人来向马光甫报告说人已死了。

(3) 曲成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来找马光甫，后来马光甫叫着我、×××、牛星贵一起到了工人文化宫前大门关袁宝华的房子，这时袁宝华已经受伤，脚出着血。开始马光甫就审问袁宝华，说你还不老实，接着就踢了袁宝华小肚上几大脚，袁叫了一声，马光甫就说，你们给我狠狠的打! 于是我就用枪照着他的身体和大腿上就是几托，边打边说你不老实，后来我的枪就走火了，牛星贵是用凳子打，×××也在肚子上踢了七、八脚。后来我和牛星贵用两根绳子绑起来，绑的很紧。到元月一日早上杜建明找马光甫说，袁宝华死了，当时马光甫和我去看了袁宝华的尸体。

(4) 马光甫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交代(节录)

第二天(一九六八年元月一日)他们告诉我人死了。我去看时，人确实已死了，还是捆着，绳子还是头天晚上我们捆的，位置还在头天晚上我们捆的地方，人已死硬了。房内没有发现什么反常现象，人身上也未发现新的伤痕，和头天晚上一个样。

连长李付德叫我们去处理尸体，调来个大汽车，把人用草席包着抬上汽车拉到省委旁边的河沟边丢掉。

3、毁尸灭迹，妄图嫁祸于人

李付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八年元月一日晚上七点多钟，王林来到连部对我说，今天晚上处理尸体，准备用汽车拉到省委外边，炮、八交界处丢掉，你去组织人，一小时后带好武器，集中在前大门附近等候。九点多钟派来一部解放牌汽车，从票房把席子包着的袁宝华同志的尸体抬上车，我向参加丢尸的人交代了注意事项，由杨申毓负责去丢尸。十点多钟杨申毓向我汇报尸体已丢在昆明军区和省委之间西坝河中，杨申毓汇报后，我去找王林没有找到，第二天(元月二日)早晨我到××宿舍向他汇报了丢尸情况。××说，丢了就算了，以后不要宣扬这件事。

三、订立攻守同盟，妄图掩盖罪责

1、兰家训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八年元月一日晚上袁宝华同志的尸体丢后，于十一点左右，我们回到调研组，我给陈天寿说：“人是我们抓来的，现在死了，以后怎么说得清？”陈天寿说：

“人是刘殷农叫我们抓的，这个责任由老刘承担。人已死了，已经处理，今后那里来问和调查，你们就说抓袁宝华的前一段，后边这一段我来说。”所以这十多年我只讲抓袁宝华前边这一段事，没有讲袁宝华同志抓来关在文化宫怎么死的问题。我这样做是有罪的。

2、陈天寿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交代(节录)

一九六八年八月省、市革委会成立后，为了互相包庇，逃避罪责。九月后的一天晚饭后，我和×××到春城饭店找到刘殷农，我对刘说，袁宝华被打死的事，你给省里边反映一下。刘殷农说：“你们回去写写拿来给我。”我和×××按照刘殷农的授意，我把抓袁宝华同志经过说了一下，过了几天，×××写好报告，我面交给刘殷农。

在刘殷农的授意下，泡制的这个报告为上下统一了口径，使袁宝华同志被非法绑架惨遭活活打死的问题，十年不能到得昭雪，是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证。

3、杨玉荣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交代(节录)

省、市革委会成立后，九月底和十月初的一天，陈天寿到我家一起研究写报告的事。陈强调说，抓袁宝华同志时，是处在武斗比较乱的情况下抓的。我提出把我们审讯那段情况写上，但是陈天寿不同意，并说，这段不要写了，写了倒使这个问题不突出。当时我处于掩盖自己参加审讯的错误，就同意了这些意见。由我执笔写成，陈天寿作了修改，复写上报。

我参与了审讯袁宝华同志的罪恶活动，为着掩盖这个问题，写了报告，实际上成了假揭发，真包庇。

4、王春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交代(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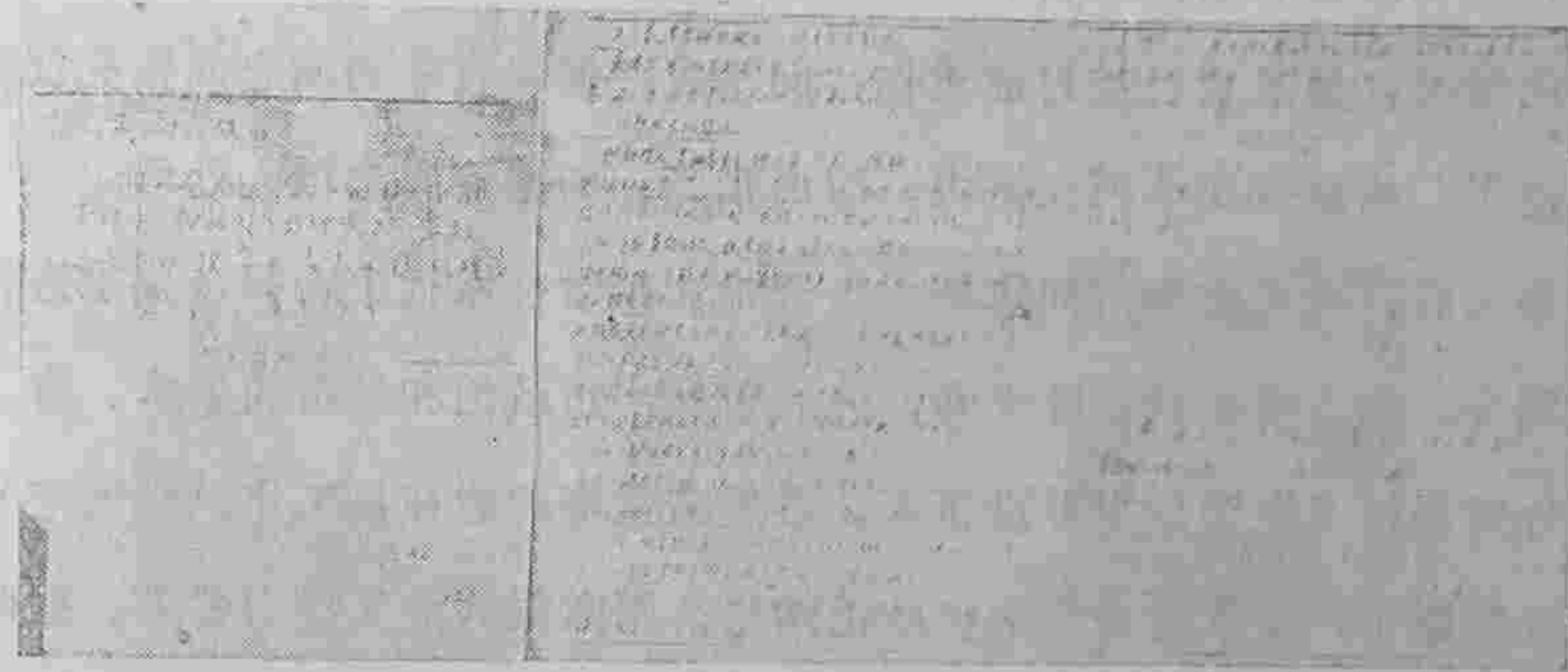
在文化宫前线指挥部解散前有一天上午，陈天寿怕袁宝华同志的问题以后追查起来大家的说法不一样，他就和×××写了一分有关袁宝华被害的情况发给大家，李世立、×××和其他有关的人各一分，也发给我一分。陈天寿说：“你可以看看，以后人家问到也好说。”

5、原昆明市“五·七”干校个别人利用职权，写假报告，欺骗领导，妄图把刘殷农等人的杀人问题一笔勾销

袁宝华同志是省外贸局畜产仓库的合同临时工，当时是×派的一般群众，不是×派常委，也没有参加武斗，一直坚持工作。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回陆良老家。十二月二十八日回昆，三十日被诬陷为×派常委，在刘殷农亲自指挥下，被非法绑架，毒打致死。

一九六九年八月，原昆明市“五·七”干校政治办公室的少数几个人，盗用组织名义向市革委写了一个假报告，颠倒事实真相，欺骗领导。妄图用“经济生活问题或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救济，或由死者单位给予补助”等寥寥数语，既不查明情况，也不追究责任，就把一个无辜群众被打死的问题，草草了事。其罪恶目的就是为包庇刘殷农及其同伙。

下面是王林于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给黄兆其的信和原昆明市“五·七”干校政治办公室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九日《关于袁宝华被抓致死的调查情况报告》的影印件



注：这是从省化工研究所梁从杰家中查获的刘殷农转移的材料

影印件原文

黄兆其同志：您好！

附上我六连（原公安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校部提了处理意见，老刘（殷农）远出未回，现寄上请您审阅，处理当否？望即覆！并予指示

王林上

24/8

关于袁宝华被抓致死的调查情况报告

袁宝华、男、40多岁，省外贸局临时工，炮派群众住拓东路448号，妻、张玉芝在洗染公司书林街印花车间工作。

问题发生的经过

据知情人兰家训、杨玉荣、李世立、杨谦等同志介绍：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拓东地区居民自动到八派指挥部（市工人文化宫）对八派战士进行慰问，当时刘殷农同志代表八派接见革命群众，在座谈中，有居民向刘殷农同志反映，有住拓东路的一个炮头，刚从新华山下来，还吵闹要办理退粮手续。当时刘殷农同志觉得要了解一下。当天下午刘殷农同志叫兰家训找陈天寿喊几个人去把袁宝华抓来，后陈天寿喊了李世立（开车）、叶向东、陈运中等人，到拓东路448号把袁宝华抓住拉到文化宫，交给文化宫前门右侧票房内关押，由警卫连看守，当时陈天寿还向看守的人交待，这个人是刘殷农叫抓来问问情况的，不准打。陈天寿等人就回住地去了，并提出叫杨玉荣同志第二天去问一问情况。次日凌晨二时左右。杨谦同志到杨玉荣、陈天寿等同志住处楼下喊：“你们抓来的那个人要跑，怎么办？”当时大家很累，天气又冷，没有起来，陈天寿就说：“他要跑，你们把他管紧点就行了嘛！”杨谦就走了。第二天下午杨玉荣去关押袁宝华处想问一问情况，但见袁已被打成重伤，问不成，就叫看守的同志向张亮反映，给一医一医，就走了。当晚袁宝华死在室内，后由张亮、杨谦等同志派人处理。

袁宝华死后，我连陈天寿同志即向市公检法军管会军代表会报，要求进行调查，同时张玉芝到公、检、法也找到陈天寿，先后曾提出过政治和经济的要求。省、市革委会成立后，外贸局每月在生活上补助伍元。最近陈天寿同志在昆工作，张玉芝又找到陈天寿，说他要结婚了，要求给袁宝华作政治结论，同时经济上又提出要求。据此，陈天寿同志本人无力解决，特将调查情况报

校革委会请示

六连领导小组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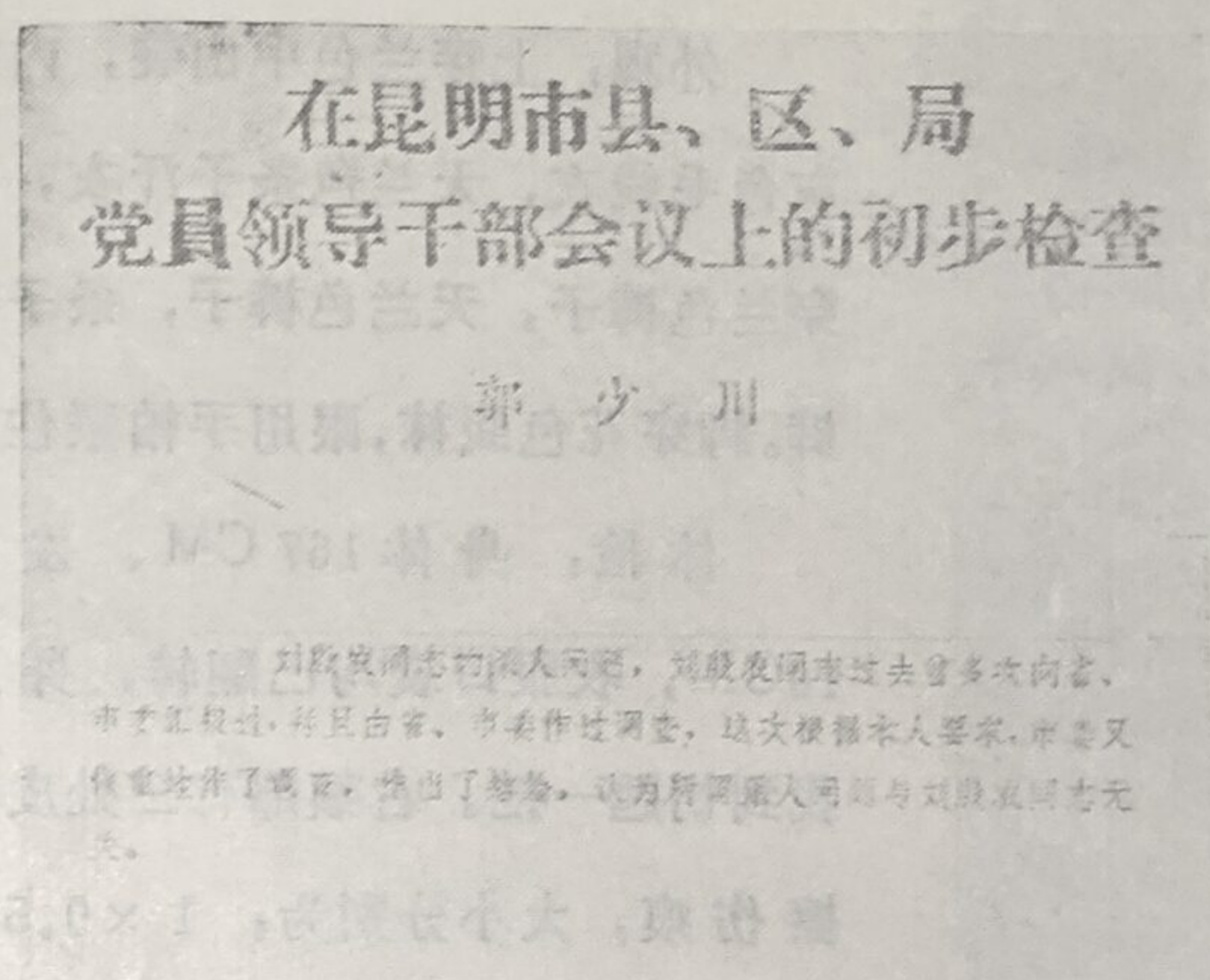
类似情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个别问题，报请市革委研究解决。我们的意见，经济生活问题或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救济，或由死者单位给予补助。

昆明市五·七干校政治办公室（章）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九日

6、刘殷农亲自拟写自己的结论，借市委名义逃避罪责

下面是郭少川《在昆明市县、区、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上的初步检查》中关于刘殷农杀人问题的“结论”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刘殷农同志的杀人问题，刘殷农同志过去曾多次向省、市委汇报过，并且由省、市委作过调查，这次根据本人要求，市委又慎重地作了调查，作出了结论，认为所谓杀人问题与刘殷农同志无关。

附件：

一九六八年元月三日原省军管会拍摄的尸体现场照片和验尸报告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袁宝华，男，33岁，外贸局临时工。

地点：弥勒寺新乔（桥）

外观：上穿兰色中山装，内穿灰色毛线衣，天兰色条子汗衣，下穿兰色裤子，天兰色裤子，条子汗裤。脚穿花色线袜，眼用手帕蒙住。

体检：身体167CM、发长10CM，衣服口袋均已翻转，身上找到钥匙一把。右额部有三处皮肤擦伤痕，大小分别为：1×0.5、1×0.5、1×0.5CM，呈三角形（死后伤），头颅、五官均无异常，颈部有环形索痕一条，左胸第三肋胸骨

外5CM处可见有骨擦音。右第八肋乳线外，可触到骨擦音，相对部位可见表皮擦伤。左肋骨表面可见表皮擦伤。

第十胸脊到腰2右背部有隆起，到乳后线，平均高出0.5CM，这块区有囊样感。腹部凹陷，未伤口。肛门有大便，左右肘上有环形皮肤擦伤，并见水泡。右手中指掌指关节有1.5×1.5CM皮肤缺损。左手中指、无名指，第指关节有撕裂伤，未见骨折。左腿膝下有紫红色尸斑，小腿中下1/3（双侧）有条索状皮肤擦伤痕迹。左膝以下粗大饱满，皮肤稍发亮。左胫内踝有皮肤裂开，长4CM，边缘整齐，内踝有斜形切开，切面较平整，深0.9CM，其余未见伤口。

军代表 巴朝英

检查者 接待组军医 冯业富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

勘误表

页码	行次	误	正
31	倒6	抢购	抢购
36	10	反动性	反派性
52	2	专级	专政
64	5	无击	无耻
76	6	射影	影射
92	9	备准	准备